

目 录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及其前后的历史状况	<u>范额尔德木巴图</u> 罗阿日斯楞 (1)	
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及前后历史概述.....	张宏林 (37)	
追忆塔旺嘉布先生.....	藏登米德格 (61)	
梁、胡嫌疑案真相.....	戚涛 (73)	
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	朝格图 白晓 (84)	
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	巴达尔胡 (98)	
高世格梅林及其《普济杂方》.....	段贡布甲布 (102)	
范氏十一代行医史简略.....	范诺尔布扎木苏 (105)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几个片断.....	贡其格 (111)	
阿拉善盟畜牧业发展概述.....	洋金都 (118)	
<table border="1" data-bbox="332 1559 500 1768"><tr><td>补 白 文</td></tr></table> 阿拉善旗各防卡名称 (83) 理藩院 (97) 绿营 (101) 八旗 (117)	补 白 文	
补 白 文		
征稿启事.....	(122)	

阿拉善旗和平解放 及其前后的历史状况

范额尔德木巴图

罗阿日斯楞

1686年前，阿拉善的一部分牧地属清朝皇帝的军马场，定远营①原址为皇上的“御马圈”。1686年（康熙25年），清朝廷恩准和罗理部暂居阿拉善，1690年（康熙29年），清朝廷正式将阿拉善地界赐予和罗理。1697年（康熙36年），清朝廷册封和罗理为固善贝勒爵位，并赐扎萨克职，遂设阿拉善霍硕特旗。自建旗至1949年解放的252年间，袭位计九世十五。

一、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前的基本状况

1、军政机构

阿拉善旗（以下简称阿旗）面积约十九万平方公里，1949年除磴口县外，三十六个巴格的人口约三万多，大小牲畜三十四万多头（只）。

阿旗政府设置的行政机构有办公室、政务处、秘书处、教育处、财政处、理事官厅（法院）和稽查局等。旗政府所属大小官吏共245名（巴格达木尔、防卡长、职员不计其内）。

旗政府军事机构有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和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

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设办公室、政工处、参谋处、副官处、军需处和军医处等，任有司令、参谋长、主任、处长、副处长、军医官、专门职员等若干人。

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有总队长一人，副总队长二人，其中一人兼参谋长职。总队下设五个中队，每个中队有中队长、副中队长各一人。中队下设有四个分队，每个分队约有官兵42人，有分队长一人，副分队长一人（副职不属军官之列）。此外，还设有直属勤务分队和通讯分队。这两个分队，也有正、副分队长各一人，常外出执行临时性任务。全总队共有军官150余人，兵员达1270人。

行政管辖。全旗设八个苏木、三十六个巴格、四十六个防卡。八个苏木又分为左、右两翼各四个苏木。苏木是介于旗府和巴格之间的一个行政机构，它任有佐领、骁骑校职的官员各一名，但无专门的办公地点。佐领、骁骑校是旗政府的一级重要官吏，平时虽与旗府其他处、室一起办公，但他们只是管理涉及苏木的有关户籍、征收宝得及征兵等事项。巴格是管理军政等诸事务的最下层的行政机构。每个巴格有若干不脱离生产、不领薪金的达木尔（边官），阿哈木德达木尔是主管巴格事务的正职，二达木尔属副职，其余达木尔为一般办事员。巴格也无固定的办公地点。巴格的印信由正达木尔随身携带，当有公务要办理时，先由正职达木尔发出通知，有关办事人员接到通知后，就赴约定地点，几个人坐在一起商讨公务，分派差事。全旗属这类达木尔职的约有260人。

全旗设有防卡四十六处（包括临时性防卡），其主要任务是，防守本旗地界，维持地方治安，征收草头税等。防卡一般有正、副两名卡长，也有只有一名卡长的。全旗共有九十余名卡长。其中，有的卡长是由达木尔等小官吏兼职。防卡兵约有四百名。

寺院是宗教方面的组织实体。寺院首领大喇嘛、德木其、格

斯贵，俗称皇上的三个喇嘛。寺院的大喇嘛由旗府指派。旗府可对寺院直接行文征赋或征喇嘛兵。全旗共有大小寺院、浮屠（塔）等三十余座，喇嘛近4000人。

2、商业

早先，在全阿旗范围内约有大小商号、店铺一百五十余家，解放时，设于定远营的有四十来家，客店十多家。这里的商号，主要是由北京、山西、包头、银川、民勤等地的商贩所经营。其中最大的一家商号是由私人合股经营的“祥泰隆”。这些外地商贩设店经营，或交通不便的广阔沙漠地区来回行商及时送货上门，主要经销各种金银首饰、锅碗器具、绸缎、布匹、粮食、糖果、烟酒、砖茶等日用杂货。同时又向牧民收购牲畜、皮毛及土特产。商贩的上述商业活动，对当时阿旗牧区的生产和生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定远营市场上，布匹、地毯、砖茶、烟酒、糖果、米、面及枣、核桃、柿饼等干鲜水果应有尽有。邻近蒙旗和外蒙古（三十年代以前有来往）也常来人用牲畜、皮毛交换日用品。因阿拉善的双峰驼以绒、肉、畜力兼优而远近闻名，故包头、银川、兰州、武威、张掖等地也常来人收购。当时的定远营城生意兴隆，热闹非凡，以塞外的“小北京”扬名在外。

3、天然资源

阿拉善是一个有丰富天然资源的旗。这里的矿藏资源有：盐、煤、碱、金、锡、水晶石、石棉等。其中，吉兰泰、雅布赖、查汉池、和屯敖包等四大盐湖和古拉本、乌达、胡鲁斯太、上井子的四个煤田均以其丰富的蕴藏量出名。

野生资源有：木材（贺兰山松）、苻蓉、锁阳、甘草、发菜及各种药材等；还有贺兰山的鹿、獐子以及羚羊、猓、豹、狼、豺、黄羊、青羊、盘羊、野驴、野驼、狐、獾、旱獭、兔、

黄鼠狼、艾虎（艾鼬）等。

自1941年（辛巳年）大旱至解放，阿旗再未遇大旱，水草甚丰美。再则，1938年至1949年，阿旗也未遭受大的战乱的祸害。然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马鸿逵的蹂躏及封建官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物价极不稳定，畜产品价格被压得很低，加之狼患成灾，瘟疫流行，人民的处境十分困难。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4、解放前夕的社会状况

1949年春，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地的不速之客频繁进出定远营，很显然，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了。对此，人们感到疑惑和不安。就在当时，美国军事顾问也来阿旗活动。他们表面上装出援助中国的样子，向达理札雅问这问那，弄得达理札雅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国民党国防部要员来阿旗鼓吹什么“要凭借贺兰山的天险与共军决战”，并责令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此外，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及其同伙也从广州、北京、兰州、东北、宁夏等地纷纷来定远营，咒骂共产党，兜售所谓的“蒙古自治”。这些政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达理札雅，一个劲地吹嘘要在阿拉善干一番“蒙古自治”的大事业。1949年春，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来电要达理札雅前去。达理札雅接电后，于农历二月末与郑礼范、罗扎木苏一同到达兰州。此时，德王亲自拜会达理札雅，向他提出了有关在阿拉善实行“蒙古自治”的问题。当时，达理札雅未作答复就搪塞过去了。过后，达理札雅探听了张治中的口气。张对他说：“现在，谁想干什么，全由他自己作主去，德王想在阿拉善搞‘蒙古自治’，就由他搞去好了，你不用管他。”达理札雅听了此言，对于德王的主张，也就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了。

嗣后，德王赴广州从国民党政府要回经费一万银元，遂于当

年八月在阿旗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这样，阿旗局势愈加趋于复杂。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罗相丞）等，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抉择。要么拥护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走起义投诚之路；要么死心塌地追随国民党反动派，走与人民为敌的绝路。二者必居其一。

二、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始末

在1949年决定阿旗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以达理札雅为首的旗政主要人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和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推动下，在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之举的启发教育下，顺乎潮流，深明大义，毅然于九月廿三日率部起义，结束了阿旗二百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揭开了阿旗历史新的一页。

阿旗札萨克达理札雅等人，举行和平起义是有其政治、历史的原因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得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和研讨。

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业已取得决战胜利，蒋家王朝的覆灭已指日可待。1949年1月31日，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巨大影响和感召下，国民党著名将领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得到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的这一弃暗投明的义举，震惊中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这时，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为取得喘息的机会，以便扩军备战，遂装出“和谈”的姿态，委派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为首席谈判代表，在北平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谈判中，因蒋介石拒不接受我方的条件，谈判于1949年4月20日宣告破裂。张治中先生当即脱离国民党政府，留在北平再未回去。4月21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紧接着，我百万雄师以排山

倒海之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长江防线，直捣南京。在这种情况下，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能够正确估量形势。他们认识到，只有走傅作义将军的道路，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的这种抉择，是由于形势所迫，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之外，还应该看到，以下几方面的历史原因是促使达理札雅等发动和平起义的内在因素。

1、1938年2月24日（农历正月25日）夜间，宁夏的马鸿逵出兵攻打定远营后，将达理札雅胁迫押往银川，后送兰州软禁达七年之久。马鸿逵为何这样做，有关这方面情况，值得一提。

1926年，冯玉祥将军赴苏联考察回来后，于9月17日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率部起义。当时，马鸿逵也前去参加誓师大会，被任命为国民联军四路军军长职。不久，他于1929年（民国18年，己巳年）追随韩福渠，石友山弃冯（玉祥）投蒋（介石）。马鸿逵因倒戈有功，被蒋介石任命为十五路军总指挥。

1932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玩弄两面手法，将其黑爪伸向了阿旗。

在1935年间，日本特务机关窜到我西北地区活动。他们来到定远营后，就在“祥泰隆”内设立了活动据点。马鸿逵得知日本人来定远营的消息后，立即密派其姓蒋的参谋前往定远营与日特暗中勾结。当那个蒋参谋返宁时，日特机关提出：“有要事与马鸿逵主席面商”。蒋参谋表示，回去就转告马主席。当时，日特见蒋参谋有为难之色，就威胁说：“在这个问题上，要是马主席犹豫不决，那我们就认为他对大日本帝国不恭。”蒋参谋返宁后就向马鸿逵秉报了定远营之行的情况。听了秉报后，马鸿逵认为，日军有朝一日可能攻进宁夏境内。因此，现与日本人拉上关系的话，日后对己有利。他权衡利弊，拿定主意后，就派专车将日特接回银川，秘密安排在中山公园的公子阁内。他与日特握手言欢，大献殷勤。日特对马鸿逵的态度十分注意，遂提出要与他台

影留念。马鸿逵作贼心虚，害怕被人抓住其勾结日特的证据，不肯合影。可是，他与日特干杯言欢的场面，早已被日特方面秘密拍摄。马鸿逵发觉日特已密拍，着急万分，再三央求日特：“你们提出什么要求，我都尽力而为，但千万不要把我们的照片公布出去了。”日特见目的已达到，表示可以不登。过后，马鸿逵就将日特送回定远营。此事很快被人发觉，不久就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有心保马鸿逵，就电令马鸿逵严加查办暗通日特分子。接电后，马鸿逵吓破了胆，正当束手无策急得团团转时，其四姨太凑过来说道：“你当了一省之主还不知其中的奥妙吗？老蒋明知你的事，却又给你来电，这不是明摆着让你找个替死鬼，开脱你自己吗？”马鸿逵听了四姨太的这番高招，才茅塞顿开，恍然大悟。随即将接送日特的司机以通日特的罪名加以逮捕，又将其秘密处死。然后，将所谓查办情况报告蒋介石了事。就这样，马鸿逵施嫁祸于人诡计，既保自己无事，又堵住了他人的嘴。这还不够，他又向国民党当局密告说，日特就居住在定远营城内，阿旗的当政者也十分可疑等等。就在这时，达理札雅向当局如实报告了日特在定远营的活动情况，并询问当局准备采取何种措施。鉴于此，国民党当局下令陆军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韦明等，率部前往阿旗驱逐日特机关。关、杜二人接令后，率两个团（该师的大部兵力留在宁夏中宁县）进驻定远营，将盘踞在“祥泰隆”的日特全部召集在一起，限他们两小时内撤离定远营。那些日特见此状况，就慌慌张张地乘飞机逃走了。

日本人走后，关麟征师长不但没有指责达理札雅，还安抚说：“日本人又不是你们请来的，用不着害怕。日本人不只是来你们阿拉善，东北和西北的一些地方也有日本人”，

关麟征在定远营呆的时间虽不长，但作了不少事情。首先是破坏了日本人的简易机场。他还召集大、小会议，对阿旗的防务提出极好的建议。他强调指出，要想抗击外寇，必须首先拥有自

己的武装力量。为加强阿旗的防务，他拨给了500支步枪、50000发子弹，同时还强调和赞助了阿旗的军事训练及文武人才的培养。1937年（国民26年）阿旗旗府举办了首届军事技术特别训练班，挑选四十余人受训。另外，还集训了旗保安大队的一百余名士兵。这次训练班的总教官由陈匡担任，教官有叶庄之、李子源二人。当时，旗协理罗恩克巴图、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二人也参加了正式训练。从那以后，达理札雅等非常重视关麟征的建议，多次派青年人赴外地受训。1940年，阿旗首次二十余名青年到国民党黄埔军校七分校受训。八年抗战期间，曾先后选送到南京、重庆、兰州、银川、平罗等地学习的达七十余人，其中有的还大学毕业。以上这些，就是自关麟征从阿旗驱逐日本人以来，达理札雅等为赶上时代潮流而着手开办的一些具体事项。

由于从阿旗驱逐日本人的军事行动中，国民党当局未动用宁夏的马家军（杂牌军），而是将其正规军的第二十五师调进宁夏，以及胡宗南率大军进驻西安，这便使马鸿逵开始疑神疑鬼，坐卧不安了。

1936年（民国25年，丙子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将二十五师调往西安方面。“西安事变”的结局如何，马鸿逵本人心里拿不准。他生怕押错宝，故对这一重大事件迟迟不予表态。后来，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周恩来和宋美龄分别从延安、南京前往西安进行谈判的情况及新闻界对事变结局的预测，看出蒋介石将要获释并仍掌管大权的迹象。于是，他急速发电向蒋介石大献殷勤，还将发报日期往前挪了几天。他在电文里宣称，立即释放蒋委员长，要求张学良亲自将委员长护送到南京，为其恢复名誉等等。他想以此来获取蒋介石的好感。

1937年（民国26年，丁丑年），国民党国防部派郑子献为驻阿旗军事专员。随之马鸿逵以阿旗属边陲要地需加强防务为名，派马鸿宾部马赞良团长率一个团初次进驻定远营。那位郑子献专员勾

结定远营城内暗娼李存存，散布“老天爷要火烧定远营”、“唯有上掌馍山方顺天意”等蛊惑人心的谣言。其用心是将旗王公和居民骗出城，由他一人独霸城池。阿旗旗府立即追查谣言，经刑讯李存存，查清散布谣言系郑子献主谋所为。随后，将其上告当局驱逐之。自此，郑子献怀恨在心，为伺机报复，便与马鸿逵狼狈为奸，向蒋介石诬告了达理札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各族人民中间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揭发汉奸卖国贼的高潮。当时，民众再次揭发了马鸿逵勾结日特的卖国行径。于是，马鸿逵慌了手脚（上一次他将手下的一个司机当替死鬼而搪塞过去了）。这次他又是故伎重演，算计着要找一个大一些的人物作自己的替死鬼，以保脑袋不搬家。为此，他玩弄嫁祸于人的诡计，向蒋介石密告说，达理札雅系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堂妹夫，日本人来阿旗活动，与其有关，此人与政府存有二心等等。蒋介石领悟其用心，密令马鸿逵处置达理札雅，马鸿逵暗自庆幸自己的诡计就要得逞，但又担心事情败露。他先以“有要事相商”为名，企图将达理札雅骗至银川扣留。因达理札雅已有查觉，诱捕未成。后又派一厅长前去行骗，达理札雅仍未上钩。马鸿逵见诱捕不成，遂采取出兵围攻定远营、以武力捉拿达理札雅的强硬手法。1938年（民国27年，戊寅年）的农历正月25日夜间，马鸿逵以重兵突然包围了定远营城。围城兵力除原驻定远营的张海禄团外，又调来宁夏省警备第一旅马宝琳部王有禄步兵团，何玉魁的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配合，并派马腾蛟为总指挥。是夜，双方交火激战。当马鸿逵得知阿旗方面的火力大为减弱之后，又玩弄手法，遂即派其老母及马鸿宾等以调解为名前来定远营。他们来后，对达理札雅佯称：“因我方军队换防中产生误会而交上火了，实在是对不起。我们两家是友邻地区，都是自家人，不要为此事伤了和气”。同时，要求达理札雅缴出武器，当夜就赶到银川面见马（鸿逵）主席。达理札

雅见重兵压境，兵临城下，只好接受了马家的苛刻要求，于30日缴出步枪700余支，机枪10余挺，大炮数门，只给旗保安队留下20支步枪（当时，达理札雅已将库里的枪支转移他处）。随后，达理札雅及其家眷被押往银川。至此，马鸿逵还不满足，又派两个团袭击驻守巴音陶亥的杨额尔和木（杨富存）的一个中队。杨额尔和木率部奋起抗击马家军，后冲出重围撤至阿旗哈鲁乃山一带，免遭被缴械的厄运。

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银川后不久，又移送兰州变向软禁了近七年。此间，马鸿逵在阿旗大施淫威，征收名目繁多的捐税，就连酥油也作为征收之列，从而使阿旗不但在政治上残遭压迫，而且在经济上也蒙受了很大损失，财政空虚，入不敷出。据估计，当时马家从阿旗所征收的驼、马多达七千多头。这种厄运，对于一旗之王的达理札雅本人来说，在政治上、精神上蒙受了难以忍受的奇耻大辱；而对全旗各界层人士来说，从此以后就被置于马鸿逵的直接控制和奴役之下了。从这一惨痛事件中所得到的历史教训，不能不成为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日后顺应历史潮流，脱离国民党，拥护共产党，毅然发动和平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2、1926年，冯玉祥在阿旗磴口巴格建兵站的同时，又在该地域强行设置磴口县，派其姓吴的营长出任县长，在银川到磴口之间修筑简易公路，架设了电话线。但是，当时县的职权一时还难以行得通。后来，马鸿逵任宁夏省主席后（1932年以后），就在磴口县大肆安插其亲信，加强了对该县的控制。马鸿逵在磴口县汉民区编制保甲，并强行规定汉民区和蒙民区由县、旗（阿旗）分而治之。磴口地区本属阿旗地盘，而马鸿逵却将磴口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强制推行由县、旗分割管理的规定，制造民族隔阂，加重回、汉农民的经济负担，接二连三地进行征兵。所有这些，势必引起当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当时，一部分回民因不堪忍受马鸿逵的压榨，由一个姓丁的带头向阿旗政府提出了

归旗的要求。阿旗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一千多名回民于1937年得以归旗。对此，马鸿逵极为不满。对于马鸿逵霸占磴口一事，达理札雅曾多次上告国民党当局，但一直未果。因而，他对国民党当局怨气甚大。

1938年，马鸿逵将达理札雅押到兰州软禁后，于1939年元月在阿旗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该“办事处”与监视定远营马家驻军（一个营）合为一股，成为马鸿逵统治阿旗的一个特权机构。该“办事处”直接掌管定远营近郊的汉民区，并在布固图巴格地域编制十三个保、一百二十个甲，清查户口，征兵、征税，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相继又派温连生、宋清正等，自1942年起在定远营设置“宁夏省军警联合督察处派驻定远营督察分处”，实行粮食封锁政策，严厉稽察粮、盐的进出。他们规定，凡驮盐跑运输者，一把骆驼只准携带一百二十斤粮食，如有超者，一律没收。因此，造成阿旗境内粮食奇缺，老百姓终年不得一饱。

马鸿逵还在阿旗设立“富宁公司”，以贷款、赊欠和行骗等卑鄙手段残酷压榨牧民和中、小商贩。他们趁每年春季牧民生产和生活十分困难季节及一些商贩资金无法周转的机会，放高利贷。而当皮毛上市时，又以他们自行规定的所谓官价低价收购皮毛等畜产品。当时，所谓的官价规定：驼毛每斤二角，羊毛每斤一角，羊皮每张二角，牛皮每张四元。“富宁公司”通过放高利贷和所谓官价等手段，垄断皮毛市场进行盘剥，致使全旗原有的一百五十来家大小商号到解放时只剩下资本稍雄厚的几家了。此外，在居民中先后征兵七次，约征了六百余名。征兵时，实行以马（或驼）代丁的办法，大肆向居民勒索钱财，曾经出现过五匹马（或七峰驼）代替一个兵丁的事。

由于马鸿逵通过其驻定远营“办事处”等机构，对阿旗进行肆无忌惮的剥削和掠夺，致使阿旗地方同“办事处”的对立日趋

激化，甚至达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如1942年，宁夏“办事处”向定远营商会威逼索取数额颇多的军用摊派款项时，当即遭到商会会长杜友民等人的抗议拒绝。“办事处”恼羞成怒，将杜会长逮捕关押。阿旗旗府对此愤愤不平，马上向“办事处”提出质问，并将此事报告了马鸿逵本人。随后，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陈宝峰）等当夜召集紧急会议，断然作出了向马鸿逵开战的决定，由罗额尔和木巴图起草了措辞强硬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旗属各巴格、防卡和寺院，接此通知后，青壮年不分僧俗，立即武装起来，作好打仗的一切准备，就地集结待命。当旗府正要派专人赴各地传达紧急通知时，宁夏“办事处”见势不妙，急急忙忙释放商会会长，赔礼道歉。罗巴图孟柯等见“办事处”服了软，为避免流血事件的发生，随即也就放弃了开仗打算。在当时，只拥有三万多人的阿旗竟作出向马家十万大军开战的决定，这真是人们难以置信的奇迹。它体现了阿旗各界人士在残暴的民族压迫面前，“宁以战死，也决不跪着求生”的坚强意志。

3、国民党当局对阿旗存有戒心，由来已久。在他们看来，以蒙古族为主的阿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相接壤，必须列为特殊地区，严加防范。当首任军事专员郑子猷被轰走后，国民党国防部于1939年又派李自财来阿旗充任专员，设置了驻定远营专员办事处。至1949年，该专员办事处的专员易人六次，副专员易人五次（末任专员是罗大熠）。1939年，为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专员办事处在北部沿边境一线的沙堤阿门（班迪德陶鲁盖防卡）、沙尔扎庙各设一个电台。此外，马鸿逵在巴音毛道也设有一个电台进行监视。

1940年，活动于沙堤阿门的电台被蒙方端掉。鉴于此，专员办事处将边境地区的防务，仍交阿旗地方负责。旗府无奈，只好在班迪德陶鲁盖、雅干、脑干放日布格、呼和陶鲁盖、塔本阿拉达等沿边地区设置五个防卡，派绰特宝充任防卡队长。后于1944年另派段塔勒腾岱、巴德玛吉尔格勒任防卡队长，以防范蒙古人民

共和国。段塔勒腾岱到任后，暗中与蒙方人员来往，向蒙方提供了国民党方面的情况。1945年秋，段塔勒腾岱将持有蒙古人民共和国公文的蒙方信使巴图带回定远营。蒙方信使在达理札雅的住所与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进行了两次秘密会晤，双方交换对时局看法后，达理札雅表示，希望双方经常保持联系，对于蒙方的有关要求，阿旗方面尽量予以满足。随后叫段巴特尔、陈那筭巴图、毛宝音敖其尔三人起草旗府的回信，将信件及回赠蒙方的礼物哈达、地毯等交与蒙方信使（巴图来时备有哈达、衣料等礼物），又令段塔勒腾岱将巴图护送出境。再则，1946年秋，段塔勒腾岱曾将蒙方的巴图吉尔嘎拉带回定远营，安排其与罗巴图孟柯等见面。

在当时，旗扎萨克达理札雅若想给段塔勒腾岱定罪、逮捕巴图等蒙方人员，那是易如翻掌的事。可是，达理札雅等并没有那样做，而是把蒙方代表以宾客相待，愿双方常来常往。这显然表明达理札雅等对共产党并无恶感，流露了达理札雅对人民革命事业的同情心。这一点，也是他们这些人发动和平起义的思想基础之一。

4、1932年（壬申年），达理札雅在其二十八岁袭任旗扎萨克职后，就将其前任扎萨克塔旺布鲁扎勒所器重的副协理罗巴音都古楞、管旗章京白和尚、图布吉尔格勒、副章京尼木德敖子尔、俞耶生达来等老臣，先后准长假将其辞职还乡，随即起用一批新人作为自己的左右臂膀。他分别委任罗恩克巴图为协理，罗巴图孟柯为副协理（后就任协理），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管旗章京，段巴特尔为副章京。临解放前几年，又相继提升罗朝克图格日勒（罗瑞光）、罗布音特古勒德尔（罗永寿）二人为协理衙台吉，陈那筭巴图、白图布巴雅尔为副章京，胡乌力吉巴雅尔、毛宝音敖其尔、左甲木英敖迪布、金巴图道尔吉、齐图门巴雅尔、李斯琴毕力格等为旗府各处（局）长官。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动乱时局当中，以

达理札雅为首的阿旗新官吏班子，能够保持较清醒的头脑，较稳妥地应付和处理了自三十年代到解放期间的许多复杂事件，从而为以后成功地举行和平起义创造了领导、组织方面的先决条件。

达理札雅组建自己的新官吏班子后，为赶上潮流，提出要成立旗区防司令部。国民党当局批准了他的要求，委任他为阿拉善区防司令部少将司令。随后，将原旗保安大队扩编为八个大队，1946年又改为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同时，还相继成立了针对国民党、马鸿逵特务机关及其他机构的一些对抗性机构，以防他们插手阿旗的内部事务。1921年，成立了阿拉善旗稽察局，到1943年该局设税务科。这个税务科，就是针对宁夏“办事处”而设的。另外，加强保安总队的实力以及增设防卡等，也都出于同一目的。

达理札雅虽身为阿旗第十系封建王爷，但他从小在北京居住，受过一定的现代文化教育的熏陶，未娶多房太太，也无抽大烟的恶习，故在本旗旗民当中的印象还不错。

罗巴图孟柯，于1934年（甲戌年）在他二十八岁时出任副协理，后于1946年擢升为协理。他先后辅佐达理札雅十六年，加之主管全旗的军政要务，对本旗的情况十分熟悉。他性格强硬，胆识过人，办事果断。所以，他敢于顶撞马鸿逵，反对马家欺迫阿旗的霸道行径。他不抽大烟，不要钱，也未娶过多房姨太太，在旗民当中的印象还是可以的。他是达理札雅官吏班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

达理札雅等出自上述政治上、思想上的历史原因，决定发动和平起义，并为此举采取了以下步骤和措施。

（1）获悉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后，立即召集旗府要员举行秘密会议，商讨了和平起义大计。

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三人碰头交换对时局看法后，一致认为，有必要召集由旗军政要员参加的会议，以

便统一认识。为此，于1949年2月17日（农历正月20日），达理札雅在自己的住所主持了一次特别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阿拉善特别旗固善亲王阿拉善区防司令部中将司令达理札雅，协理、阿拉善骑兵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罗巴图孟柯，管旗章京、司令部少将参谋陈爱尔德尼巴图；镇国公、鄂日合济农协理达穆林旺楚克（现在台湾），协理衔台吉、骑兵保安总队上校副总队长罗朝克图格日勒，协理衔台吉、骑兵保安总队中校副总队长兼参谋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副管旗段巴特尔、那笋巴图，副管旗章京白图布巴雅尔，副梅林章京胡乌力吉巴雅尔，参领章京、财政处长左甲木英敖迪布等人。在这次秘密会议上，达理札雅首先讲了话；其大意是：眼下国民党在军事上已失利而站不住脚了，终将被共军挤到南方，并有退守台湾孤岛的可能。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一个出乎我们大家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它也给我们这些人指明了一条出路。现阿旗如何是好？有备则无患。到底选择哪条路好，请协理、管旗及其他同仁商讨。达理札雅发言后，众人各叙己见，展开了讨论。具有代表性发言的情况如下②：

陈爱尔德尼巴图说：自民国27年（戊寅年正月25日）马鸿逵出兵攻打我旗以来，我们大家一直处于受马家军事管制的地位，旗王在兰州被软禁七年之久，旗政由此陷于瘫痪。当前国民党方面有撤兵逃跑的迹象。但是，马家军有可能在贺兰山设防，与共军打一阵子。这么一来，我旗百姓势必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作防备。旗官府及我们本人，素与共产党无冤无仇。再说，我们这些人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过去，在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使下，曾逮捕过共党嫌疑李子源、胡开科等数人，但不知其内情，责任不在我们。还有，我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往来，对于他们的人员出入境，也没有设置过障碍。因此，以我之见，共产党来了也未必就加害于我们，还是准备迎接的好。

罗巴图孟柯：我同意陈管旗的意见。再说，共产党正在向全

中国进军，你怕也没有用，因为害怕，我们丢掉祖祖辈辈居住的故土往何处逃？当今天下哪有那么太平的地方等待我们去呢？现在的唯一出路就是，热情欢迎共产党了。据从山西、北平来的商人谈，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可怕。它就要占据全中国了，估计总会讲道理的。现担心的是，如若马家军在贺兰山据险顽抗，将会给我旗带来实难。因此，根据局势的变化，应作好两手准备，一是准备热情迎接共产党、解放军；另一个是，为防备民国27年马家军袭击我旗的事件重演，应将旗府里枪支弹药、金银现钞、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及早转移到巴丹吉林沙漠内藏匿。

左甲木英敖迪布说：我们和那些从东部及其他地方跑来的人不同，他们同共产党对立打仗，惹下了人家，结下了冤仇，人家进来能不找他们算帐吗？我们阿拉善除了牲畜，再没有什么财产可言，想走也没处去。我看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书，凡与成吉思汗为敌的国家，战败后都遭到杀戮；但向成吉思汗投降的国家，不仅原封不动地保住了疆土，还受到大汗的封赏。

达穆林旺楚克说：“能走还是走了的好”。他之所以持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毒害，加之他长期离旗在外，没有亲身遭受过马鸿逵的欺压。所以，他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会议结束时，由达理札雅归纳众人的意见，一致通过了以下四项决议：

（一）为确保全旗的稳定，驻定远营的旗政府、区防司令部、保安总队等诸机构，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迁移他处，军政人员一律不得擅自出逃。

（二）任何人都不得向外泄露有关迎接共产党、解放军的机密。

（三）设法与北平的载涛（达理札雅的岳父）取得联系，以便经常获取北平方面的消息。

（四）密切注视时局的变化，绝不能轻举妄动。

正当这个时候，德王来阿旗要实行什么“蒙古自治”，给阿旗的和平起义设置了一大障碍。待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后，达理札雅寻找机会，于1949年农历6月20日（公历7月15日）在自己的住所主持了第二次秘密会议，全面部署了有关和平起义的具体措施。参加这次会议的，除参加第一次会议的人员全部到会外，新增人员有牌腾达格什嘎副官张仁，佐领衔稽察局长李斯琴毕力格，参领章京金巴图道尔吉等三人。会议保卫有哈斯宝力格（王力德）等担任。达理札雅在会上指出，时局虽多有变化，但国民党失败、共产党胜利已成定局。逃到哪里，最终仍将落入共产党手里。

达理札雅发言后，大家紧接着纷纷议论。大意是：西北军事长官胡宗南丢掉西安已逃汉中苟延残喘；马步芳继续向酒泉方面逃窜；马鸿逵也准备出逃，其子马敦静扬言要同共产党决战，那只是虚张声势而已；西北军阀和我们不同，他们多年同共产党厮杀作战，是共产党的冤家对头，怕共产党怕得要死，我们的情况就不同了，我们不少受国民党、马鸿逵的欺压。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的军事行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无藏身之地可言。然而，傅作义将军已给我们这些人作出了样子。为确保全旗的安宁，唯有迎接共产党才是正路。

对达、罗等人来说，对内部做统一思想较容易，但要真的发动和平起义，谈何容易。许多困难摆在他们面前。首先是，他们从未与中国共产党来往过，不知道和平起义是怎么个搞法，也不知道从何做起为好。其次，他们听了外地人对时局的种种言谈后，也有些疑惑不解。有的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还有的说，共产党说什么也不信任有钱有势的人等等。因受这些议论的影响，达理札雅等尚不能断然下决心，思想上总有点疑虑。

正当达理札雅处于徘徊、观望而犹豫不决时，突然收到其故

交张治中先生的一封信。张先生信中规劝达理札雅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和平，人民希望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太平环境。对我们自己来说，也希望和平。望锐荪（达理札雅的别号）兄相信我的话，走和平之路实属上策。在会上，达理札雅读了张先生的信件后，大家颇受启发，鼓起了和平起义的信心，随即商讨了实施和平起义的具体事项。

（2）秘密成立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其组成人员有：总指挥达理札雅，副总指挥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其他成员有：罗曹格图盖立勒、段巴特尔、罗恩克巴图、白图布巴雅尔、陈那笋巴图、罗布音特古勒德尔、胡乌力吉巴雅尔、左甲木英敖迪布、张达日扎布、金巴图道尔吉、李斯琴毕力格等。其任务是，防止发生反对共产党的不测事件，维持地方的安定，有秩序地实施和平起义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为此，总指挥部特向旗属各地委派可靠人员，分头分片去抓起义的准备工作。

派遣保安总队第一中队长杨额尔克木和副中队长罗阿日斯楞（罗福禧）、总管马图门巴雅尔负责磴口、巴音陶亥、沙金陶亥、道老苏海等四个巴格。

阿旗西部的雅布赖、艾力布盖、巴丹吉林等巴格，由总管乔英、达木尔希日布、副骁骑校德力格尔巴图三人负责。

库白那木嘎、厢根达来、扎哈道兰、察汉布鲁克等南部十个巴格由原助理罗恩克巴图、梅林章京马巴图毕力格、副梅林陶色尔布吉等三人负责。

吉兰泰、苏木图、宗别立等七个巴格由副管旗章京白图布巴雅尔、副梅林吴图布新孟克二人负责。

巴音满尔公等四个巴格由副章京段巴特尔、达木尔巴卡尔、孟克三人负责。

西北部的巴丹吉林、拐子、宗乃、东、西沙尔扎等五个巴格由左甲木英敖迪布总负责，由达西策仁、布音特古勒德尔具体负

责。

此外，还决定克白尔以北八个巴格和沿黄河的四个巴格，由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总负责。

指派金对岱、达希端都布二人，负责将阿旗库存的银洋三万元和政府的历史档案、枪支弹药等重要物品全部运到库列图庙保存，并派保安总队所属的金藏伍带领一个分队坚守。

定远营地区由稽察局长李斯琴毕力格负责防守。

为防不测，严令保安总队所属官兵加强训练，备足枪支弹药和粮草等，严阵待命，听候调遣。特别要防备马家军的袭击和抢掠。

指派要员赴各处分头分片负责后，达理札雅便发出了第一道训令。该训令要求各地：严禁损害共产党的事件发生；防范外地来的不三不四的人制造事端；维持地方秩序；任何情况下都要听从旗府的统一调遣；发现可疑情况要及时报告，等等。

（3）先后向兰州、外蒙古、银川派出代表，表明了阿旗旗府举行和平起义的政治态度。

西北野战军解放天水、宝鸡等地后，马之元部全线溃退，兰州、银川的解放，指日可待。达理札雅等见形势发展如此之快，随即加紧了实施和平起义的步伐。在他们看来，率部起义，似乎不难办到，但问题还不少。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如何引导和掌握旗属千余名官兵的问题。当年夏天，在保安总队所属三中队喇嘛兵中间，开始出现不稳的苗头。这些士兵以“吃不饱，领不到军饷”为由闹事，拒不参加训练。罗巴图孟柯见此状况，未详细调查，就向士兵们宣布：“不服从军令者，按军纪法办”，当即下令将何丹巴（南寺的）、嘎拉登扎木苏（朝克图库列庙的）及承庆寺庙的一名喇嘛以带头闹事为名逮捕关押。经这样整肃，闹事稍有缓和，但到九月，兵营里又开始闹事了。士兵们提出“找郑礼范算帐”、“三中队的个别军官太坏了，要和他算帐”，并

作了出逃的准备。鉴于这种情况，罗巴图孟柯考虑到，硬碰硬可能适得其反，便向达理札雅报告此事的同时，请求他到兵营向士兵讲一讲当前的时局问题以稳住军心。达理札雅应罗巴图孟柯的请求，前去兵营向士兵们讲道：“我们已派专人赴兰州与第一野战军联络去了，眼下虽无音信，但十天之内定有结果。我们都是相处多年的朋友，望大家齐心协力，风雨同舟，再忍耐数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有不测，罪责自然要到我的头上，与大家无关。到那时，你们想逃也能来得及。”在人心浮动的紧要关头，达理札雅王亲自出面安抚众人，稳定军心，这在当时比什么都灵。这样一来，达理札雅等手中牢牢掌握有一支听从其调遣的重要武装力量，从而为和平起义的成功提供了又一个重要条件。

士兵闹事的事件虽已平息，但其他方面的阻力又迎面而至。达理札雅认为，当前寻求争取多方面的支持极为重要。为此，他将自己举事起义的打算告知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当即得到这几个人的赞同和支持。

当时面临的阻力主要有：

（一）1949年7月份，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副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至银川后，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同他面谈。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等去银川与徐永昌会晤。徐永昌便向达理札雅提出了以下三个难题：第一，马家军要在贺兰山设防，与共军血战到底。阿旗方面必须予以大力支持。第二，阿旗保安总队要与李守信的新一旅紧密配合，以期在阿旗草地开展游击战。所需一切军备物资，以空投补给。只要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则是，鉴于目前危急形势，达理札雅还是去台湾的好。

当时，达理札雅答复说，我个人认为，贺兰山的条件虽说不错，但山中无人烟，水源少，交通又闭塞，故大军不便设防作

战。再说，即便贺兰山的工事修好了，黄河防线一旦失守，它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再则，在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饮水奇缺，又无粮食，难以开展游击战。关于去台问题，本人对当局的关照，表示谢意。但需要说明的是，我去台湾确有不少困难。可是，达穆林旺楚克当时却提出自己要去台湾。

9月19日，徐永昌由绥远飞往广州途中又抵银川，将达理札雅叫去，劝其一同飞往广州，但被达理札雅婉言谢绝了。这时飞行员（系达穆林旺楚克的的内弟）定要将其在定远营的姐姐接走。达穆林旺楚克佯称，将其小老婆送至银川就回来，结果到银川后就随徐永昌飞往台湾。

（二）1949年6月的一天，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突然打来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面商要事。对此，达理札雅当即召集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等分析了马敦静的意图。据说马鸿逵将要升任甘肃省省长兼西北副长官的职务。老子走了，儿子继位掌大权，可能要摆架子了。现在马家军在三边失利，已退回宁夏。这次八成是有关重新作军事部署的事。因此我们要设法顶住，不接受其交办的任务。三人商量好对策后，达理札雅遂带李文钦、罗布音特古勒德尔二人去银川。马敦静会见达理札雅时装出一副很谦虚的样子，说道：“家父已去广州，不久将去兰州接任新职。遵照家父之命请您来，商议两件要事：一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军马三百匹；另一件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骆驼一千峰。我们准备在贺兰山构筑防御工事，军用物资预先向阿旗的北寺、南寺、代开、定远营等处运送，你们有支援的任务。达理札雅说：我回去商量后再给答复。他回旗后就同罗巴图孟柯交换了意见，商量了对策。完全拒绝这事，怕是顶不住；全部满足，也有困难。鉴于此，还是采取应付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具体答复是，现牧区旱情严重，大畜膘情奇乏，炎热季节使用骆驼困难更大。因此，我们设法从旗保安总队军马中，支援一百匹军马，其余以

后再说。马敦静只好同意这么办。后来，交付军马时，我们将好马藏起来，拉出乏马任其挑选。结果，他们只挑选七十匹马就走了。马敦静用了自己的运输骆驼，断断续续往阿旗南寺、北寺运进来一些粮食，而大部分军用物资未能运进来。因而，他们在贺兰山建立一条防线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

（三）当时，定远营处于国民党驻定远营专员办事处、宁夏办事处和驻定远营特务营等机构及军队的严密监视之中。特别是，马敦静将其特务营扩编为一个加强营，营下设装备全新的五个连，和迫击炮排对当时的阿旗定远营威胁极大。

（四）正当由德王一手拼凑的“蒙古自治政府”宣告成立，开始行使权力时，兰州解放已迫在眉睫的消息（1949年8月下旬）传至阿旗。该“蒙古自治政府”的官员吴鹤龄、扎奇斯钦、巴雅吉呼、德古来、吴古廷、吴熙宪等慌慌张张搭机飞往广州、台湾。此后，德王召集其剩下的亲信密谋后，就向达理札雅提出一同撤离定远营，逃往西北牧区的计划。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反对逃离定远营。他们说：现兰州已获解放，宁夏眼看也解放了，逃是逃不出去的，还是迎接共产党为好。德王听了此言，很不高兴。他再三说：我们有时间可出走，天下也有我们的去处，何必干等着要投降共产党呢？现在是非常时期，应打起我们蒙古人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旗帜，加强蒙人的团结，为民族的事业奋斗下去才对。但遭到了达理札雅等人的拒绝。德王见事如此，就愤愤地说：“与其寄于他人篱下，还不如自寻出路的好”，说完就与其同伙于1949年9月20日带上“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和公章出走定远营北上。德王直奔图克木庙与李守信的新一旅匪徒会合一事，又成了阿旗的一大祸患。

（五）1949年9月初，李守信属下新一旅由宁夏省陶乐县退至伊盟的鄂托克旗。9月中旬，他们强渡黄河，进入阿旗的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并继续向定远营方向移动。当达理札雅、

罗巴图孟柯等得知此情后，立即派总管杨宝山（达虎藏武）去新一旅驻地，向旅长苏和巴特尔表明阿旗态度。杨宝山说：“阿旗方面决定和平起义，已派出代表欢迎解放军。因此，不容许你们在我旗境内打仗，要求你们离开此地。望你们认清形势，及早向解放军投降为好”。但新一旅的头头们并没有听从杨宝山的劝告。9月20日，该旅参谋长白广卿亲自跑到水磨沟，派人到定远营要向德王请示有关该旅的部署问题。

达理札雅获悉后，当晚派罗布音特古勒德尔赶到水磨沟，会见白广卿，向他表明了阿旗方面坚持和平解放，反对在旗境内作战的立场。同时告诉他们，德王已于今天下午由定远营出走，奔赴图克木庙。望他们最好是就地迎接解放军。白广卿等得知德王已北上，就率部向图克木庙奔去。这次的危急，就这样渡过了。

1949年9月22日，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的特务营哗变后，企图洗劫定远营城。当天下午五时许，特务营营长孙明楼突然给达理札雅打来电话。他在电话中威胁说：“我已管束不住部队了。他们提出，要王府每人给发五十块银元及便衣，若不答应，他们上街自行解决。”不久，特务营开始围攻城池，向城内开火。旗府方面当即采取紧急措施，组织起包括保安队、职员、延福寺喇嘛、居民在内的六百余人的队伍，派兵扼守营盘山、城墙、三座桥梁等要害点，全面防守定远营，同哗变部队进行了战斗。同时，连夜派人赴附近巴格、防卡紧急行文，命令他们除组织人马增援定远营外，严加防范马家散兵的骚扰。此外，还派商会的周生祥、沈治元等与孙明楼部进行洽谈。谈判中，旗府提出每人可发二十块银元。但哗变部队绝不接受这一条件，而且扬言要炮轰王府。达理札雅遂将家眷转移至其他地方，自己在段巴特尔、金对岱二人陪伴下，留在王府处理军政要务。待旗营盘山守军得到补充后，旗府方面立即向哗变部队进行猛烈还击，从而挫败了他们包围城池的企图。午夜过后，达理札雅向哗变部队发出了强硬的

通告：我方对于你们的哗变骚扰早有防备。现命令你们赶快解散回家，沿途不得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由政府给你们每人发二块银元（实际上未给），接通告后，哗变部队于天亮前很快四处逃散了。由于阿旗方面击溃了马家哗变部队，使阿旗又一次化险为夷，城内历史文物及七千多居民的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还收缴了二百支步枪、六门六零炮、二十余挺轻机枪。这次马家军的哗变，实际上是孙明楼等趁火打劫，企图捞一把的妄想而已。

傅作义将军的义举和张治中先生的诚恳劝告，对达理札雅等发动和平起义起到了很大的启发教育和鼓舞作用。阿旗渡过上述种种难关后，采取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措施。

1、首先，为迎接西北野战军、会见彭德怀司令员，决定派旗府副章京陈那筭巴图和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上校副主任朱门二人，代表阿旗和达理札雅本人前去兰州接洽。七月中旬，朱门先期到达兰州；陈那筭巴图随后动身前往，途中因散兵游勇骚扰而受阻，至八月中旬尚未到达。为此，阿旗方面电令阿旗驻兰州办事处上校主任张德熙代替陈那筭巴图会同朱门欢迎西北野战军。8月26日，兰州得到解放，阿旗代表朱门等随同兰州各界民主人士，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并晋见了彭德怀司令员，递交达理札雅的手书，表明阿旗政府举行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态度。对此，彭司令员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对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站到人民方面的行动，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彭司令员又指示他的联络部长范明，让他转告朱门等人跟随十九兵团赴宁夏。

在朱门等临行前，彭司令员又让范明部长向他们转告以下指示，让回去向达理札雅转达。彭司令员说：“对于达理札雅先生提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行动，我们感到十分满意，鉴于此，我们已决定，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朱门等随大军于9月27日来到银川，然后连夜返回了定远营。次日，朱门把在兰州欢迎西北

野战军的情况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示，一一向达理札雅等作了详细的汇报，从而解除了他们的思想疑虑，更加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9月28日，朱门以其个人名义向十九兵团政治部副主任潘自力等发了电报。电文大意是，阿旗局势很稳定。达理札雅承蒙诸位的热心关怀，本人感激之至，请转告前去迎接解放军的我旗代表罗瑞光等，若公务办毕，即刻返旗。

对于上述情况需补充的一点是，派朱门赴兰州后，因多日不见回信，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焦虑不安。二人商量后，随即派陈那筭巴图、段塔勒腾岱二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同蒙方磋商有关和平起义事宜，以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们二人于9月21日从定远营出发，日夜兼程赶赴蒙方边防站，说明来意。边防站方面立即上报了此事。过了好几天后，蒙方南戈壁省的有关领导人桑布才前来接见他们，向他们转达了蒙方的意见：“你们用不着害怕。蒙古人民共和国与阿拉善旗双方和睦相处本身就体现了蒙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你们热情欢迎中国共产党就是了。”说完这句话，他设便宴招待了一番后，就将陈、段二人打发回来。当他们二人于10月上中旬返回定远营时，阿旗已经和平解放了。当时，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派陈、段二人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是，想利用以往双方友好相处的关系，让蒙方出面将阿旗方面发动和平起义事转告给中国共产党，从而沟通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2、1949年9月22日，阿旗政府指派副协理、保安总队副总队长罗曹格图盖立勒（罗巴图孟柯之兄），副骁骑校、总管司鹤鸣（乌图那筭）、副骁骑校张光耀（又名张光泰）为代表，蒙太为翻译前去银川迎接十九兵团，并表示，阿旗扎萨克达理札雅即将举行起义，接受和平解放。9月23日，他们前往仁存渡，拜见杨得志司令员，向杨得志司令员报告了阿旗政府派朱门、张德熙二人赴兰州的经过，表明了举行起义、接受和平解放的态度（见图1）。同时，向杨司令员呈递了由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署名



①阿拉善旗代表在仁存渡欢迎杨得志司令员合影。

的阿拉善旗政府的代电及礼物。代电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

（善秘字第120号）

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往宁夏欢迎解放军由西北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侵迭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解放西北万众腾欢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筭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祷 阿拉善特别旗政府扎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漾（二十三日）

9月26日，罗曹格图盖立勒发回电报报告了欢迎十九兵团和会见杨得志司令员的情况，并说，已完成赴宁的使命。

1949年10月3日，杨得志司令员向达理札雅发来复电。电文如下：

定远营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扎萨克达理札雅

来电敬悉对阿拉善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

正因为如此，将阿拉善政府发出起义通电的日期，即1949年9月23日定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日。

3、与德王出走的同时，从东部流窜过来的李守信部进入阿旗境内。当即达理札雅向全旗发出第二号训令。其大意是：飭令各巴格、各防卡加强对东部流入旗境内的李守信部的警戒，以确保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及地方秩序不受其侵害。

4、1949年9月23日，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等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阿拉善旗政府业已和平起义。

为消除国民党在人们当中的政治影响，在群众大会上还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现我旗政府已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从现在起，我们将实行与过去截然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大家不要惊慌。今后，政府所属各机关，军政人员，商号及各界人士，一律不准挂出和佩带的国民党党徽标志的徽章、帽徽等；国民党的旗、蒋介石的画像，要一律销毁；将原有的旧标语洗刷掉，贴出欢迎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的新标语；再不准使用国民党的印信和中华民国的年份。当大会宣布上述注意事项后，全定远营立即投入了消除国民党影响的活动。

为了使牧区人民深入地了解阿旗和平解放的重要意义，并安心从事牧业生产，达理札雅于10月2日派出巴得玛道尔格、善巴

却得尔、曹格扎雅、胡巴图巴雅尔等四人，分赴各巴格、防卡向牧民大众宣布阿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发动了起义，为此，发出了第三道训令。训令原文如下：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

定秘字195 196 197

事由 为派该员等前往各防卡宣布脱离广州政府
服从毛主席领导而安地方闾阎由
令蒙员巴得玛道尔格善巴却得尔曹格扎雅
巴图巴雅尔

查本府为安定地方早日促进民主建设起见业已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并已派代表与解放军当局进行接洽结果甚为圆满现解放军业已开抵旗境清除逃入本旗之散兵游勇该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对于地方秋毫无犯仰该员至各防卡转达各边官卡长应严守岗位密切协助以靖地方而安闾阎并希转知蒙胞各安生业勿相惊扰是为至要切切

此令

札萨克 达理扎雅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

以上这些乃是阿拉善旗和平起义的全部经过。

三、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所作的几项主要工作

1、1949年9月24日，解放军十九兵团的一个营（又说一个团）在徐成功的率领下，为追击马家军的散兵由宁夏中宁县的石空进入阿旗境内的腰坝地区（见图2）。当时，驻守三关、腰坝地区的旗保安总队五中队队长罗阿勒德尔朝克图（罗步云）立即代表阿旗政府和达理扎雅，出面欢迎徐成功团长。他将徐团长等接进自己家里住下，还拿出个人的二十只羊款待了该营的指战员。



②杨乌力更达赖代表巴伦别立巴格牧民向徐成功团长献旗。

罗阿勒德尔朝克图在接待解放军的同时，派人向达理札雅报告了解放军来腰坝的情况。达理札雅得此消息后，立即派副佐领胡乌力吉巴雅尔、何兆麟、李文钦、戚涛、李树德等人为代表赶赴腰坝慰问解放军。此外，还派专人用汽车送去二百只羊（从巴伦别立运去的）、粮食、香烟等慰问品。接着，达理札雅邀请徐成功团长来定远营，互赠手枪留作纪念。很显然，徐成功的一个营来阿旗，不是为解放阿旗而至，而是另有追击和搜索马家军散兵的任务。

2、根据解放军十九兵团的建议，达理札雅召集紧急会议，责成专人将国民党国防部驻定远营的军事专员罗大焯、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驻定远营调查专员王君惠、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主任马丽山、马鸿逵派驻定远营特务营营长孙明楼、原工兵营

营长冯大庆、宁夏省驻定远营银行行长邢椿年、马鸿逵的侄子马家驹等予以逮捕，连同缴获的武器弹药一起用专车由上尉副官王励德负责押送至腰坝徐成功团长处。徐团长仍将专车交与王励德押送至银川。

该徐成功团并非为解放阿旗而来，这一点可以由达理札雅发给陈爱尔德尼巴图的回电内容完全证实。当时，该陈驻克白尔地区，负责本旗东部地区的工作。电报经磴口转至陈爱尔德尼巴图那里。电之文下：

磴口陈章京来电悉（一）此间安定如常（二）朱主任返定曾代表我旗向解放军接洽并且彭副总司令对我旗甚表好感（三）解放军一营从石空抵腰坝由徐团长率领任务为搜索马家队伍徐团长经余邀进城洽谈今晨返腰一切甚好（四）派赴宁代表罗瑞光等三人约明日返定（五）现一切待商望速回返为盼 锐孙申（九月）艳（二十九日）

9月21日，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以个人名义，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同志发了致敬电。电报发出后，过了几天，收到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名义，邀请达理札雅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复电。但因收到复电稍晚了两天，达理札雅未能前去参加会议。后来查明，达理札雅之所以未能及时参加会议，完全是由于阿旗电报局长尤剑秋有意扣压中央复电所致。

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阿旗政府给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发去了致敬电。电文如下：

毛主席暨各位副主席钧鉴：我们在定远营边疆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不胜庆幸
谨电庆贺并申竭诚拥护之忱恭请鉴察

阿拉善旗政府 十月一日

10月1日，达理札雅接到杨得志司令员的邀请后，随即准备带李文钦、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戚涛等前往银川会晤杨得志

司令员。因随员的人选问题，达理札雅事先未同旗政府其它要员商量，故在白海凤、何兆麟、巴文峻、戚涛等随同去银川的问题上发生了一番争执。本旗一些主要官员认为，阿旗的和平解放，是我们阿旗人努力的结果，功劳应属于阿旗人。现在到了出头露面、享受荣誉的时候，外来的官反而跑到了前面，这太不符合情理吧？对此，达理札雅感到很为难，遂决定让李树德也随同前往，并叫李树德出面做其他人工作。达理札雅为带李文钦等人前去银川，对旗政府主要官员说：“他们几个人当中，有的是我的老朋友，对共产党的认识比我们强；有的是‘西蒙自治政府’的主要成员；有的考虑事情周到，应对有方。带他们去，对我们有利”等等。经多方解释，加之旗政府官员考虑达理札雅的面子，才勉强同意（另一种说法是，朱门、齐文魅、段巴特尔、李文钦、张钦武也作为阿旗代表与上述几个人一同前去）。



③达理札雅在银川向杨得志司令员献旗。

达理札雅一行11日抵银后，受到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领导人的热情迎接和盛情款待(见图3)。达理札雅深受鼓舞，从此彻底消除了疑虑心理，心情格外舒畅了。在银川期间，他多次同省委书记潘自力等主要领导人进行会谈和个别谈话，从而初步认识了共产党的政策，拟定了有关本旗事务的一些原则性规定。

在会谈中，宁夏省党政领导人对留在定远营的“西蒙自治政府”的成员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对德王和李守信的军队却非常注意。他们主张采用和平的方法把德王、李守信争取过来。为此，当时研究决定，由达理札雅负责争取德、李早些回来，宁夏方面不派军队进攻。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宁夏省决定派省军区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旗协助工作。他们回来时，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目标，脑子里也有些东西了。达理札雅返旗后，向旗军政人员传达了会谈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

关于阿旗和平起义，宁夏省领导人表示全盘接受；阿拉善旗的行政机构暂不变；阿拉善旗的军队建制暂不变；尊重阿拉善旗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阿拉善旗逐步实行民主建政；保护阿拉善各族人民的财产、牲畜不受侵犯；阿拉善旗原有的军政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达理札雅继续主持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直至民主建政以后。

3、阿旗政府以宁夏省委处理阿旗问题的八条意见为准则，有步骤地着手进行了政府体制改革和军队整编工作。

为了提高干部的思想认识水平，首先开始组织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毛主席的《论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论著。

1949年12月，宁夏省派了以王延、云祥生为首的工作组，到阿旗工作。工作组的成员有郭全德、黄占陆、张结和马鸿彪。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郭全德任组织部长。从此，阿

旗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开始有了明确的目标。为了更好地开展阿旗的工作，宁夏省于1950年决定将阿旗作为直辖旗，并任命了阿旗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

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云祥生为第一副主席，罗巴图孟柯为第二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第三副主席，委员有：曹动之、左甲木英敖迪布、段巴特尔、白图布巴雅尔，陈那筭巴图，白海风、罗恩克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罗曹格图盖立勒、巴文峻、何兆麟、张仁、罗永寿、齐文魁、李富海、李文钦、朱门等。秘书长由巴文峻兼任，副秘书长为李文钦、朱门。

旗人民政府下设政务处、财政处、文教处、秘书处、生产事业处（后改为建设处）、公安局等行政职能机构及下属科室。原有的三十六个巴格，也都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阿旗原来的骑兵保安总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归宁夏省军区直接指挥。总队长为罗巴图孟柯，副总队长为罗朝克图格日勒，政治委员曹动之，副政治委员朱子春，参谋长罗布音特古勒德尔。

在宁夏省委和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根据民族区域自治原则，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发出的〔内人〕字66号令，于1951年10月9日，将原“阿拉善霍硕特旗人民政府”改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原阿拉善旗政府几经改组，彻底摧毁了统治阿旗数百年历史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阿旗人民政府自和平解放至1952年的短短的几年当中，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①1950年，人民政府坚决镇压了匪首郭永胜（又名郭栓子）在阿旗境内的同伙，处决孟巴特尔等，从而粉碎了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图在宗别立、乌达、布固图及定远营一带发动叛乱的阴

谋。

②将全旗划分为六个苏木，成立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对牧区工作的领导。

③实行牧主、牧工两利政策，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调动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采取了扶助贫苦牧民、建立国营商业网点、稳定物价、提高畜产品及土特产收购价格等一系列措施。同时，开展打狼运动及防治疾病、国家投资打井等项工作，从而使全旗牲畜总头数猛增，人民生活得到迅速改善。

④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汉族居民有房屋所有权，③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

⑤配合宁夏土地改革，将旗属半农半牧区的磴口等巴格的近三万亩旗地、庙地分给了农民。

⑥开展抗美援朝的捐款活动，全旗共献牲畜折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多万元。

⑦1951年冬，召开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⑧动员全旗人民，支援西藏骆驼八千多峰。

⑨在西北地区民族防疫工作组的指导下，大力开展以防治地方病和性病为主的医疗防疫工作，为确保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人畜两旺打下了基础。

⑩在人民生产发展、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治安状况好转的基础上，于1952年，在定远营举办了五万多人参加的盛况空前的全旗那达慕大会（1937年以来中断十五年），会上除了开展具有民族形式的摔跤、赛马、射箭及其他体育运动项目，还有演唱革命歌曲的文艺晚会。此外，还进行牲畜改良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这次盛会，充分体现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生活得到了日益提高。

4、用武力围困德、李匪部，促使其在党的政策的威力和感召下就地缴械投降。

德王到图克木庙后，就着手整顿部属。他对其部下人员宣称：“我们大家只要同心协力，生死与共地奋斗下去，渡过了当前的难关，胜利就将属于我们。达理札雅副主席是个毫无民族远见的人。他不思与我等携手合作，反而另打旗号，投向共产党方面去了。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德王部下听了他这番话，对达理札雅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德、李匪部在阿拉善旗北部所到之处，大肆掠夺牧民的财物、牲畜等。为保护牧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段塔勒腾岱组织起三十多人的民防队，同德、李匪部作战。同时，派人向旗人民政府报告了情况。

此外，陈爱尔德尼巴图也将新一旅为非作歹的情况报告了政府，阿旗人民政府得到了上述情况后，立即向宁夏军区作了汇报。宁夏军区派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旗，与达理札雅商议部署了规劝德王等投诚的问题。随后，指定罗曹格图盖立勒为阿旗北部地区（沙尔布尔都以北地区）的前线总指挥，段巴特尔、左甲木英敖迪布、罗都古尔扎布为副总指挥，组织了三百五十余人的兵力，将德、李匪部挤到拐子湖一带围困。他们先后打了十多次小仗。达理札雅为争取德王及早归向人民，以其个人名义写信给德王，对他深明大义，阐明党对投城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望他亲自赴宁进行谈判。德王接到此信后，派陶布新为代表前去宁夏进行谈判。谈判中，宁夏省领导人向德王代表反复宣传和解释党的政策，要求德王亲自来宁一谈。正当德王派其秘书长吉尔格郎、副师长孙明海、陶布新再赴定远营进行判谈时，德王又接到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要其赴蒙古进行会晤的邀请书。德王随即带李守信、陶克陶等人于1949年12月29日去蒙古人民共和国，不久，被蒙方逮捕。这时，适逢白海风开会回来带回乌兰夫主席有关争取德王投诚的重要指示。阿旗人民政府立即派专人赶到拐子湖，向德王部属传达乌兰夫主席的指示精神。我方再三争取工作，吉尔格郎、孙明海，陶布新等人开始逐渐相信党的政策，决

定弃暗投明。这样，他们于1950年3月份放下武器投诚。当时，在拐子湖投诚的德、李人员约有一千二百多人，共缴出各种长、短枪支一千三百多支，轻机枪若干挺。韩莎嘎拉坚持顽固立场，率一百余人经额济纳旗窜入马鬃山后，被解放军歼灭。此外，还有一百余人离开拐子湖往家乡逃去，中途向解放军投降了。

总之，阿拉善旗是属长期以来基本上未裹进各种战乱，又未与共产党作对，拥有其独立的自然经济和数百年历史的一个安分守己的特别旗。在三、四十年代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它又是一个拥有自己较稳健的领导班子的旗。该领导班子能够清醒地估量形势，也能够较稳妥地应付一些不测事件。作为这个领导班子的代表人物旗王达理札雅，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马鸿逵的直接控制下，长期身处逆境而怀有怨恨和不满情绪，全国解放前夕，他在傅作义将军率部起义的直接影响和张治中先生的诚恳启发教育下，决心归向人民，毅然率部起义，减少了战争的破坏和无辜的牺牲，使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了保护。使阿拉善旗完好无损地得到和平解放，从而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注释

①定远营：当时定远营尚未建立，故无此地名。

②是参加会议的当事人的回忆。

③汉族居民的房屋所有权：解放前，流入阿拉善旗的汉族居民，个人不享有建私房权利。当时，这些人只能借他人名义建房，或租房居住。

(额尔敦仓 翻译 朝格图 审校)

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及前后历史概述

张宏林

额济纳旗是我曾经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多年来我一直想把自已在那里的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经历的事件记录下来，为史学界和文教界提供一些历史素材。但是由于自己思想水平和文化程度有限，很难立意成章，

最近我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编排整理了这份“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及前后历史概述”，这也是本人晚年能为国家所尽的一点义务，请有关读者和知情者提出宝贵意见。

我所知道的额济纳旗

（一）额旗解放前概况

额济纳旗，地处我国西北边陲，是我国边防重地。全境以弱水（额济纳河）冲积而成的戈壁沙漠为主。东连阿拉善草原，南接甘肃，西邻新疆，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毗连。额旗面积宽广，沿额济纳河及居延海一带水草丰美，是天然的良好牧场。居民以蒙古族为主体，还有汉、藏等民族。长期以来，额旗人民过着以牧为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全旗的经济主要以畜牧业为主。

据说额旗土尔扈特来额济纳定居迄今约二百余年。一七二九年初建额济纳土尔扈特旗，后改称额济纳土尔扈特特别旗。该旗王爷（扎萨克）是全旗政治、经济、军事的最高统治者，按清朝

官阶为郡王。下设章京、梅林、章盖、扎兰等职。解放前全旗共有人口约千余，语言为蒙古语，奉信喇嘛教，一切风俗习惯类同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王爷职位的继承为世袭制。

民国初期，额旗的王爷是图布森巴雅尔（塔旺嘉布的嫡兄）。图王与塔旺嘉布兄弟早年分居，图王无嗣，将塔旺嘉布之子登达布过继门下。一九三六年图王去青海塔尔寺拜佛，因病卒于青海。经报蒙藏委员会批准，由塔旺嘉布继承王位，并以塔王为首成立了额济纳旗政府。一九三七年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了额旗防守司令部，塔旺嘉布出任少将司令，苏剑啸任上校参谋长。

（二）额旗政府

额济纳旗政府是该旗最高的行政领导机关，隶属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塔旺嘉布接替王位后出任扎萨克（旗长）。旗政府的其他官员一般由该旗的章京、梅林、章盖、扎兰出任，还有文书秘书、博什哈及王爷卫士、勤杂人员等。在旗政府任职的人员大约有三十余人。旗政府一般是由上述官员轮流住在旗政府，处理日常事务，如遇重大问题必须请示扎萨克批办，必要时召开政府会议研究处理。在旗政府供职的人员无薪金收入，仅供给部份粮食作为补贴。

（三）额旗防守司令部

额旗防守司令部是一九三七年由国民党中央批准成立的，系该旗最高的军事武装组织，（其编制情况详见附表）。

起初，防守司令部的官兵均无薪饷，仅负担伙食。后来由国民党第八战区拨给少量经费，以供从甘肃高台军粮库购买小麦之需。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军政部派往额济纳防守司令部任参谋长的徐汉襄（少将高参）到任后，才开始由酒泉军粮仓库发给无偿

军粮，并由八战区增拨军需经费和军装等。塔旺嘉布为了维持和提高防守司令部官兵的生活待遇，通过缩编等方法对司令部人员进行了调整，并将节余的粮食给每个军官增补四十——六十斤面粉。到四七年每个官兵发给几元法币（金元券），做为伙食补贴。这种既非薪金制又非供给制的办法一直实行到四九年额旗和平解放。解放初期开始实行半供给制。

防守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地方政权及守边治安等。

（四）塔旺嘉布其人

在我同塔旺嘉布交往的过程中感觉此人性情直爽、襟怀坦荡。他平易近人，没有达官贵人那种专横跋扈、盛气凌人的官僚作风。我与塔王之间的私人关系是很深的。他有嗜酒的习好，喜欢交往。除履行政府公务外，经常到农牧民中间走访。因为他耳闻目睹了军事专员公署里国民党分子对少数民族人民的歧视与压迫，所以他希望能有一个民族平等团结的新天地。后来因受苏剑啸、周仁山等共产党人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向往光明，追求进步，这些思想为他后来能决然起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五）驻额旗的外来机构

一九三六年绥新汽车公司在额旗瓦窑陶来设有汽车站。国民党中央交通部在瓦窑陶来设有电台和邮电代办所。三七年交通部电台移驻西庙。

蒙藏委员会于一九三六年曾派一名委员常驻旗政府，三九年调走。四一年又派仲启明做为协赞专员驻在旗政府，名义上协助旗政府工作，实则监督旗政府的活动，每月定期向蒙藏委员会交一份书面汇报材料。

一九三七年国民党中央在额旗设立了军事专员公署，驻地在西庙。专员公署共有官兵五十余人。第一任专员是李才贵，以后

陆续由郭永年、杨焕文、吴继高等接任。解放前夕，由周国良任专员。该专署后改为军事专员办事处。公署人员除部分专职军事人员外，尚有部分国民党军统特务。

新疆省在额旗乌郎川津（乌兰川吉）设立了办事处，该机构的负责人李参谋，蒙名宫布扎布，还有石参谋等数人。从表面上看，该办事处的主要业务是经营“苏联毛毯、皮靴、糖果、茶叶”等商品。该处有汽车一辆，常常出入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具体还干些什么不详，大约在四六年撤销。

一九三九年甘肃酒泉驻军十八旅派一个团在额旗西河的道劳卧铺。该团进驻西河后，大兴土木，建造营房，故道劳卧铺后改名为建国营。四〇年该团派两个连到河东给塔旺嘉布盖了一所约数间的住宅。该团驻额旗名义上是防守边界，实际上是监视限制旗民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往来。全团千余官兵长期驻守额旗，给地方政府及旗民带来沉重的负担。每月旗政府须派六个牧工、四十峰骆驼来往于酒泉额旗之间，为该团驼运给养。该团不承担运输费用和牧工工资。若按照当时的运费计算，每月两千多元，一年下来仅此一项竟达三万多元。该团四六年撤走时仍留下一个连看守营房。在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里，给地方政府及当地牧民带来的负担是难以计算的。

一九四三年国民党酒泉党部驻额旗区党部成立。第一任书记长是徐颐和（外号长胡子）。后由张文弟接替，汪漪之为最后一任书记长。该党部工作人员约五、六人，四九年撤销。

一九四四年国民党中央教育部派校长、教员来额旗设立了国立小学，接管了原旗立小学。校长孔宪珂，后由刘公操代替。开学一年多，约四六年，仍由旗政府接管，校长即调回内地。

上述驻额旗的机关、部队，除极个别业务机构外，大多数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出机构。这里边人员背景复杂，身份莫测，他们彼此间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对外则跃武扬威，推行大汉族主义，

实行愚民政策，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对于地方政府滥用职权，发号施令，对地方工作人员和少数民族人士排斥打击，侮蔑陷害。在所谓协助地方政权工作的幌子下，立党营私，专权舞弊，大搞特务活动。尤其是专员办事处与地方之间矛盾尖锐，多次提出同旗政府合署办公，企图全面控制地方政府。

（六）额旗的商业、交通运输等情况

额旗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广人稀，所以商业萧条，交通运输极端落后。

策克区是该旗的商业集中地，曾有几十户内地商贩在此设商买卖，连建国营也曾先后设立过商号，买卖也曾繁荣一时。当地牧民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边民多用皮、毛等畜产品到各商号换取日用商品，商号把畜产品运回内地出售，重新购买新的商品运回策克区等地方出售或交换。这种商品交换方式是该旗商业的主要特点和形式。“七·七”事变以后，中蒙边界双方加强巡逻，限制私人往来。旗政府对外蒙越边人员也约法三章：第一次越边来额旗经商者给予警告，人、驼放回；第二次越边者，人放回，驼物没收；第三次越边者，人、驼、物全部扣留，不予放回。自此外蒙越边来策克区做生意的人逐渐减少，各家商号惨淡经营，朝不保夕，相继倒闭内迁，仅剩几家小商号苟延残喘，维持现状，解放前夕也都相继离去。

交通运输除原绥新运输公司从绥远到新疆（额旗有站）的班车外，仅旗政府有两辆卡车往返于额旗酒泉之间运输物资。牧民自购粮、物等主要依靠骆驼运输。至于文体事业就更谈不上了。

（七）苏剑啸与额旗王爷的关系

苏剑啸同志早年参加革命，系共产党员，三八年离开额旗到锡、察二盟工作，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被土匪杀害。

我是一九三七年冬天到额旗防守司令部保安大队任军事教官时结识苏剑啸的。当时苏剑啸同志在旗政府当秘书并兼任防守司令部参谋长。他是满族人，祖居北京，其父苏永格于满清年代曾在兰州总督衙门任文职官。塔旺嘉布的父亲达什王爷和苏永格由最初的事务性来往发展为结拜兄弟。自此之后，两家往来频繁，关系密切。民国期间，苏剑啸全家从北京迁到甘肃省金塔县定居。因父辈关系，塔王与苏氏弟兄之间关系挚密。苏剑啸之二弟苏宝峰是塔王的代表，负责对外联络。三弟苏斐然后来是额旗防守司令部的参谋长。总之塔王对苏氏弟兄是十分友好和信赖的。苏剑啸临离额旗前，介绍周仁山同志到额旗接任旗政府秘书。

（八）周仁山同志在额旗

周仁山又名周翔生，陕西省人，系共产党员。他于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后，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三六年来过额旗，同苏剑啸住在一起，不久返回内地。一九三九年经苏剑啸介绍再次来到额旗并担任旗政府秘书。周仁山同志在额旗工作期间，曾多次到酒泉、金塔及宁夏银川等地，具体情况不详。

我和周仁山同志共事两年有余，私人交往密切，他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公务之余常到我房中聊天谈心。在相互接触和交往中，他了解到我内心忧郁、精神不振以及家庭所遭受的不幸后（我父亲被土豪劣绅诬陷入监禁，母亲郁愤逝世，前妻不幸病故），主动从思想上关心我，精神上鼓励我，并指出了这一切都是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造成的，激励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相信这一切总有一天会改变的。

对周仁山同志的关怀，我从内心是感激的。在这远离故土，举目无亲的塞外边陲，我把他视为良师益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议论抗战形势，他向我们讲述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问题，他还说国民党是迫于形势、勉强抗战的，他们对抗战的态度是消极性的“应战”（应付抗战），实质上是等待、让步、妥协以至投降。

我记得在他离开额旗前夕，再次向我讲述了抗战的形势，他说：“只要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军民团结，一致对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人民。将来，建立独立自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消灭剥削，打倒土豪劣绅，到那个时候你个人的冤仇一定会得到伸张。”

周仁山同志的教诲，对我启发很大，使我对中国的前途有了新的认识。

周仁山同志在额旗任职期间，经常深入牧区向牧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他号召牧民提高警惕，防奸防特。我一直跟随他当蒙语翻译，还按照他的安排召集保安队官兵由他进行抗日宣讲。他一再强调眼下国难当头，保安队官兵一定要加强团结——官兵团结、军民团结、民族团结、本地蒙族同外蒙籍蒙族之间的团结。宣讲内容还包括实现国共合作的意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三民主义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他很注意激发保安队官兵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热情。在周仁山同志的教育下，保安队官兵之间漠不关心相互排斥的局面有所好转，当地蒙族与外蒙籍蒙族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明显的改变，抗日爱国的情绪在保安队官兵中日渐高涨。

周仁山同志在进行基层宣传的同时，对塔旺嘉布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因塔王乃一旗之首，属于民族上层人士，所以他的一言一行对下边影响很大。他希望塔王能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提高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认识，放下封建官僚架子接近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为爱国抗日做出贡献。

周仁山同志的这一活动引起了专员公署的注意，一九三八年秋天，驻额旗西庙的国民党军事专员公署提出要同旗政府台署办

公，并要求旗政府也迁到西庙，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控制旗政府，也便于对周仁山同志进行监视。为此周仁山以塔王秘书的名义对专员公署提出抗议，加上塔王及旗政府大部份官兵的反对，专员公署的阴谋才未得逞。为此专员公署更加仇恨和怀疑周仁山同志。

后来伪专员出面请周仁山赴西庙参加会谈，原赴三天返回，结果四天后才回来。当时我很担心周的安全，回来后问他因何迟回，他说：“会谈除了商量有关抗口的问题外，开了两昼夜的辩论会。专员公署股长以上的人员都出席了会议，辩论主要是围绕国民党提出的抗日必先安内的主张展开的。”接着他向我叙述了自己单枪匹马参加辩论的情况。他认为国民党的这个主张是错误的，是违背民意的，大敌入侵，不思抗战，反过来制造内战，帮助日本人进攻解放区，实际上就是对日妥协，引狼入室。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不战而退，将主力部队集结于以重庆、西安为中心的西南、西北后方，却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实际上是在破坏国共合作，破坏刚刚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用不可雄辩的事实把专员公署的人驳得无言以对。我听完周的叙述后，开玩笑说：“你真可称得上是诸葛孔明舌战群儒啊”。

一九四〇年的一天，国民党酒泉驻军一个叫杨德亮的师长曾乘专车来旗政府（杨同塔旺嘉布素日相好）。杨德亮以视察该师驻额旗建国营部队为名，实际上是为调查周仁山而来。杨在旗政府住了一夜，专门找周仁山谈了话，提出让周仁山同志登报申明退出共产党组织。周仁山回答：“我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但并未加入共产党组织，当时赴延安抗大学习者数以万计，难道都统统加入共产党吗？再说共产党也不是那么容易加入的，我没有什么值得登报申明的。”周杨谈话之后，杨德亮仍不死心，离旗前还再三嘱咐塔旺嘉布动员周仁山登报申明。塔王当时认为周仁山不是共产党员，并当杨的面说明的，杨表示异意。所以杨德亮走后，塔王对杨非常不满，曾对我说：“真是岂有此理，他们（指杨

及专员公署)竟整到我的部下了,我用的人,我信得过,他(指周仁山)不是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共产党有什么不好,我相信他(指周)是好人。”当时,我心里想周仁山很可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

有一天周仁山对我说,他同苏斐然的关系比较好,他是由苏斐然的哥哥苏剑啸介绍到额旗来的。他感觉苏斐然这个人胆小多虑,遇事考虑自己太多,靠不住。所以虽然他们彼此关系不错,但对苏他还是有所提防的。原因是以前专员公署问起过苏斐然,周仁山这个人怎么样,你敢担保吗?而苏斐然当时却说我连自己也保不了,那敢担保别人呢。如果苏斐然当时回答能担保的话,也许专员公署不会对周采取怀疑、监视等行动。也是在这次谈话中,周仁山对我说,专员公署里有人想加害于他,不过眼下正处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不敢明显采取什么行动,可暗地里有什么打算就很难想象了。他还示意我也要多留点神,若遇有专员公署人员在场,尽量少同他接触,有备无患,以防发生意外。通过这次谈话,他虽然没有明说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我心里对周的身份已确认无疑了。

一九四〇年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专员公署送来一封信,里边只装两枚手枪子弹,再无一字。此事引起了周仁山和苏斐然的警惕,他们分析专员公署很可能要采取武力行动,所以决定首先做好应变准备,以防万一,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

- 1、在距离防守司令部两华里外的西南制高点上设流动步哨两人,监视西庙专员办事处和建国营驻军的动静,如对方出动武装人员十人以下准其进入旗政府;十人以上先问明原因,停留在步哨处,听候汇报后再准许其进入或不准进入旗政府。如对方不服从上述安排,步哨以鸣枪为号,防守司令部做好战斗准备。

- 2、防守司令部周围安排二十名士兵轮班站岗,遇有情况由我负责指挥行动。为了防止夜间冲突,识别彼我,值班官兵左臂

缝一条白色毛巾，夜间还备有专用马匹。如果发生武装冲突，我方失利，苏斐然乘马退避河东蒙民家中藏匿，待事后处理善后事宜（同专员办事处打官司）。周仁山和我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采取应急措施，或暂时隐蔽，或投奔外蒙转道去东北。塔王及旗政府防守司令部其他官员因属地方首脑骨干，专员办事处不敢加害，其他人员基本都属于当地蒙民，人地熟悉，可根据情况酌情而定。

过了一个多月，未见异常情况出现，随即撤回步哨，恢复正常（据说是因为防守司令部采取了相应措施，专员办事处没有轻举妄动）。

一九四〇年以来，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后方，国民党中央颁布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加紧对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的迫害，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专员办事处也加紧了对周仁山的监视，周的处境非常危险。有一天周仁山找到我说：“老张，情况有变，专员办事处已派专人对我进行跟踪监视，很可能随时发生意外，我不能再继续呆下去了。我决定尽快离开额旗，请你能想办法护送我。”我答应了周仁山的要求，翌日晚我同周一起到了塔旺嘉布家里，由周仁山向塔旺嘉布王讲了当时的形势和他离旗的原因，塔王同意由我护送周仁山。为了安全，当时决定改装蒙族模样乘马离境。塔王夫人陶顺查干送给周仁山一件崭新的长蒙古袂袍，塔王送给周仁山一匹浅黄色走马，让我到防守司令部找了一名可靠的士兵葛勾带路，第二天傍晚我们三人匆忙出发，绕道河东到白音包格图（青山头），在塔王岳母格尔玛家住了一夜，翌日经过鼎新、天仓，第三天下午安全到达金塔县城苏斐然家中。

我们在金塔住了一夜，便告别周仁山返程。临别前我们彼此心情都是很不平静，相处两年之久，没想到竟这样匆忙分手。他将塔王赠送的马交给我，让我转交塔王致谢意，他亲笔写了一张

纸条，标明了我们今后联系的地址——甘肃省兰州市新生活书店找畅经理。接着我们握手告别。

一九四三年或是四四年，我因公差到兰州，按周仁山留下的地址去新生活书店找畅经理。书店人把我让进屋里，热情接待，等我说明情况后，他们说该店没有姓畅的经理，访畅未遇，从此同周仁山失去联系（据我后来自思，可能是因我身着国民党军服，该店人员对我身份执疑没说实话）。

我与周仁山同志虽然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在那种年代建立起来的友谊以及他对我的谆谆教诲，我永远不会忘记的。

（九）边卡风波

一九三九年苏斐然在防守司令部任参谋长，保安队士兵在边境巡逻时抓获一名外蒙越境人员，经讯问，此人系外蒙方面派遣人员，持公函一份，公函系蒙文，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奉蒙古人民共和国指示，苏联为援助中国抗战，决定向中国方面提供军备物资，所以需要从额旗至酒泉修筑一条公路，以便将抗战物资由外蒙经额旗运往内地。公函希望额旗方面能派专人绘制一份线路图（修路一事系军事机密，除旗政府主要负责人外，一般干部不宜知道，要求知情人员保守秘密）。经旗政府研究，塔旺嘉布决定由苏斐然主要负责办理此事。会后苏专程到西庙，向专员办事处进行了汇报，专员办事处同意由苏斐然绘制线路图。然后苏斐然亲赴酒泉，经过沿途勘察，绘制了一份从额旗到酒泉的公路线路图。绘图纸送交专员办事处审阅。专员办事处表示此图可行并在图上盖了章、签了名。图纸通过以后，按照先前外蒙公函的精神——线路图绘好后派专人去联系，约定双方洽谈的日期、地点等。这样仍由苏斐然亲自到边境与蒙方人员洽谈。一个月后，外蒙方面两次派人来旗政府，最后商定了双方在边界会面的日期。

会面期到，苏斐然、我和迭列格尔三人组成临时洽谈小组前

往中蒙边境札海乌素以北处同蒙。苏代表会晤洽谈（苏斐然是洽谈的主要负责人，我任翻译，迭列格尔是保安队付，负责保卫工作）。我们带了帐房，到达洽谈地点后随即将帐房搭起来，不久从北面开来一辆小汽车，接着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是苏联顾问，另一个是司机（蒙族，兼任翻译）。我和苏斐然迎上前去彼此握手并介绍了各自的身份，苏联顾问从车上拿出许多糖、烟酒和罐头等，我们在汽车附近席地而坐，边吃喝边谈话。谈话的主体是抗战，我们首先介绍了中国抗战的情况，接着苏联顾问表明了他们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态度，说他们派遣了大批空军飞行员和汽车驾驶员到兰州等各战场和中国军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者，他说这些飞行员和驾驶员都是志愿到中国参加抗战的。苏斐然把线路图交给了苏联顾问，他看完后将图放在了自己皮包里。他还谈了修建这条公路的意义和作用，如果公路通车，比从新疆运送作战物资到内地方便多了，既可减少许多麻烦又能节省时间，可以说是两全齐美。这时候已临近傍晚，日暮西山，天渐渐暗了下来。苏联顾问说，时间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具体研究线路图吧。接着他从车上又拿来了烟、糖等赠给苏斐然，说了一声“再见”，然后上车一直向北驰去。从第一次会晤来看，双方是在热情的气氛中进行商谈的，我没有发现双方在接触中有任何异常的现象。

送走了蒙苏代表我们便回到帐房里烧火做饭。晚饭后我们准备休息睡觉。这时我发现苏斐然神情紧张，面色忧虑，长吁短叹，几乎彻夜未眠。天还没亮，他就把我和迭列格尔喊醒，声称他受骗上当了，昨天不该把线路图让人家带走，小汽车究竟是不是来自外蒙，如果今天他们不来谈如何向专员办事处交待等等。我和迭列格尔一再分析人家不会欺骗我们，汽车明显是从外蒙来的，而且代表也是苏联人，今天一定还会来的。苏斐然当时表现得分外固执，他再三坚持说人家肯定不会再来了。他当即决定赶回旗政府，让我和迭列格尔留下等两天，如果蒙、苏方来人，就说他

因患肚疼病回旗治疗，并说线路图绘制有误，让我们将图要回等，说完就骑骆驼走了，我和迭列格尔对苏斐然的这种反常举动和临时决定简直无法理解，因为苏是洽谈负责人，我们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好留下来等待蒙、苏代表的到来。苏斐然走后，天还没亮，我们接着睡觉。天亮不久，汽车果然按时来了。我和迭列格尔前往汽车处接洽。苏联顾问问苏参谋长呢，我们按苏斐然的意思告诉苏联顾问他因肚疼返回旗上治疗去了。苏联顾问和蒙方翻译都感到很惊奇，面露疑色。他们还问苏参谋长还来否，我们说他不来了，当时双方都很尴尬。这时苏联顾问拿起望远镜向额旗方向瞭望，他发现苏斐然乘驼赶来，遂将望远镜交给我，我一看果真是苏斐然又回来了。汽车驰到昨日会晤地点停下来，等苏斐然到达后，蒙方翻译取下汽车坐垫，在距离汽车大约五、六米处燃起一堆火（早晨天凉）。苏联顾问从皮包里拿出线路图放在汽车坐垫上，我、苏斐然和蒙方翻译用俄文在图纸上标注地名，并根据线路图注明那里需要打井，那段公路需要新建，那段需要整修，需要多少人工，需要什么材料等。他标注的很认真仔细。这时蒙方翻译回到汽车跟前，接着苏斐然也悄然离去，只剩下我和苏联顾问俩人继续看线路图，苏联顾问仍在细心标注。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蒙方翻译大声疾呼，苏联顾问听到呼喊后立即跑到汽车跟前卧倒并持长枪向苏斐然瞄射。当时我实在莫名其妙，急速将线路图仍在火堆里向南匆匆退跑。我看见苏斐然快速向东南奔跑，我掏出手枪向汽车方向瞄射未中，便退到帐房旁边让迭列格尔用长枪瞄射汽车，蒙方翻译急忙发动汽车向北快速驰去。汽车行驶不远又停下来，因这时双方已停止射击，我见对方持望远镜向我方看望许久，后来汽车便缓缓离去。

我和迭列格尔目送汽车离去后，就找苏斐然，只见苏气喘吁吁地从东南凹地向我们跑来，他头上和脸上都是血迹，我们用毛巾给他包扎伤口，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苏说他发现蒙方翻

译离去后，便随其来到了汽车跟前，他见人家正在擦手枪，于是借看枪为名把手枪接过来，然后推弹上膛向蒙方翻译射击，碰巧是臭子，没能发火，他便弃枪奔逃，人家也就大声呼叫起来。我和迭列格尔听到这个情况后都很生气，指责他为何事先不向我们打招呼，为什么冒然向人家开枪，如果不是因为碰巧遇到臭子，打死了人家的代表怎么办。苏斐然当时感到很后悔，他说他怀疑人家是日本奸细，当时来不及给我们打招呼了，想不到不仅没打着人家，自己反而挨了打。我和迭列格尔问他，你自己的手枪呢，他说慌忙中忘了掏出来了。事已至此，我们逢命听遣，能有什么办法呢？这时候汽车已远去渐渐看不见了，我们只好收拾好帐房乘驼返回。

返回途中因苏斐然伤势发作，我们只好到当地蒙民家歇息，派送迭列格尔速回旗政府报告，通知专员办事处派车和医务人员到旗政府。我和苏斐然边歇边赶路，我们回到旗政府不久，专员办事处的车和医生也到了。经过医生的验伤诊断，发现背后中弹很多，等取出子弹一看，原来是铁砂子弹，这时方知人家是用鸟枪打的。

随后专员办事处用车将我和苏斐然接到西庙办事处驻地，苏的三叔是专员办事处的副官，他对我进行了严词审讯，声称是因为我失职害了苏斐然，专员办事处的几个股长也以怀疑的口气一再向我提问，问我发生这场风波的来龙出脉。我一再向他们表示此事与我无关，我确实不了解内情，况且迭列格尔也在场，如果你们不信可以直接问苏参谋长。苏斐然当时还在卧床养伤，他说了良心话，此事皆由他一人引起，与老张和迭列格尔没有任何关系。随即，专员办事处用专车将苏送到酒泉，后转乘飞机到兰州医院治伤。苏被送走后，专员办事处又将我扣留了六天，是塔旺嘉布派人把我要回旗政府。

边界风波发生后，塔王对苏斐然非常不满，嫌他主观臆断造

成这种无法挽回的后果，险些给旗上带来不幸。两个月后苏斐然伤愈归来见到我后怒气冲冲，斥责我不保护他导致身负重伤，我声明自己的任务是翻译，而且对当时发生的意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我没有什么责任。他对我的声明非常生气，坚持要处分我。经周仁山同志再三劝导，加之塔王已了解了当时的情况，所以我得以幸免。

通过这件事，我觉得苏斐然此人主观自负，为人多疑，遇事多虑，神经过敏，否则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

抗战期间，苏联确实是援助中国人民抗战的可靠朋友，如果不发生这场边卡风波，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呢？令人费解的是，苏斐然究竟为什么采取令人莫解的行动？难道真如事后苏斐然所言，“这是专员办事处设的圈套，想趁机整他。”这里边是否还有更深的奥秘，至今我心里还是一个未解的谜。

（十）军校学员

一九四一年旗政府保送罗虎、雷德、旦木登等十名蒙族青年到黄浦军校西安分校第十七期学习，并委派我带队，负责管理上述学员的生活和学习。在校期间我被该校聘请为助理教员。一九四三年学习期满毕业，我们一同返回额旗。

（十一）白风珠之死

一九四六年额旗国民党区党部逮捕了一个名叫白风珠的商民，并将其关押在区党部一间空房内。数日后传出白风珠上吊自杀的消息。

据了解白风珠原籍北京，早年到外蒙做过生意。一九三四年到额旗经商。自后与额旗策克区一位名叫色尔吉的妇女同居。在此期间经常有一些外蒙越边人员来到他家，并把带来的外蒙传单托白风珠在周围的树木上张贴。以上情况被区党部发现后白随即

被捕押至身亡。

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始末

额济纳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额济纳旗的人民长期以来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期待自由，向往光明。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她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结束了她苦难的历史，获得了新生。

（一）民族的独立、祖国的解放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一九四九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年代，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局部的战略防御已转入全面的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大战场上接连失利、全线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战争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辽沈、平津、淮海战役捷报频传，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南京政府宣告灭亡，蒋介石集团渡海逃窜，国民党反动派政权已成残云落叶，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正在被推翻。中国，这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这块多灾多难，屡遭蹂躏的富饶土地正迎着曙光、走向光明。

当时我正在额旗旗政府驻酒泉办事处任主任，酒泉的情况不比偏僻闭塞的额济纳旗，我从报纸上、电台以及国民党溃军口里看到和听到了许多有关时局的消息。当时我也目睹了国民党军队溃退败逃的情景，目睹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腐败没落和经济走向崩溃、物价飞涨、金元贬值、民不聊生等不容置疑的客观现实。尤其是听到胡宗南主力被全歼、西北解放，湖南省主席陈潜和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领部队起义等消息后，对我思想振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应该郑重地考虑自己的何去何从了。

（二）额旗起义前的酝酿

一九四九年初秋，我接到旗政府通知，撤销办事处，将办事处所有财产分装两辆汽车随车返回额旗。

回旗后塔旺嘉布问我有关酒泉的情况，我将所闻所见以及自己的看法打算告诉了塔旺嘉布。塔旺嘉布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国民党覆灭在即，我们应该顺时代潮流而动，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塔王经过认真考虑之后对我说：“我不会忘记周仁山先生的话，我决定跟共产党走，举行起义。”当下立即决定召开旗政府首脑秘密会议。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塔旺嘉布，我、牛顿、达瓦、嘎瓦、罗虎、赛伯英等七人。塔旺嘉布亲自主持了会议，他根据时态的发展情况向与会者进行口头讲言，他指出国民党政权的灭亡之势已成为不可挽回的现实，全国解放已成定局，指日可待，我们不能做人民的罪人了，只有起义才是我们光明的出路和前途。他还指出旗上情况很复杂，有少数人主张投奔外蒙，还有个别人提出退避马鬃山一带，集蓄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和国民党的反攻，另有一部分人提出向共产党解放军联系，举行起义，额旗走和平解放的道路。他一再声明，自己不同意前两种意见，而主张最后一条，即举行起义，迎接解放，并请大家认真考虑，发表意见。经过大家热烈讨论，一致同意立即组成洽谈小组，派代表赴酒泉同解放军方面联系，旗政府做好一切准备，尽快举行起义。会上研究决定由我和达瓦、塔斯木三人做为旗方代表，到张掖向解放军联系洽商起义事宜。散会前，塔王叮嘱与会者，西庙专员办事处驻有国民党特务，旗政府附近也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指国民党区党部）和个别特务，所以一定要严守机密，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以免发生意外。

（三）额济纳旗的和平解放

会后的第二天，我们三人乘坐专车前往酒泉，同时塔旺嘉布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报告他代表额济纳旗地方军政全体人员举行起义，同时致电宁夏军区杨得志司令员表明额旗已举行起义。电文稿由李正德草拟。我们到达酒泉后才知酒泉已经解放，为此我们在酒泉赶制了一面锦旗，上书“吊民伐罪”，执旗来到了原国民党专署院内，向解放军说明来意，献上锦旗。解放军方面毛参谋、刘专员等首长接见了我们，在诚挚热烈的气氛中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谈话结束后，解放军首长招待我们吃了饭，并派人送我们到民航公司办事处休息，约定第二天正式商谈有关起义事项。解放军首长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翌日我们如约前往，同毛参谋、刘专员等解放军首长商谈了起义事项，反映了额旗地方情状及当时哈萨克土匪在额旗青山头一带进行杀人抢劫骚扰和国民党少数散兵扰乱地方治安的情况。最后拟定有关起义的如下具体事项：

1、解放军首长嘉勉额旗全体起义人员并转告塔旺嘉布额旗已和平解放，请他安心工作、再接再厉。

2、额旗旗政府行政机构和防守司令部人员建制暂不变动。

3、成立额旗临时人民政府，塔旺嘉布任旗长，主管旗里军政事务，并制定发给旗政府印章一枚。

4、由军区给旗方拨发步枪二十支，轻机枪两挺，子弹若干发以及部分军服，用以维护地方治安，消灭哈匪和国民党散兵。

5、酒泉专署委派白万治到额旗指导工作，协助塔旺嘉布旗长搞好民族团结，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胜利成果。

6、旗政府派专人会同白万治一起监督伪专员办事处档案材

料的登记、整理和封存入档。

经过六天的商谈协定，我们完成了任务，同白万治一道乘车返回额旗。回旗后，我们向塔旺嘉布汇报了商谈起义情况，转达了解放军首长的关怀和期望，接着召开了庆祝额旗和平解放大会。庆祝会上由塔旺嘉布旗长介绍了商谈起义的情况以及解放军首长对起义代表的热情接待和对全体起义人员的嘉勉，转达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区首长对全旗人民的关怀，要求全旗人民团结一致，努力工作，建设新额济纳。会后，全旗各族人民欢欣歌唱载歌载舞奔走相告，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灾难深重的额济纳旗从此获得了新生，真是拨开云雾见朝阳，火旱的水苗逢甘露。接着成立了额旗人民政府，塔旺嘉布任旗长，白万治兼任秘书，我暂调总务科任科长，其他人员保留原职，在旗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展开正常工作。

（四）塔旺嘉布起义的思想根源

塔旺嘉布是一名少数民族封建王爷，思想上有着深重的阶级烙印，在决定额旗命运的关键时刻顾全大局、顺于民心，毅然决定举行起义，是难能可贵的，确实是远见卓识之举。其所以如此，是有思想根源的。

1、长期以来他目睹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亲身经历了国民党反动分子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愚民政策，推行大汉族主义，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排斥和打击少数民族地方人士的现实，他耳闻目睹了国民党驻军、伪专员办事处、国民党区党部的阴暗内幕。这些机关里人员背景复杂、人事关系混乱，对外滥用职权，跃武扬威，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利用权势营私舞弊，谋取私利，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破坏地方政权的行径，不尊重地方民族信仰和风俗，就连塔旺嘉布本人也吃了他们不少苦头。因此他对国民党及其下设组织，早就怀有很大的成见。

2、国民党政府在抗战问题上所采取的不抵抗主义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塔旺嘉布是有一定看法的。

3、塔旺嘉布曾受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苏剑啸、周仁山等同志革命思想的启蒙和熏陶，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苏、周二位同志对塔旺嘉布曾进行了多次帮助与教育，他们常常启发塔旺嘉布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加之塔王也曾有过建立一个民族平等自由、人民安居乐业的新社会的追求和向往，由此奠定了塔旺嘉布在起义问题上的鲜明态度和思想基础。

4、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国民党大势已去，覆亡命运已成定局。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兵临城下，举行起义是弃暗投明的唯一道路，否则倒行逆施将成为人民的罪人。当时塔旺嘉布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最后采取了决然起义的正义之举，不仅额旗人民免受了战乱之灾，而且他本人也由此而获得了新生。

（五）新政权诞生后的一些情况

新政权成立后，首先加强了治安保卫工作，组织武装人员，肃清匪患，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

人民政府派达瓦带领士兵袭击了青山头一带的哈萨克匪徒，致使哈匪受到严重伤亡，余匪狼狈逃窜，溃退青山头以西，从此再未敢来侵扰。与此同时收降了德匪两名士兵，并在边境上札海乌苏以南抓获三名国民党特务，送交酒泉专区审处。

四九年九月底由内地逃来国民党武装溃军约七十余人，他们乘坐五辆长车一辆吉普，为首者是一个姓马的司令，自称是傅作义、董其武的部下。这批人来自兰州，准备经过额旗前往绥远。经研究我们决定将这批人留住数日，劝其卸甲投诚。另一方面电请宁夏军区杨司令员指示。不料他们第二天清早出发东行，鉴于这种情况，我和罗虎带领保安队到瓦窑陶来进行阻截。

下午接到宁夏军区回电，电文略示其放行绥远，不必强行阻

截。所以我们再未追阻，遂之东去。

一九五〇年春天，酒泉军分区派苏斐然去拐子湖劝告德匪余部投诚，苏斐然到拐子湖后，德穆楚克东鲁普已跑往外蒙，等候月余未遇，苏同其部商谈没有结果。这时酒泉军分区吴政委为了解德部投诚情况来到额旗，住了一个多月后获悉德匪部下大部分已在阿拉善旗投诚遂返回酒泉。这时拐子湖所剩的德匪残部由一个叫韩萨格拉扎布的团长带领。苏斐然继续留在拐子湖力图说服韩团长率部投诚。不料劝降未成（苏斐然给旗政府回信中所示），韩团叛乱，在拐子湖一带烧杀抢掠。据说苏斐然被劫持后遭叛兵枪击而亡，也有的说苏斐然用手枪自杀身死，真实情况不详，有待调查。

时隔不久，韩团叛匪窜入额旗进行骚扰，夜间常在旗政府一带进行活动。为此白万治等数人驮着电台向西退去，途中恰与叛匪相遇，电台被劫走。

叛匪窜入额旗以来，所到之处抢劫牲畜、掠夺财物、奸污妇女，无恶不作，致使人心不安、东躲西藏。经旗政府研究、塔旗长指示，旗政府和保安队暂时疏散隐蔽，人员暂时退居红柳深处，监视叛匪动向，因敌众我寡，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如遇到小股叛匪，聚而歼之。因叛匪人地生疏，一般不敢进入红柳密林处，所以我们可以利用隐蔽地形放冷枪消灭叛匪。如果发现叛匪抢劫抓人，可根据具体情况突然袭击，同时旗政府派人急赴酒泉军分区报告请求援军消灭叛匪。

酒泉军分区接到额旗人民政府的告急文书后，立即抽调了一个骑兵连赶赴额旗剿匪。骑兵连到达河西建国营时遭到了叛匪的袭击，我骑兵连战士临危不惧，沉着应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叛匪伤亡严重，逼迫溃逃，退守河东，与河东叛匪会合向马鬃山方向逃窜，此后额旗恢复了正常的秩序。疏散人员陆续回到旗上，旗政府开始办公。

经过这两次叛匪扰乱，使额旗人民遭受了很大损失，牧民对

国民党匪徒无比痛恨，很多群众都说，国民党集团真是祸国殃民，临灭亡时还要惨害人民。平定叛匪的动乱和骚扰也给刚刚解放的额旗人民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它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民族团结，军民团结，巩固和壮大新生的人民政权，保卫胜利成果，才能真正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六）白万治是混进革命队伍的蛀虫

白万治到额旗工作不久，酒泉军区派王参谋来额旗人民政府协助工作，但是因为白万治大权独揽，武断专横，有意识地排斥王参谋，使王参谋无法开展工作，因此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王参谋就返回酒泉。

白万治工作作风主观片面，事事都是他说了算，就连塔旺嘉布旗长也必须听任他的摆布，一般同志就更不用说了。对于和他意见不同的同志他常常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搞突然袭击。利用召开生活会的机会批判评旺嘉布。因此在少数民族干部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因为我没有给塔旺嘉布提意见，白万治竟私做主张，将我几年节余的六百多斤小麦充了公。

白万治的思想品德和生活作风非常败坏。他借下乡宣传住在牧民家的机会以用权势奸淫妇女，利用职权强占某司机的爱人与他姘居，由此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影响。

后来我才听说白万治是个小学教员，本来是国民党的中统特务分子，是解放时混入革命阵营的。对于他在额旗的所作所为，上级领导机关曾进行过多次批评。据说一九五二年因盗旗政府的手枪枪支进行非法买卖，加之特务身份败露，被酒泉人民法院判处死刑。

尾 声

一九五〇年秋天我随塔旺嘉布到宁夏开会。临行前我向塔旺嘉布提出回故乡的愿望，塔旺嘉布旗长念我离家日久，加之又是短假探亲，所以批准了我的要求。这样我提前到了阿拉善旗。到阿拉善旗后得知家父已病故，所以也就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遂之塔旺嘉布、罗虎等也来到阿旗，我们一起到银川，出席了宁夏省召开的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常常同邢肇堂副主席、阿旗云祥生书记一道同桌共餐，一齐谈心，会上认真听取首长和代表们的讲话和发言，使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会闭幕以后我们回到阿拉善旗，经过塔旺嘉布和达理札雅旗长的批准，将我调到阿旗工作。

我虽然离开了额旗，但是那里的一草一木都给我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我同额旗工作的老同志、老朋友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往来，额旗的同志每逢到阿旗开会、出差，总要到我家中看看。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内蒙古而努力工作。

听说这些年来，额旗在党的领导下，各项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从心底感到高兴。我坚信，额济纳旗一定会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額旗防守司令部官兵人数统计表

机关	下设机构	级 别	姓 名	編制	备 注
防 守 司 令 部	司 令	少 将	塔旺嘉布	1	
	副 司 令			1	
	秘书处(室)	中校主任	周仁山	1	后杜子宣、李 正德相继任职
	"	少 校	嘎瓦、赛伯英	2	
	"	中 尉		2	
	参谋处(室)	上校参谋长	苏斐然	1	王祖武、徐汉 襄相继任职过
	"	中 校	牛 顿	1	
	"	少 校	马宝德	1	
	"	上、中尉	奕喜、米吉德	2	
	"	少 尉		2	
	副官处(室)	中校主任	张宏林	1	
	"	少 校	达什策楞	1	
	"	上、中尉		4	
	"	少 尉	雷耀云	1	
	军需处(室)	中校主任	达 瓦	1	
	"	少 校	胡端生	1	
	"	上、中尉		4	
	"	少 尉		1	
	医 务 室	少 校	刘	1	
	"	中 尉	张	2	
"	少 尉		2		
政 工 室	少 校		1	参谋长兼	
"	上、中尉		4		
电 台	上 尉	蔡去暇	2	后王选举担任	
"	中 尉		2		
保 安 总 队	保安大队部	中校大队长	罗 虎	1	
	"	少校队副	君 叩	1	
	"	上 尉	迭列格尔	2	
	中 队	上、中尉	雷 德	4	
	"	少 尉	东古尔布	2	
	士 兵	士 兵		135	

追忆塔旺嘉布先生

藏登米德格

原额济纳土尔扈特旗郡王、国民党旗防守司令部少将司令塔旺嘉布先生，是达什王爷的四子，出生于一九〇〇年，其同胞有大兄图布新巴雅尔、二兄吉格木德生格和三兄额尔德尼敖其尔（二、三兄均少亡）。另有冈嘎勒拉姆（冈嘎小姐）、达力玛（阿尼亚小姐）、道力格尔、脑尔布藏巴等数姊妹。他自幼出家，在旗庙（位于旗政府所在地达赖库布东南两公里处，“文革”中被捣毁）为僧，居住在寺院里。其兄图布新巴雅尔虽有两位夫人，但无子，为传袭爵位，维系家门，遂令其还俗为民，迎娶夫人完婚，于一九三八年将王位传于他。

额济纳土尔扈特王公联姻，素有从其原部十三个世族中选配姑娘的习俗，以图门当户对，看重达官贵人门第。依此给塔旺嘉布选配本旗参领其米德之子——德力格尔参领的独女陶顺查干为妻（1924年），后生有四子。长子——额尔敦格日勒，解放后历任额济纳旗文教科长、副旗长、旗长、阿拉善盟副盟长职，于一九八一年去逝，卒年五十二岁。次子——东德布，解放后参加工作，曾任巴格达、文教局长等，现任额济纳旗人大副主任。三子、四子均于幼年少亡。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内地发动全面进攻，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后撤军队，天津、北平、河北、河南、山西、山东等地相继沦陷。中华民族陷入外寇入侵的水深火热之中。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历史重任落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众的肩上。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独霸中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国”的美梦，在大举进攻内地的同时加紧对边疆的侵略，就连边远闭塞的额济纳旗也不放过。自一九三五年起多次派遣浪如布、桑杰扎布、松本房八郎、江崎小夫等间谍特务，刺探额济纳旗情报，为图谋扩大其在额济纳旗的侵略活动，占据了色尔川吉庙。常言道，“树大招风”。日帝特务机关盘踞色尔川吉这一事件，在额济纳旗军政统治上层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此情形下，抗日还是亲日，面临这一重大抉择的关头，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分歧，苏剑啸（梅林）、苏满都巴雅尔（参领）、阿木（梅林）、陶顺（管旗章京）等持反日态度；塔旺嘉布（公）、牛顿（梅林）持中立态度；图布新巴雅尔（王爷）以及躲避蒙古人民革命的逃亡分子查干朝尔吉、云登（章京）等却持亲日态度。

一九三七年图布新巴雅尔以赴阿贵庙拜佛为名，欲携带随从官员及家眷投奔日本时，塔旺嘉布对他兄说：“抛弃故土要去日本，那你去你的，我可不离故土”，说罢留下来未走。他立即秘密派遣苏宝峰、陶顺二人赴银川报告了日本特务的动态（图王因在中途遭李才贵部拦截而未走成，只好返回旗里）。此时周恩来、董必武等规劝过原宁夏省的马鸿逵要驱逐日寇。马鸿逵只好派省民政厅长李汉元前往额济纳围捕日本特务。但怀疑塔旺嘉布同日本

人也有勾结。故后来塔旺嘉布在捉拿日本特务的事情上，能够采纳苏剑啸、苏满都巴雅尔、阿木、陶顺、牛顿等人的意见。其兄图布新巴雅尔的行径及捉拿日本特务的错综复杂斗争；对塔旺嘉布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一九三八年三月，图布新巴雅尔在青海塔尔寺去世。在塔旺嘉布袭位仪式大典上，专员杨焕文代表国民党当局宣读委任证书后将证书交予塔旺嘉布本人。原先额济纳属苏木建制的旗。据史料记载，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额济纳旗所设官员主要有：

王	爷：达什
管	旗：策林道格
梅	林：帕们来
参	领：阿日善、高特布
佐	领：却木宗、巴图云登、其米德
牌 盾	达：阿尤尔
骁 骑	校：达来

到图布新巴雅尔、塔旺嘉布执旗政时，人口增至数千，官吏也相应地增加了。塔旺嘉布袭位后，对原有机构进行了整顿和充实，将全旗划分为四个佐（苏木）十六个巴嘎（解放初又划为五个苏木）。在官府设置上一直沿用清朝的建制和刑律，并增加和充实了官员。旗府官吏职员有：

札萨克郡王：	塔旺嘉布
协 理：	达木丁苏荣
管 旗 章 京：	牛顿
副 管 旗：	锡盖、陶顺
梅 林 章 京：	嘎瓦、阿木尔巴依斯古楞
副 梅 林：	德力格尔
参 领：	巴音贺西格
副 参 领：	达瓦、巴音、得理格尔、伊如格勒图

佐 领：赛伯英、桑吉雅、陶克陶巴图、斯日杰、
道尔吉、丁都布

副 佐 领：广古尔、塔斯木、广古尔扎布

牌 盾 达：忠乃、纳木弄、广布道尔吉

哈 温：贡都才仁、札那

管 家：其木德道、云登、罗布生

秘 书：吉尔格勒（阿洪顺）

练习生(文书)：塔弄、藏登、明盖、敖肯、丹巴扎布

厨 师：敖其尔、孟克

包 什 嘎：嘎瓦、宗对、纳木来、芒乃等人。

此外将原有12人的侍卫人员扩充为24人，在苏木或巴嘎任有正、副职官吏及文书，负责处理民间事务。

塔旺嘉布袭位后，与苏剑啸、苏满都巴雅尔（苏斐然）、苏吉格图（苏宝峰）等交往更加密切了。其原由是，苏、塔两家是世交，苏剑啸的父亲苏永格与塔旺嘉布的父亲达什之间有结义兄弟之情。塔旺嘉布、苏剑啸二人念其两家父辈交往甚密，拜天磕头结为兄弟，进而发展了两家的友情。故塔旺嘉布将苏满都巴雅尔、苏剑啸二人以参领、梅林职加以委用。后与苏剑啸介绍来的周仁山结识，将其以秘书职手下留用，还同在新疆驻乌兰川吉电台（苏共情报机构）工作的官布扎布结友交往。当时，塔旺嘉布决定事项时，这些人对其有决定性的影响。

自一九三七年后，国民党当局多次派兵在额济纳旗的瓦窑桃来（今巴音桃来农场境内）的老西庙、赛汉桃来（那时称建国营或二里子河）等地营盘驻扎。他们表面上宣称是为保护额济纳旗的安全、防范日本人而驻兵，实际上是蒋介石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存有戒心，有其利用和镇压之目的，特别是严加防范额济纳旗同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往或反叛。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以郭子玉，夏玉清为首的胡

宗南部42军191师11115团于赛汉桃来修建兵营驻扎。后将该团扩编为直属18旅。旅长徐清，副旅长郭子玉，夏玉清仍任团长职。一九三九年驻守兰州的军长杨德亮前来额济纳视察时，塔旺嘉布出面表示欢迎和谢忱之意，设宴款待，同其礼让交往。特别是，塔旺嘉布为使国民党方面对其释疑，进而获取信任，在令长子额尔敦格日勒拜杨德亮为义父的同时，自己又与夏玉清结拜为兄弟。从此以后，国民党驻额济纳旗的专员办事处再不敢贸然直接插手塔旺嘉布的内部事务了。如：他们曾怀疑牛顿梅林、贡古尔扎布等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勾结，遂以延误收缴捐税为名欲加捕办时，由塔旺嘉布作保放过。自一九三九年始，以嘎瓦为首的秘密小组在旗内从事与蒙古人民共和国联络的活动。塔旺嘉布的手下人员，从一九四五年起也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关系，后并入嘎瓦小组。

国民党专员办事处是由国民党国防部派出的特务机关。当时在任的有李（才贵）专员、吴专员和张专员。此外，廉金山、常金山、杨焕文、郭永年、周国良等相继任职。按规定，塔旺嘉布处理重大事务，须与专员办事处协商并向其请示汇报。如：决定参加国民大会人选，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交换越境人员、牲畜，从民间征集骑乘及有关保安事项的处理等等。有一次专员办事处追捕蒙古人民共和国逃亡人员权布勒、道力格尔夫妇二人后，未让地方军政当局过问就直接押走了。从那以后，对边境上发生的有关军政方面的事件，除专员办事处获悉而过问时勉强汇报外，凡他们不知道的就直接压下来蒙混过去。鉴于事已如此，专员办事处常派出特务侦探塔旺嘉布及其部属的行踪和防守衙门的活动情况。这就引起塔旺嘉布对他们的反感，在思想上同他们的裂痕愈加深了。

一九四〇年（民国廿九年），塔旺嘉布带上牛顿梅林、阿格通嘎，与常住重庆代表苏宝峰及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专员杨焕文一同赴重庆，拜谒蒋介石、何应钦等，陈述了额济纳旗防守衙

门的公务。塔旺嘉布向蒋介石献了俄制毛毯四条、黑羔皮衣筒四件、鹿茸大小六个、如来铜佛一尊等礼品。蒋介石当即赠呢料两匹（厚薄两种）、每人一支德国制拍卡尔钢笔，并给每人标志军阶的武装带和短剑一把。嗣后与蒙藏委员会及有关官员接洽商谈了公务。

国民党当局认为，若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巩固其统治，只靠军政力量不行，还须通过国民党党务系统软硬兼施。故于一九四三年在额济纳旗设置地方党部，委派徐颐和为第一任书记，后又派张文弟为书记长，下有姓党、姓肖的两名工作人员。该党部下设执行、组织、宗教三个委员会，执委会内有塔旺嘉布、赛伯英；组委会内有徐颐和、张文弟及嘎瓦等；宗委会内有其木德道、依西嘎拉生等。塔旺嘉布还任党部常务委员职。当时他们的活动除偶尔开一次委员会会议外，多是利用节日或正月里的庙会、祭敖包等大型集会作些公开宣传。因在机关、军警、学校和寺庙里成批成批地接纳国民党员，登记年龄即可入册，结果闹出不少人不知自己何时何地加入国民党的笑话来。设置党部这件事对塔旺嘉布来说，似乎又在自己身上缠了一层套索。塔旺嘉布以军务、政务繁忙为出，很少参加党部活动，尽量躲避。

一九四五年秋，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通知塔旺嘉布前去候见。塔旺嘉布带领塔斯木、嘎瓦，与苏宝峰再次前往重庆。拜谒蒋介石时，蒋说：“具体事项，你们可向徐旅长、杨军长面谈报告。”同徐、杨二人会面时，二人说道：“抗战八年期间，你们干得很好。现抗战的事就这样结束了，今后你们的新任务就是如何改善防务、防范苏俄赤党。”为嘉奖和鼓气，特拨给塔旺嘉布卡车两辆、电台一部、手枪四枝，并以加强旗防守衙门的指挥机构为名委派徐汉襄任参谋长，显然这是国民党对额济纳不放心而进一步监视塔旺嘉布所采取的一着，其用心人们是不难看出的。

在重庆期间，塔旺嘉布秘密会晤了正在那里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革命党副秘书长苏荣扎布、外交部长拉玛苏荣等。蒙古国南戈壁省札萨克旗与额济纳旗是相毗邻的两个旗。蒙方向塔旺嘉布阐述了两个相邻旗间和睦相处的重要意义。塔王返旗后，委派达瓦、东德布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蒙古的敖包图边防站首次联络，从那以后，双方商定了秘密联络地点、时间和方法，联络一直延续到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前夕才告停止。当时由蒙方提供的有：国民党的本质；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及其正义事业；苏联共产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及各战场上战况等。由额济纳方面提供的有：国民军政情况、党政头目、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及特务机构情况等。

塔旺嘉布袭位后，不但着手整肃、充实政务诸方面，对防守司令部内部也进行了整肃，提高了官兵的训练水平，充实了指挥机构。上报本司令部兵员编制185人，配齐司令、副司令、参谋长，下设参谋处、军需处、秘书处、政务处等。将原保安队整编成骑兵，以185人的编制（虚报兵额，以多冒领军饷）领取军饷。

依照国民党当局的要求，以加强防务，在边沿地区设置十个边卡，每卡署有3——5名蒙兵，指派可靠人充任卡长。塔旺嘉布对国民党在官场上互相猜疑、尔虞我诈的那一套恶习早有所闻，因此他特别提防专员办事处插手其内部事务而惹事生非。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伪立法会议。塔旺嘉布当选为正式代表，嘎瓦当选为立法委员，在同蒙古国方面联系磋商由谁去参加这次会议时，蒙方提出塔旺嘉布、嘎瓦还是坐守阵地为好的意见。据此另派牛顿、达瓦二人作为替补代表前去参加了会议。

一九四八年国民党决定在南京召开全国国大代表大会，通知塔旺嘉布出席会议。塔旺嘉布已经看出，南京政府在政治上日益衰败，经济上每况愈下，军事上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将灭亡的颓势，料定通过该大会也挽救不了其灭亡的命运。为应付差事，仍派

达瓦、牛顿二人作替补代表，藏登、塔弄作随从前去参加会议。同时，令其子额尔敦格日勒随同代表一同前往，让其看看祖国大地，开开眼界。

一九四九年是不寻常的一年。对中国革命来说，由于解放军果敢、绝妙地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决战胜利，我军正向全中国进军，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将要变成现实。另一方面蒋介石反动派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正在作垂死的挣扎。就在这关键时刻，蒙古国革命党书记、人民大呼拉尔主席乔巴山发来邀请，请塔旺嘉布前去乌兰巴托作客。塔旺嘉布在国内局势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担心在自己离家出访他国期间可能发生意外，故婉言谢绝了对方的邀请。

三

一九四九年，国内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展开全面进攻，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屡遭失败。全体国民党军政人员面临着何去何从生死攸关的抉择问题。

正是在这个时候，塔旺嘉布撤回了额济纳旗驻酒泉的办事处。他通过报刊、广播及下属耳目清楚地了解到在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被歼灭，一些地方军政人员纷纷起义迎接和平解放的消息。时局使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往哪边倒的问题。塔旺嘉布等上层贵族，已经认识到，只有摆脱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才是光明的出路。于是，他们在知友之间交换看法，在征得每个人的意见基础上，于一九四九年九月中旬特派嘎瓦、藏登二人赴蒙古国敖包图边防站报告了准备发动和平起义的打算。当即获得蒙古国敖包图边防站指挥官的支持，此间还收到了阿拉善旗达理札雅（王爷）所发出的宣告起义、接受和平解放的通电。至此，塔旺嘉布在国内外革命形势的推动下，于一九四九

年九月亲自召集地方军政要员会议，统一认识，具体商讨和平起义大计，通过了脱离广洲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决议。会后，让李正德草拟通电台文，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廿七日通过已就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阿拉善特别旗主席的达理札雅向银川的解放军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转交通电，并请代呈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与此同时，采取积极妥善措施，委派张宏林、达瓦、塔斯木三人前往酒泉接洽具体商定起义事宜，受到酒泉当地政府及驻军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返回旗时，政府派白万治作为代表随同前来额济纳旗协助工作。在庆祝额济纳旗和平解放大会上，塔旺嘉布就任额济纳旗政府主席；对其他官员未作变动，仍让他们留任，负责日常事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以塔旺嘉布为首的额济纳旗新政府，自诞生之日起就显示了自己的活力和威力，真心实意地、无私地为人民的利益奋斗了。

1、新政府派出的以达瓦为指挥官的保安队，经过同在额济纳旗青山头一带抢掠的哈萨克乌斯曼土匪激战，将匪徒驱逐出去，维护了地方治安，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从而赢得了旗民的拥护。

2、一九四九年秋末，在额济纳旗境内的瓦窑桃来拦截并击退了企图路经额济纳旗逃窜的拥有六辆汽车的七十余名国民党马家残部，为巩固和保卫新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3、一九五〇年，盘踞在拐子湖的德王、李守信匪部拒不接受我方令其缴械投降的要求，团长萨格拉扎布率领部分匪徒突然窜入额济纳旗境内，抢掠老百姓的牲畜、财物、奸淫妇女。他们真可谓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新生的人民政府，动员人民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并肩战斗，狠狠打击了匪徒平息了骚乱。

4、正确认识并积极支援了邻近农区的土地改革，明确宣布，出租给甘肃省鼎新县部分农民的原土地契约无效，今后一律不

再收租。

5、在一九五二年的抗美援朝及后来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政治、爱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一九五二年将潜藏在额济纳旗境内的反革命分子徐汉襄、王海权、李邦岩、尼玛等依法逮捕后送交酒泉公安机关处理。

6、认真稳妥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民族区域政策，已划归内蒙后的额济纳旗为筹建巴彦淖尔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7、解放后，由于认真贯彻执行了党在牧区所采取的“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的政策，大力解放生产力，使得额济纳旗畜牧业得到迅速发展。至一九五八年全旗的牲畜总头数比解放前增长了好几倍。

8、在一九五八年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坚决听党的话，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支持旗里的合作化事业和公社化运动。塔旺嘉布等动员其家属入股组建公私合营牧场，诚恳地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

9、一九五八年为满足国防需要，无代价地腾出额济纳旗的一部分草场，支援了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了军政关系。

10、塔旺嘉布亲自选址并审定了将旗政府所在地建在达赖库布的方案及图纸。今天这个兴建27年的戈壁小镇已成为额济纳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

四

塔旺嘉布先生出生于清朝末年、在中华民国时期袭位执政、又在社会主义时期工作过的人物。虽然他出生于贵族上层，身居旗军政最高统治位置，可在他身上从来没有过贵族官老爷的那种残暴和傲慢作风，而是为人正直，忠厚坦白，嫉恶从善，不分官

员还是平民百姓均能以礼相待，和气交往。在青年时期，他还拉骆驼运过粮食。袭位后，他仍时常在牧民中间走动，也不计较穷富，碰上哪一家就在那一家吃住，同他们畅谈交友。因此，旗人都昵称他为“赛阿哈”（好兄弟的意思）。

他长期目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腐败现象，亲身经历过他们对少数民族所采取的愚民政策、大汉族主义、民族歧视和压迫及其迫害少数民族地方人士的历史事实。他还耳闻目睹了国民党驻地方军队、伪专员办事处及地方党部的黑暗内幕，机关工作人员的复杂背景，人际关系方面的混乱及其对内依仗权势动辄训斥、横行霸道，内部互相勾结倾轧、争权夺利的种种丑事，并亲身受过他们的欺凌。因此，他从内心里十分厌恶国民党及其他人的走狗。这一点，不仅同他的人品有关，而且同其早年就接受共产党人的政治影响也有直接关系。

塔旺嘉布是位朴实无华的人物。他从小就看不惯奢侈和浪费。尤其是继任王位后，并没有象其他旗的王爷那样向老百姓大肆征收苛捐杂税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宫殿，因而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现保存着的王府是他动用个人畜牲修建的，而决不是靠捐税徭役建起来的）。

塔旺嘉布是位有头脑的人物。他当王爷后，首先抓额济纳旗的教育事业，兴办小学，自己出任校长，配备教职员工，让许多孩子跨进了学校大门。我旗现有的不少老干部就是当时进入学校接受启蒙教育的。他们现正为额济纳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着相当的作用。他还从青年中挑选一些人送到国民党军校受训，改善了军政人员的素质。在他的手下有不少象苏剑啸、周仁山那样的共产党人从事过地下活动。当这些人被国民党方面发觉而其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他不思个人安危，几次暗中保护使得苏剑啸、周仁山等同志脱了险。正因为如此，党在额济纳旗的地下活动，未发生过任何损失。他还同外蒙古建立秘密关

系，通过接受他们的宣传教育，认清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拥护共产党，接受革命教育，站到了革命人民方面。

特别是在全国解放的号角声传到额济纳大地后，在人民革命的洪流面前，他选择了光明的前途，走上了起义投城、接受和平解放的道路，向往额济纳旗的繁荣昌盛。这些是他一生中最突出、最光荣的业绩，

总之，塔旺嘉布先生是我们党的一位好朋友，是民主进步人士的楷模。他于一九六〇年在他65岁时就与我们永别，是件憾事。

人 物 注 释

1、苏剑啸，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一个时期。后来在锡林郭勒盟工作期间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被土匪杀害。

2、周仁山（又名周生翔），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一个时期。于一九五八年在北京病逝。

3、关布扎布（李宝华、李春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人们称他为李参谋。解放前在额济纳旗工作过一个时期。

4、苏满都巴雅尔（苏裴然），系苏剑啸三弟，在额济纳旗工作多年，1950年在额旗谋杀，又说自杀，待考证。

5 苏宝峰，苏剑啸的二弟。曾任额济纳旗驻京代表工作多年。现在北京。

（本文选自《额济纳旗文史资料》（蒙文），刊用时编者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颂尔敦仓 翻译 朝格图 审校）

梁、胡嫌疑案真相

戚 涛

一九四八年秋，原阿拉善旗审理一宗共产党嫌疑案，此案不仅使达理札雅及旗政府协理罗巴图孟轲心惊胆战，甚至震动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国民党中央政府，在阿旗上层风声鹤唳，大有危机之感，有些群众也因事关重大惊疑不定。但是本案的审理过程当时绝对保密，一般人知情不过一鳞半爪，所有经过及审理意图外界不能得知，至今日事隔三十五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一大疑案。然而这一案件为阿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从中可以窥见旧社会统治阶层为了内部互相斗争，不顾牺牲劳苦大众的悲惨情状，有教育后代的现实意义。我为当年涉及这一案件的罪魁之一，了解本案的全部真相，兹以知罪忏悔的心情，愿将本案始末公之于社会大众而不计个人之露丑贻羞。

本案共捕三人，其一名梁德山，陕西榆林人，时年五十余岁。另兄弟二人，兄胡开山，四十余岁，弟胡开科，瘸一腿，约四十岁。当年梁、胡等三人由宁夏盐池县以乞讨为生，辗转流浪来到阿旗定远营，偶因在南关大树底买肉吃（生羊肉买回自炊），被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驻阿旗情报组特务苏效勤发现（苏的公开身份是阿旗骑兵保安总队通讯分队报务员，为长官公署所派。），认为形迹可疑，追踪到三人栖息之所，返回报告该情报组负责人燕振东，燕亦认为叫花子买肉吃不合情理，即与苏同往，将三人逮捕，苏进行搜身，又获以红线串在一起的麻钱七枚，认为嫌疑更大，遂将三人带回该情报组关押审讯，疑案由此引起。

达理札雅得悉后，认为该情报组并非军政机关，擅自在定远营秘密捕人，侵犯阿旗主权表示不满。燕振东迫于达的压力（恐达上告受责备），遂将梁、胡等三人连同审讯供词一纸，一同转送国民党中央政府国防部驻阿旗军事专员办事处，由该处继续审讯处理，而该办事处军事专员罗大熠又以“缺乏囚粮”不便羁押为由，转送阿旗政府，由旗政府理事官厅（相当于法院）收押。

旗政府接受这一案件后，并未予以十分重视，认为燕等可能故意造假案向上级缴功（此为彼等惯技），仅由理事官厅总管（相当于法院院长）张仁一人进行初步复讯，但复讯结果却殊出意外。原来根据燕组转送军专处，又由军专处转送阿旗政府的简单问答式口供所述，并经张仁复讯无误，案情的要点大致如下：

梁德山与胡氏兄弟二人原不相识，在行乞中相识并结为一伙，在宁夏省盐池县（该县毗连陕北红区），偶遇一不知姓名的红军排长，因受该排长之托，前来阿旗与一个名叫“巴海马奈格”的蒙人联络，联络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仅命将一串七枚麻钱交付该蒙人即可，并无任何报酬。梁、胡等来阿旗后，并未寻到该蒙人即被逮捕。

显然这一口供不明不自似是而非，但其中所供蒙人“巴海马奈格”适与旗政府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轲的另一尊名相吻合。“巴海”是蒙语小的意思，“马奈格”是名字。当时阿旗卸任协理罗恩凯巴图，汉名罗云卿，年纪五十多岁，尊为“大协理”，蒙语尊为“大马奈格”；现任协理罗巴图孟轲，汉名罗相丞，四十余岁，称为“小协理”，尊为“小马奈格”或“巴海马奈格”。显而易见，梁、胡等的供词指明阿旗蒙古人“巴海马奈格”勾通陕北红区共产党，可这个“巴海马奈格”又暗指本旗德望攸归的罗协理。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轲得悉这一情况后十分惊疑，认为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阴谋，并肯定幕后主使者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目的在于陷害铲除罗巴图孟轲，打击达

理札雅，进而并吞阿拉善旗。

达、罗二人在未经调查证实之前，遽下如此大胆的结论，其根据是逮捕梁、胡等三人的理由极不充分，案情的发生突如其来，所供内容离奇古怪违背情理，尤其“巴海马奈格”名字的吻合目标在于罗协理十分明显。燕振东以刑讯逼供，罗大燮不愿受理，种种疑窦使达、罗二人自一开始就认定这是一个政治阴谋。然而燕振东自来阿旗一年多，与达、罗之间并无嫌隙，本案居心险恶，背后必有更大的主使者。而肯定这个主使者就是宁夏省的马鸿逵则有其历史上的根源：

远在一九三八年，因日本特务来阿旗活动，马鸿逵以“通敌”的罪名陷定远营，将阿旗保安队缴械，洗劫王府财物，俘虏达理札雅软禁兰州达数年之久。由此省旗交恶，达理札雅以奇耻大辱耿耿于心，夙兴夜寐视马鸿逵为仇寇未尝去怀，一直靠拢国民党中央政府与马鸿逵周旋抗衡。

同时宁夏省在定远营长期驻军一个营，并设置省方办事处在定远营编立保甲，定期征兵、征马、征驼，阿旗政府受其威胁，行政权利亦被侵犯，省旗矛盾日益尖锐。于一九三七年春夏之交，阿旗曾呈请国民党中央政府行政院内政部，以定远营系阿旗首府受省方驻军威胁，省方办事处控制定远营保甲征兵，征马，征驼为变相县政府，与阿旗政府形成双重政治，不堪命，亦与国家体制不合，请求中央政府撤走宁夏省在定远营驻军，取消省方驻定远营办事处，禁止今后在阿旗继续征兵、征马、征驼，以保障阿旗的自主权利。马鸿逵得悉后大发雷霆，竟直接来函达理札雅，以阿旗蒙族祖居青海，移居宁夏境内不受省方管理，反而反对省方在管辖境内驻军和编置保甲，破坏省方行政，是为“大逆不道”要求达理札雅“滚回青海老家去”。达理札雅受此侮辱气愤填膺，即将原函转呈国民党中央政府蒙藏委员会，请求“中央作主”。而蒙藏委员会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好复电达理札雅予以慰勉，不

了了之。

一九四八年初，当时我兼任阿旗政府教育处主任和蒙文学校校长，因不懂蒙文蒙语工作不便，请求协理罗巴图孟轲调来某地总管（若干巴格之上设一总管，相当于区长）齐文魁接替我的兼职，但齐文魁因早年曾在外蒙布里亚特等地读书，竟被宁夏调统室（中统）驻阿旗情报组指控为共产党，马鸿逵即据此上告国民党中央政府，国民党中央政府命令国防部驻阿旗军事专员办事处查明具报，一时闹得满城风雨，齐文魁成了重大的嫌疑分子。我因事故由我而起，为罗协理找来麻烦，遂即函呈蒙藏委员会说明齐文魁仅系幼年中蒙尚有通商往来时去过外蒙读书，此后即在阿旗任职，查无任何轨外言行，况且中蒙商民隔绝已有二十多年，联系实不可能，齐文魁为共产党纯属无稽。该军专处军事专员罗大熠与我和罗协理私情都好，并电国防部为齐解脱，此案遂被消弥。

一九四八年夏，该军事专员办事处忽又接到国防部电令，以据报（未说明何方所报）阿旗协理罗巴图孟轲有勾通陕北共产党重大嫌疑，命该办事处立即查复。罗大熠为示讨好阿旗，将消息泄漏给达理札雅，表示愿复电国防部为罗协理辩解。该办事处副专员卢景儒（军统分子）亦来罗协理私寓，拉拢罗直接与军统局挂钩，由军统局保证其绝对安全。当时达、罗二人都感事态严重判断又是马鸿逵的阴谋，志在铲除罗协理，为并吞阿旗扫除一大障碍（罗为阿旗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掌握阿旗军政实权，而且性格倔强敢作敢为，对宁夏省在定远营控制保甲征兵、征马采取敌视和不合作态度，致使省方在阿旗不能为所欲为，马鸿逵恨之入骨，数年前曾将罗扣押于宁夏省军法处达数日之久，致使罗从此不去银川）。然而达、罗却又不愿接受卢景儒的建议投靠军统局，以免军统局为特务机关被其挟制不自由，拟议由我陪同罗协理去南京蒙藏委员会当面陈诉请求保障（蒙藏委员会对省旗交恶的历史较为熟悉，又是阿旗直属的上级机关，易于同情阿旗），后因

当时的交通条件乘汽车经银川前往南京恐被马鸿逵截获扣押，事态扩大不好收拾，由沙漠驼行去兰州转南京又费时日贻误大事，经再三研究，改由达理札雅出面函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系CC骨干，达的好友，在国民党中央颇得宠信），由李在党内为罗协理辩明是非，另由我函呈蒙藏委员会说明国防部所获情报纯系造谣生事毫无根据。不久李电告中央已经谅解，保证罗协理身家安全；蒙藏委员会亦转函国防部，以该部情报查无实据，对罗案请予免究，一场轩然大波始告平息。

以上是梁、胡案发生前省旗矛盾的几件较大事例，至于其它较大的齟齬，历年来时有发生，不胜枚举。自梁、胡案发生后，由军专处转送阿旗政府审讯期间，宁夏省办事处及驻军工兵营也在定远营大肆抓捕讨饭的乞丐，关押及审讯情况对旗政府保密，旗政府自然不敢过问，并有一名十余岁的乞儿被工兵营营长马友援捕送银川下落不明（既不知逮捕原因，也不知送去何处），这一情况为前所未有，引起旗政府的更大惊疑，致使达、罗二人断然相信梁、胡案的幕后主谋者仍为马鸿逵无疑。

由于这一案件不但涉及罗协理个人的安全，也与旗政府的前途命运有关，尤其人证口供具在，使达、罗二人有口难辨，感到十分棘手，好在本案已由旗政府自行审理，可在审讯过程中迫使梁、胡等供出真相，取得马鸿逵栽赃陷害的确证，再向中央政府申报与马鸿逵“打官司”。但是梁、胡等既以共产党嫌疑被捕，即应依据燕组转来的原始口供进行审理。另因此时中统，军统，国防部二厅，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在阿旗各情报组均有情报上达，国民党中央政府及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业已得悉本案为共产党嫌疑案，而对阿旗政府所发现的重大疑窦尚不知情。此外还须谨防马鸿逵狗急跳墙节外生枝，或对阿旗进行武力报复，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阿旗对本案继续审理必须谨慎从事，并对外严格保密。

阿旗政府开始正式审理后，第一次除总管张仁外，又指派我

和李文钦（参谋主任），李树德（稽查局长），朱门（司令办公室），张元忻（区防司令部副官处主任），郑礼范（区防司令部军需主任）等六人参加，在理事官厅法庭集体进行，先后分别传讯梁、胡等三人讯问约三个小时，此后则每次两三人轮番参加，间隔一、二日进行一次，每次两三个小时不等，共进行十余次，为时一个多月，曾经使用逼供，诱供，刑讯等各种方式。综合数次审讯结果，得出下列情况：

梁、胡等对盐池县北大池盐场情况熟悉，曾在该处居住两年，初时从事背盐劳动，后以乞讨为生，梁并于数年前曾在伊盟乌审、鄂托克等旗居住多年。能操蒙语，三人都无文化不识字，无家无业随处流浪。于一九四八年初，三人由盐池县北大池出发，经伊盟鄂旗，宁夏平罗、惠农等县农村一路行乞辗转来到阿旗，先在水磨沟行乞数月，后又前来定远营已两个多月。在盐池县行前约一个月认识一名红军排长，三人同受该排长之托，将红线一串麻钱七枚带交阿旗王爷府（定远营）蒙人“巴海马奈格”，所识红军排长是在行乞时偶然遇到的，身穿灰军服（宁夏军队穿黄军服）没有领章帽徽，当地（盐池县）口音，大个，三十多岁，未说姓名自称是红军排长。因盐池县靠近红区，乡间老百姓时常遇到红军前来买盐购粮不以为怪，故受该排长之托时，认为是平常小事慨然应承。至于七枚麻钱系何意义，排长未说三人也未询问，而且当时三人也未预计一定前来王爷府，更不知该“巴海马奈格”居住王爷府何处，只听该排长说“巴海马奈格”是军人，到王爷府打听就能找到。所以三人原来打算如能来王爷府打听到该蒙人就将七枚麻钱交付，如不来王爷府或寻找不到该蒙人此事就了结。其次该排长当时并没有帮助路费或给予其它报酬，也未说明寻到“巴海马奈格”交付麻钱后有何好处，因此三人虽然受托并不热心。

显然梁、胡等熟知宁夏与红区打仗对敌（审讯中并不讳言）

而接受不相识红军之托，远道前来阿旗找寻不相识蒙人“巴海马奈格”交付七枚麻钱不近情理。然而经过多次严刑（鞭答、压杠）逼讯或温存诱导（美食、甘言、欺骗），梁、胡等三人却始终不翻供，虽在受刑后有一次否认有此红军排长，否认有受托使命，但下次再讯时前后矛盾不能自圆其说时又肯定原始口供。对于七枚麻钱则不作任何解释（麻钱为废弃货弊，当时一般平民家藏或身带麻钱并不为奇，儿童则常以麻钱为玩具），也不说明代表意义，一直坚持“排长没有说”或“不知道”。最为严重的是，对于“巴海马奈格”名字的由来不肯吐露任何线索，而是在被分别审讯中口供一致。始终坚持和红军排长不相识，也不知其住址，仅由排长告知该“巴海马奈格”是王爷府军人。来到阿旗后在水磨沟和定远营均未向任何人打听过，不知究竟有无此人，不打听的原因则是刚来王爷府“没有来得及”（显然也是支吾之词）。因为这是本案的中心环节，为所有审讯人员追询的重点，而梁、胡等每在此关键问题上坚持原供不肯吐实，审讯人员希望梁、胡等推翻在情报原供，从而使本案有所突破的意图终未达到，甚至数次刑讯威吓，示以原供不足凭信也无济于事。面对此种情况，经过分析研究，当时的判断是：

第一，盐池县毗连红区，梁、胡等身为行乞贫民随处流浪，为红军利用的可能性不容遽予排除。但所供红军排长既无姓名住址受托的使命为何也概不知情，七枚麻钱仅能作联络讯号，不能代表联络的意义，仅有一次在刑讯威逼下供称红军排长曾给予钢刀一把，命其前来“偷割电线”，但当时阿旗各地并无电线可割，说钢刀埋在水磨沟大庙墙外未曾使用，而经押赴水磨沟大庙又指不出钢刀所在，显系受刑后胡言乱语不足为信，所以梁、胡等远道前来阿旗的真实使命仍不可知。

第二，所供蒙人“巴海马奈格”为王爷府军人是本案的中心环节，经认真调查，保安队官兵或稽查局员警中，以及各级文职

人员甚至普通平民中都无其人，而认为蒙人即为罗协理则不可想象，达理札雅本人所有参加审讯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此都无丝毫怀疑，那么此名恰好符合协理的另一尊名（况此名为罗协理的呢称，日常使用任人皆知），罗协理又确系军人，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第三，燕振东等素知“巴海马奈格”是罗协理的呢称，而在审讯中既不追问，在转送供词时也不说明；同时罗大焯平时与罗协理交厚，对此也装聋作哑不置一词，都十分值得怀疑。此外据梁、胡等供称在情报组审讯时期确曾多次施用酷刑，包括灌辣水，抽筋（反压四肢），打竹签（细竹削尖砸入指甲内）等；最后确定转送军专处的供词，系事先写好由梁、胡等捺指印（前此历次审讯也有记录，但不对梁、胡等宣读核对，也不令梁等捺指印）。但在旗政府复讯过程中，梁、胡等对在情报组原始口供却一直供认不讳，并无企图翻供的表现，也不补充新的内容。鉴于上述可疑现象，阿旗认定本案系马鸿逵利用燕振东情报组所发动（因该组属于中央系统较为方便），梁、胡等或系省方直接指使，或系被燕组所胁迫，都有可能，因而对于燕组原始审讯情况，旗政府不便前往联系了解（旗政府也不愿与秘密情报组发生直接联系），以免打草惊蛇。

于是根据分析判断，阿旗政府在后期多次审讯中，集中追求三个目标，企图使本案发生重大突破：

一、迫使梁、胡等供出所奉红军排长使命实际可信的情节；或梁、胡等承认本身确为红军“密探”，而供出前来阿旗活动的证据（如与某人曾发生联系等），从而推翻本案为马鸿逵栽赃陷害的判断，以便从速结案，报请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燕组的直接上级机关）最后处理。

二、由梁、胡等供出曾受省方某人指使或被燕组胁迫，原供实系伪造的情节，以便阿旗据以上告“中央”，与马鸿逵“打官司”。

三、由梁、胡等供给线索捕获所寻蒙人“巴海马奈格”或其关系人，则本案亦不难水落石出。

但是审讯结果，上述三个目标一无所获，结案实不可能，再寻其它途径无从设想，而拖延不决诚恐发生意外谣传（省方或燕组很可能造谣生事），与旗政府不利。当时我兼任阿旗区防司令部政工主任，为达理札雅的直接部属，得达的信任命我参加审讯本案，但我的本职是国民党中央政府所派驻旗协赞专员，身份较为超然，达之所以邀我参加审讯达七、八次之多，其目的在于有“中央”人员在场亲眼目睹，于本案取得预期的结果（马鸿逵栽赃陷害）后可以作证，使省方难以抵赖，申报中央政府“打官司”较为方便。可是经过动员所有军政首脑全力以赴，为时一个多月竟毫无效果，达理札雅大失所望，深感问题棘手难办。为了争取主动，以免中央或西北大区责备“办案不力”，或被省方及燕组上告阿旗偏袒庇护共产党，达理札雅命我以政工主任的名义，将阿旗政府接受本案的原因，审讯过程，连同梁、胡等的最后供词，并附燕组转来的原供，以及旗政府认为本案系一大政治阴谋的理由（因无确证未便公开指明宁夏省或马鸿逵），一并申报兰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以本案涉嫌本旗罗协理，旗政府未便自行审理为由，请求将梁、胡等三人解送兰州，由长官公署直接秉公处理。但长官公署复电却不准解送兰州，要求仍由阿旗政府羁押“继续调查证据”，而不说明长官公署对本案的看法，也不指示应循何种途径“继续调查证据”（调查确系红军“密探”的证据，抑系马鸿逵栽赃陷害的证据）。达理札雅接电后，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对阿旗报不置可否，亦无任何慰勉之词，认为是对阿旗“不表同情”（达原指望长官公署同情阿旗的立场）。本案之发起者为长官公署属情报组，对该组逮捕梁、胡等三人的理由极不充分，任意施用酷刑秘密审讯，长官公署也不追究（原以为长官公署必然追究），是对本案“不负责任”。本案在阿旗审讯一个多月并

无进展，改由长官公署直接处理，下令省方和燕组供给线索较为方便，长官公署代表中央大公无私，对于省方和阿旗名无偏袒，自可由长官公署作出结论为罗协理洗刷较为公允（不指明省方阴谋亦可）。但长官公署却不为阿旗设想，反而电令阿旗政府“继续调查证据”，是为“与阿旗为难”。对此达理札雅十分气愤，而另行呈报中央政府又恐不得要领（中央政府不会越过大区进行处理或作出结论），“继续调查证据”无从着手（所有参加审讯人员都有同感）。于是达理札雅下令理事官厅停止审讯，以便等待中央政府或西北大区进行追究，马鸿逵或燕组提出异议，旗政府即据理进行抗争，指明本案实非阿旗政府所能处理，请求中央政府或西北大区秉公断处（为罗协理洗刷）。好在梁、胡等三人已在阿旗掌握之中，马、燕无从继续控制，阿旗所有军政首脑都要参加审讯过程，并有“中央人员”（指我）在场“监督”（达理札雅要求我承认监督为阿旗辩护）；那么“官司打到底”，马鸿逵的阴谋就不可能得逞，中央政府和西北大区就不得不在不损害阿旗的原则下指示结束本案（如何结束则非阿旗所必争），那么马鸿逵“丢了魂”，阿旗依然可以赢得“胜利”。

就这样本案被搁置下来，梁、胡三人一直在押，再未进行任何审讯，亦未着手“继续调查证据”。延至一九四九年春，梁德山病死狱中，由旗政府转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奇怪的是在此约近半年时期，省方并无任何举动或表示（阿旗认为省方未便直接公开出头），燕组及军专也默不作声，从不直接或间接询问打听本案在旗政府的审理情况（阿旗认为燕组和军专处乃佯装漠不关心，以免涉嫌与阿旗为敌），仅宁夏调统室（中统）驻阿旗情报组负责人王君惠曾要求“列席旁听”，被旗政府已停止审讯为由予以拒绝。此后德王前来阿旗筹组“蒙古自治政府”，旗政府事务冗繁无暇他顾，接着西安、兰州相继解放，阿旗处境危殆，人心惶惶，本案遂被“遗忘”无人问闻。

阿旗解放后，直至一九五〇年忽闻平罗县有位胡开山、胡开科的亲属(据说是远房侄儿)上控于宁夏省人民政府，以曾闻胡氏兄弟二人解放前被押于阿旗为由要求追究下落，旗政府以“早已驱逐出境”下落不明予以答复。后于一九五三年三月，据原理事官厅法警队队长巴彦额尔克在宁夏省中级人民法院为我历史问题作证时透露：旗政府羁押胡开山、胡开科二人以共产党嫌疑案被阿旗审讯过。但是，解放前夕政府派我将胡氏兄弟二人从定远监狱押出送往住在查干乌素的杨嘎瓦，让其将他们二人驱逐出境，我就按此令完成了任务。后来才听说，杨嘎瓦违背旗政府的命令在驱逐途中擅自枪杀了，于是我才得知这一案的最终结果。这就是梁、胡嫌疑案的全部经过。

阿拉善旗各防卡名称

①特木尔艾固德(三关)、②夏尔库特乐(范家营子)、③雪岭子、④大岭子、⑤黄石沟、⑥毕鲁图、⑦毛石沟、⑧乌兰库特乐(红沟)、⑨古拉本敖色、⑩岸图、⑪喜尼乌苏⑫豪伊尔呼都格(双井)、⑬毫乐宝井齐尔嘎、⑭阿达格道劳⑮扎哈道劳、⑯查干宝拉格、⑰通湖敖色、⑱哈尔号尼图、⑲乌兰呼都格(红井)、⑳豪木黑额肯呼都格、㉑库如木图(庙)、㉒库克达布苏(雅布赖盐池)、㉓银德尔图、㉔库布龙、㉕巴新图、㉖乌租尔(转咀)、㉗西尼呼都格、㉘塔布阿拉达、㉙额肯呼都格(三井子)、㉚艾力布盖(庙)、㉛淖干敖尔布格、㉜库克陶乐盖、㉝班迪陶乐盖、㉞苏红图(温都尔毛道)、㉟雅干、㊱古尔乃、㊲拐子(夏梯阿木)、㊳图克木、㊴赛呼都格、㊵和屯敖包(和屯池)、㊶吉兰太(盐池)、㊷道劳苏海、㊸号依图敖包、㊹阿格特乌苏、45乌尼格图、46雅马图、47胡鲁苏太、48布尔嘎苏太、49根吉图、50沙金陶海、51乌达、52巴彦陶海、53乌兰浩秀(哈鲁乃)、54澄口、55哈西雅图。

(朝格图 辑)

阿拉善、额济纳旗历史由来

朝格图 白晓

翻开史籍、档案便可知道，阿拉善、额济纳两个旗的历史由来与四额鲁特（又作厄鲁特和卫拉特）的历史有直接关系。清朝初时游移到现在的阿拉善、额济纳的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都是从四额鲁特的故地迁徙出来的。

四额鲁特，就是众所周知的绰罗斯（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等四部。额鲁特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北面的贝加尔湖地区。

从十三世纪中叶起，额鲁特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忽必烈与海都之间的战争骚乱，逐渐移居到阿尔泰山西北的额尔齐斯河上游。到了明代，他们日益强大起来，与蒙古黄金家族争夺政权之事屡屡出现。到了明朝末期，拥有四万之众的额鲁特部里有好几个部落，他们逐渐分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大部落。那时准噶尔部驻牧在伊犁一带，和硕特部驻牧在今苏联境内的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一带，杜尔伯特部驻牧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土尔扈特部驻牧在塔尔巴哈台附近。这些部落都以畜牧业为生，由部落首领统管，并在部落之间建立会盟以商定各部落间的纠纷和战事。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四额鲁特由于人口巨增，牧畜增多，草场不够等原因，经四额鲁特联盟的许可，有的部落开始向外迁移，以扩大版图。

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和鄂尔勒克带领他的几万户部众，离开原居地塔尔巴哈台，沿额尔齐斯河而上，赴

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玛努托海一带游牧，不久，原在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一带的和硕特部落的鄂齐尔图车臣汗也带领一部分部众迁徙到阿拉套岭以西驻牧，和罗理带所属来阿拉夏山（现在的贺兰山）西北驻牧。和硕特部落的另一个首领图鲁拜琥固始汗，应西藏黄教之邀进军青海，并乘西藏内乱逐步占据了全藏。后来，图鲁拜琥固始汗的后代继承了祖辈的事业，分别在青海、西藏和阿拉夏山以西的西套一带进行统治。

一、阿拉善旗历史由来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和硕特部首领兼四额鲁特盟长拜巴噶斯诺颜有两子，名叫鄂齐尔图车臣汗和阿巴赖诺颜。鄂齐尔图车臣汗带领和硕特部的部分部众到阿拉套山以西驻牧。拜巴噶斯之弟，即图鲁拜琥固始汗在青海、西藏进行统治。他有十子，其四子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号称达赖乌巴什。巴延阿布该阿玉什原来就与其族兄（叔伯兄）鄂齐尔图车臣汗一起在今新疆的阿拉套岭、阿拉格乌拉（阿拉山口）以西驻牧。

十七世纪前半叶，准噶尔部在巴图尔洪台吉担任首领期间，由于伊犁河流域水草丰美，畜牧业发展较快，逐渐成为额鲁特四部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部落。1664年，巴图尔洪台吉之子僧格继任为准噶尔部首领。1671年，僧格在内乱中被杀。巴图尔洪台吉另一个在西藏出家当喇嘛的儿子噶尔丹闻讯立即赶到准噶尔故地，凭自己的勇猛智慧，并加之达赖喇嘛的支持，集合僧格旧部，平定了准噶尔的变乱，夺得了政权并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本部落内部统治巩固后，为统一额鲁特，扩张了领地。为此，鄂齐尔图车臣汗大为不满，于1676年，攻打噶尔丹而败，噶尔丹获得了部众和许多财产，并把鄂齐尔图车臣汗带回准噶尔，此后给鄂齐尔图车臣分了呼尔东古热庆部为所属并指定了牧地。过了四年（1680

年)以后,鄂齐尔图车臣汗在今苏联毕其河仙逝,巴延阿布该阿玉什之子和罗理;号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固始汗之孙),为了援固始汗扩大卫拉特版图,经联盟准许,拔起草滩庐帐,带领自己的所属旗民万余人到了青海西藏助战。后来游牧在西套。

和罗理为了得到其地,于1681年(康熙二十年)派使者向清朝进了贡。1682年,和罗理在他的母亲克楚尔(又写作克础勒)夫人以及和罗理的七弟土谢图罗卜桑分别派使者去京城(北京)上书请求牧地,并在甘肃、宁夏的边关做买卖。当时理藩院以和罗理所属之民有抢劫掠夺行为暂未准许其做买卖。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和罗理诺颜请求清朝皇帝授予他官阶印章。清朝皇帝认为他游移无定且不管制自己的部属,故未授予。为此,清政府还派尚书阿尔奈到和罗理的部落去说明以上事由。1685年,和罗理诺颜亲自带着七百人赴京城(北京)。康熙皇帝降旨,让其二百人进了关,其余五百人留在归化城(现在的呼和浩特)停候,并用羊和宣化府里的粮食来赏赐。1686年正月,和罗理到了京城,清廷以大台吉的礼仪设宴为他洗尘,并赏给名贵的貂皮衣,清朝廷指定他在阿拉夏一带驻牧。从此,和罗理与自己的族兄之子罗布桑袞布拉卜丹一起移居到了阿拉夏地区,

1688(康熙二十七年),准噶尔部的噶尔丹进攻喀尔喀,与喀尔喀的土谢图汗部齐洪道尔吉争牧地发生了战争。和罗理诺颜为帮齐洪道尔吉打噶尔丹而向清朝政府请授兵遭拒绝。其族兄之子罗布桑袞布拉卜丹率兵向喀尔喀进发,途中遇清朝使节官,被制止而退兵。1689年罗布桑袞布拉卜丹去世。他无子,将其部众交予额尔德尼之子噶尔丹道尔吉(堂兄),仍与和罗理诺颜一块儿驻牧于阿拉夏。此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清朝廷派传谕旨大臣拉都琥来,作为奖赏将阿拉夏地区正式划给了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

噶尔丹进攻喀尔喀,威胁着阿拉夏的边界,1691年(康熙三

十年)清朝廷要将和罗理及部众内迁到归化附近,合并于察哈尔部落。和罗理诺颜久居阿拉夏,不愿迁移,并且率他的部众,掠夺了喀尔喀的丹津额尔德尼的牲畜,杀了其所属。清朝廷让驻防在宁夏的尼雅汉将军加强防守,并让其传谕旨给和罗理要他迁移到归化城附近。为此,尼雅汉将军率军前往,和罗理闻知以为尼雅汉将军率大军来问罪,慌称要在锡拉布尔都接旨,率其部众经呼 and 布日都、巴丹吉林逃往额济纳河。尼雅汉将军派使者说:“大军之来不是要讨伐你们,而是要你们迁移到归化城附近。”和罗理未从,尼雅汉将军追赶,俘获了他的许多族众和牲畜。和罗理知道自己有了罪,带着自己其余属下两千余户,逃到了叫做明干雅马图的地方。康熙皇帝得知晓谕说:“早先因和罗理来归顺,划分领地安置了他。他不思报恩,反而掠夺喀尔喀。让其移居察哈尔,他却违令远逃。朕向来以仁慈宽恕为怀,丝毫没有杀戮之意。你们想迁移到什么地方,任你选择,只是不得抢劫掠夺。”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派将军玛拉、侍卫阿南达去安抚和罗理。和罗理也请求归附。和罗理随玛拉将军到了宁夏。康熙帝下令让鄂尔多斯蒙古将其送到归化城。和罗理认罪以后宽恕了他,仍让他回到阿拉夏故地。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亲自率领大军三路进兵讨伐噶尔丹。和罗理随大军在喀尔喀的昭莫多打败了噶尔丹。噶尔丹向西面撤退。为了防备噶尔丹经哈密逃入青海,警告青海和硕特众台吉的同时让梅林章京阿南达向哈密和甘肃的西边派兵设了哨卡。当时和罗理让所属部众在哈拉芒奈图、布郎克尔等地戒备和罗理自己亲自带领一千兵在阿尔泰山之土鲁图防守。因嘎拉登道尔吉悔认了先前的叛逃之罪,梅林章京阿南达也叫他在紧急时刻援助哈密。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在鄂尔多斯的屯苏海这个地方正式授予和罗理以朝廷的贝勒爵位以及扎萨克印章,管辖其部落之

众，并将其部命名为“阿拉善和硕特旗”，其下设佐领，还规定此旗不属于盟管辖的特别旗，由理藩院直接管辖。此为阿拉善建旗之始。和罗理则是阿拉善旗第一任扎萨克，阿宝为和罗理第三子。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以“重用”（实际上是人质）的办法命阿宝进京，被封为御前侍卫。同年朝廷赐婚，令其与皇族格格爱新觉罗鹤掌公主（俗称道克欣公主）联姻，成为朝廷的和硕额駙。从此以后和罗理再也无法对抗清朝政府，完全归降与清朝政府。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和罗理死。其三子阿宝于1709年继承父王爵位，回到了阿拉善。

1715（康熙五十四年）四月，噶尔丹之侄了、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以两千人的兵力攻夺哈密，清廷为加强防守，将从察哈尔、归化、黑龙江、索伦达斡尔、喀喇沁、鄂尔多斯调来的各部兵交予皇族费杨古指挥，驻防在喀尔喀的托河。又任命阿拉善扎萨克贝勒阿宝为右卫将军参赞大臣，率本部落的五百兵前往屯河。同年，清朝皇帝降旨解散托河驻防，并又命阿宝为军机大臣偕同其兄之子辅国公罗布桑达尔吉，与西安的将军席柱一同前往巴里坤，攻打策妄阿拉布坦所占据的乌鲁木齐等地，所向克捷。他们前后在巴里坤等地驻军战斗六年之久。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冬，西藏的拉藏汗被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的大策凌敦多布所袭杀。为此，清朝两次派大军进藏，征伐策凌敦多布。同时，派都统延信将六世真达赖喇嘛罗布桑嘎拉桑札木苏从青海护送到西藏即位。为护送六世达赖，又特任命阿拉善扎萨克贝勒阿宝为延信将军的军务大臣，从新疆的巴里坤前往青海。阿宝从青海到拉萨大昭参与军务长达两年之久。1723年（雍正元年），为表彰贝勒阿宝军功，晋封其爵位为多罗郡王，并赏银一万两。1724年（雍正二年），青海的罗卜藏丹津（亦作罗卜桑丹津、和硕特固始汗孙）叛入准噶尔，青海发生了骚乱，阿宝奉旨率领部属从阿拉善迁到青海，平定了叛乱。为此，雍正皇帝

将青海贝子罗卜藏丹津遗留下的博罗充科克之地赏给阿宝作为牧地。但他嫌这个地方狭窄，擅自到乌兰穆伦栖居。1729年，由朝廷治罪，降多罗郡王爵位。但过了不久，雍正九年十二月以西路军功复封多罗郡王爵位。阿宝在青海先后住了八年之久后，清朝皇帝念其原来的功绩，让其迁回阿拉善，赏定远营城给他居住。

1729年，雍正皇帝降旨给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汗（策妄阿拉布坦之子），令他速将逃到准噶尔已有数年的罗卜藏丹津送来，并且为了给噶尔丹策零汗施加压力，清军分北、西两路向准噶尔进军。阿拉善郡王阿宝也接旨，要他率自己的军队和另拨给他的一千名士兵到新疆的巴里坤与西路军汇合。同时，给阿宝的长子、二等台吉袞布五百兵，命他也前往巴里坤军前效命，与大将军岳钟琪的一万兵汇合。1730年（雍正八年），噶尔丹策零汗让自己的塔布囊（驸马）率两万兵冲进清西路军的胡协图哨长，抢走近五千匹马，一千峰骆驼。清军哨兵力战七昼夜，阿宝之子袞布和鄂尔多斯台吉丁占拉希的军队助战，打退了噶尔丹策零之子的反清军队，夺回部分牲畜。1731年（雍正九年）阿宝之子袞布从巴里坤撤回全部军队回到了阿拉善。与此同时，西路将军岳钟琪将袞布在战斗中效忠尽力的功绩呈报了皇帝，为此，雍正皇帝晋封袞布以辅国公，奖赏银财，并把此事告知了其父阿宝。1732年（雍正十年）又将袞布从辅国公晋升为固山贝子，赏戴三眼花翎，收为御前侍卫，居住京城。

1739年（乾隆四年）夏，阿宝去世，次子罗卜藏多尔济袭扎萨克多罗贝勒爵位，居于京城。1750年（乾隆十五年），与朝廷皇族格格联姻，成为朝廷的额驸。1755年（乾隆二十年），罗卜藏多尔济从京城回阿拉善时，赏戴双眼花翎，以示恩宠。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阿拉善扎萨克贝勒郡王罗卜藏多尔济接令，率精兵五百，准备了驼马粮草，从西路向新疆，到了巴里坤。那时正是额鲁特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策妄阿拉布坦之外

孙)发动反清叛乱的紧急时刻,阿睦尔撒纳活动在博罗塔拉一带。扎萨克郡王罗卜藏多尔济和梅林章京爱隆阿兵分两路到了塔尔巴哈台。当时,辉特部的巴雅尔汗利用山势之险逃跑,罗卜藏多尔济紧追六天。途中有二百来名哈萨克族兵挡住了去路。罗卜藏多尔济一马当先率几名骑士勇猛地冲了上去,哈萨克兵心惊胆战,请求投降,辉特部的巴雅尔汗也被罗卜藏多尔济活捉。罗卜藏多尔济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立了军功,由扎萨克郡王晋封多罗郡王,同时还被授予议政大臣。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廷命阿拉善扎萨克郡王罗卜藏多尔济与车布登扎布将军一起出发征讨哈萨克。当时罗卜藏多尔济体弱有病,让他离开军队回阿拉善养身,同时乾隆皇帝为他尽忠效力的功绩赏赐了三眼花翎和黄坐褥。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罗卜藏多尔济向平定回(南)疆维吾尔上层贵族分子大小和卓木起兵反清叛乱的大军送五千只羊作为军粮。

1765年(乾隆三十年),根据罗卜藏多尔济对朝廷尽忠效力军功卓著,屡次以少胜多,晋封为和硕亲王,赏给玄狐皮衣和橙色缰绳。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阿拉善亲王罗卜藏多尔济奉乾隆皇帝的命令,率五百亲兵到兰州,与清朝大军一起镇压青海循化撒拉族苏四十三领导的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起义军大败于华林寺。对此,乾隆皇帝又下令将其亲王爵位定为世袭。

1779年(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赏赐给罗卜藏多尔济之子,一等公台吉旺沁班巴尔以双眼花翎、黄坐褥、紫红缰绳,纳为御前侍卫,让其住京。

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旺沁班巴尔接受了银川新城清朝军队的梅林章京、协同管辖额济纳旗的职务。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旺沁班巴尔与宁夏梅林章京一起镇压了甘肃通渭石峰堡回民田五为首反对地方官府的起义之后,继承其父罗卜藏多尔济的

亲王爵位。是年，与贝勒之子的格格联姻成为旗额駙。格格病死以后再与皇族五阿哥公的格格联姻成为朝廷额駙。朝廷授给旺沁班巴尔之弟玛哈巴拉（又作玛哈巴尔）一等台吉爵位。

二、阿拉善旗札萨克王继位表

1、第一代扎萨克王——和罗理：即巴颜阿布该阿玉什长子，号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六年（1697—1707）在位十年。

2、第二代扎萨克王——阿宝：和罗理三子，号孟根阿宝，康熙四十八年至乾隆四年（1709—1739）在位三十年。

3、第三代扎萨克王——罗卜藏多尔济：阿宝次子，号博克达诺彦，乾隆四年至四十八年（1739—1783）在位四十八年。

4 第四代扎萨克王——旺沁班巴尔：罗卜藏多尔济长子，号布尔罕诺彦，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九年（1784—1804）在位二十年。

5、玛哈巴拉：旺沁班巴尔胞弟，号阿其图诺彦，嘉庆九年至道光十二年（1804—1832）在位二十八年。

6、第五代扎萨克王——囊多布苏隆：玛哈巴拉长子，号葛根诺彦，道光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32—1844）在位十二年。

7、第六代扎萨克王——贡桑珠尔默特：囊多布苏隆独子，号呼毕勒罕诺彦，道光二十四年至光绪二年（1844—1876）在位三十二年。

8、第七代扎萨克王——多罗特色楞：贡桑珠尔默特次子，号呼图克图诺彦，光绪二年至宣统二年（1876—1910）在位三十年。

9、第八代扎萨克王——塔旺布理甲拉：多罗特色楞长子，号乌鲁希叶勒图诺彦，宣统二年至民国二十年（1910—1931）在位二十一年。

10、第九代扎萨克王——达理札雅：塔旺布理甲拉次子，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三十八年（1931—1949），坐位十八年，解放后任旗长、宁夏省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兼巴盟盟长等职，于1968年含冤而死。

三、额济纳旗的由来

前面提到的土尔扈特部的首领和鄂尔勒克诺颜带领所属几万户，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沿额尔齐斯河而上，到遥远的伏尔加河下游的叫作玛努托海（又作玛呢图噶图勒）的地方游牧。和鄂尔勒克有六子，长子书库尔岱青，次子伊勒登诺颜，三子罗卜藏诺颜（又称罗卜桑诺颜，曾经也是有名望的人物）。土尔扈特部落虽然生活在遥远的俄罗斯地区，但始终未忘记自己的故土。1655年（顺治十二年），和鄂尔勒克的长子书库尔岱青派锡喇鄂木布为使者，向清顺治皇帝呈表进贡。1656年（顺治十三年），和鄂尔勒克诺颜的次子伊勒登将锡喇尼和硕齐作为使者派往清朝。1657年（顺治十四年），和鄂尔勒克诺颜的三子罗卜藏及其子多尔济派遣使者沙克锡布特、达尔汉乌巴什阿巴刺等，以挑选出来的驼、马二百余匹向清朝进贡，此外还牵马千余匹到归化城开设马市贸易。书库尔岱青的儿子朋楚克、朋楚克的儿子阿玉奇世世代代为土尔扈特部落的首领。到了阿玉奇这一代，始自称汗。以前，书库尔岱青为其子朋楚克娶了留在故乡的巴图尔浑台吉的女儿为妻，生了阿玉奇，并养育在巴图尔浑台吉那里。后来书库尔岱青诺颜到西藏熬茶礼佛，返回时途径准噶尔，将阿玉奇带回土尔扈特。阿玉奇有一姐一妹，姐姐嫁给喀尔喀蒙古的莫日根汗额热亥，妹妹嫁给了和硕特部的鄂齐尔图车臣汗，鄂齐尔图车臣汗也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卜为妻。1676年，鄂齐尔图车臣汗与准噶尔的噶尔丹宝什格图战乱中，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妻多尔济阿喇布坦同准噶尔的阿其图曲

尔吉和土尔扈特使者一起回到了土尔扈特，靠其兄阿玉奇为生。噶尔丹是策妄阿拉布坦的叔叔。噶尔丹汗被清朝大军战败于喀尔喀的昭莫多，1697年三月服毒自杀。他死后策妄阿拉布坦为汗，将全新疆纳入其控制之下。准噶尔部的绰罗斯氏本来与土尔扈部有姻亲关系。1698年，土尔扈特阿玉奇汗将其女儿嫁给策妄阿拉布坦为妻时，阿玉奇汗让他的三子散扎布率部众一万五千余人同往游牧。1701年，策妄阿拉布坦也将自己的女儿达尔玛巴拉送给阿玉奇为妻。但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之间立场不同，有意留住阿玉奇的三子散扎布及其一万五千余人，久久不准回伏尔加河牧地。阿玉奇汗怒，坚决而再三交涉，才将散扎布放回，但尽夺其一万五千余名部众，不让返回。由此，阿玉奇汗和策妄阿拉布坦汗的关系恶化，矛盾越来越尖锐。

1698年，阿喇布珠尔经叔父阿玉奇之托，与自己的母亲和妹妹率领五百兵和一部分部众，从土尔扈特的玛努托海出发，到西藏达赖喇嘛那儿熬茶礼佛。阿喇布珠尔一行走的很慢，到西藏大昭拜见了达赖喇嘛，住了五年之后返回来时，清政府以准噶尔的策妄阿拉布坦与阿玉奇汗结了仇，归途被堵等为由，将阿喇布珠尔留住，阿喇布珠尔无奈，派特使到北京“乞内附”。康熙皇帝为了“拢络”他，于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划嘉峪关外的党河、色尔腾、马海一带（今甘肃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境内）作为牧地，并封为固山贝子。从此以后，固山贝子阿喇布珠尔就成为额济纳旗的始祖。

阿玉奇与策妄阿拉布坦结仇后，策妄阿拉布坦多次拦劫阿玉奇去清政府的使者，绝其贡路，因而，阿玉奇不得不另觅新的通道。于是，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派遣萨穆坦等人，带上土特产，假道沙俄的西伯利亚经喀尔喀蒙古的库伦，历尽两年半的旅途艰辛，在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才到达北京进奉表贡。为此，康熙皇帝对土尔扈特蒙古的一片忠诚深为感动，也派使团前

往，使团成员是：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新满洲噶扎尔图、朱邱及，内阁侍读图理琛。此外，还有阿喇布珠尔派回阿玉奇和他父亲纳扎尔玛穆特处的额鲁特人舒哥、朱斯等人组成。同行的还有三名随从武官，二十二名家仆，共计三十二人，使团的首脑是太子侍读殷扎纳。图理琛本来不是使团的首脑，但由于出使回国后，将经历的所见所闻撰写了《异域录》一书，该书问世后，曾驰名中外，因此，后来人们就把这个使团通称之为“图理琛使团”，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公认。

内阁侍读图理琛的使团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从北京出发，前往阿玉奇汗的牧地玛努托海。图理琛的使团经过两年的艰苦跋涉，于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一日），抵达阿玉奇驻地。阿玉奇汗以重礼迎接了他们。图理琛还会见了阿喇布珠尔之父纳扎尔玛穆特，并说想要将阿喇布珠尔遣回，以便与亲人团聚。阿玉奇汗和纳扎玛穆特说：阿喇布珠尔已受重禄，并有了栖居之地，我们是很放心的。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清朝为防备策妄阿拉布坦而整军备战，并命土尔扈特的阿喇布珠尔率兵五百从军效劳，让其驻防在噶斯（在青海省境内）。不久阿喇布珠尔就去世，其子丹忠袭贝子爵位。

雍正初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凌嗣立后，也多次发动军事事变，先后两次进袭喀尔喀。1729年（雍正七年），丹忠参加了清政府讨伐噶尔丹策凌的军事行动。是年，丹忠到京，雍正皇帝晋封其为多罗贝勒。1731年（雍正九年），丹忠的部下莫尔根绰尔济叛变，投靠了准噶尔的噶尔丹策凌，丹忠非常害怕，为避免准噶尔部的骚扰，向皇帝请求向内迁移，清政府允其所求，派大臣扎拉汗嘎指定阿拉克乌拉、马鬃山一带驻防，可他嫌地太狭窄，再求迁移到了额济纳河一带，为此清政府正式批准其求地。

1740年（乾隆五年），多罗贝勒丹忠谢世，其子罗卜藏达尔扎继位。罗卜藏达尔扎尚幼，由理藩院特派大臣代罗卜藏达尔扎管理其部众。1753年（乾隆十八年），清政府授罗卜藏达尔扎扎萨克印，额济纳土尔扈特旗正式成立。但罗卜藏达尔扎年幼，尚不能处理扎萨克事务，仍派官暂时代理。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由于理藩院呈报罗卜藏达尔扎已学会管理扎萨克事务，因此朝廷撤回委派的代理官，由罗尔藏达尔扎亲自管理额济纳土尔扈特扎萨克事务。

四、额济纳旗札萨克王继位表

1、第一代旗王——阿喇布珠尔：即纳札尔玛穆特之子，康熙四十三年至五十五年（1704—1716）在位十二年。

2、第二代旗王——丹忠：即阿喇布珠尔长子，雍正七年至乾隆五年（1729—1740）在位十一年。

3、第一代札萨克王——罗卜藏达尔扎：即丹忠长子，乾隆五年至十八年（1740—1753）坐位十三年，乾隆十八年正式命札萨克王至三十二年（1753—1767）在位十四年。

4、第二代札萨克王——旺札勒车凌：即罗卜藏达尔扎长子，乾隆三十二年至四十八年（1767—1783）在位十六年。（1783—1810年的二十七年中未出继位人）。

5、第三代札萨克王——东德布才仁：即旺札勒车凌次子，嘉庆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10—1812）在位二年，

6、第四代札萨克王——巴雅尔莽奈：即东德布才仁长子，嘉庆十七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12—1841）在位二十九年。

7、第五代札萨克王——达什车楞：即巴雅尔莽奈之子，道光二十一年至同治八年（1841—1869）在位二十九年。同治八年遭

马化龙义军杀害，因此其夫人执旗政四年之久。

8、第六代札萨克王——丹津：即达什车楞侄子，同治十二年至光绪十八年（1873—1892）在位十九年。

9、第七代札萨克王——乌勒哲依巴达尔呼：即丹津长子，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五年（1892—1899）在位七年。

10、达什：即乌勒哲依巴达尔呼堂弟，光绪二十五年至民国十九年（1899—1930），在位三十一年札萨克王。

11、第八代札萨克王——托布信巴依尔：即达什长子，民国十九年至二十七年（1930—1938）在位八年。

12、塔旺嘉布：即托布信巴依尔四弟，民国二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938—1949）坐位十一年。解放后先后任旗长、副盟长等职，于一九六〇年病故。

参考书目：

- 1、《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 2、《阿拉夏山和硕特王公姓氏业绩奏折》
罗卜藏多尔济 著
- 3、《清代中西历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资料室编
- 4、《蒙古沿革志》 沈宗衍 著
- 5、《西域图志》
- 6、《蒙古青史译注稿》 谢再善译注
- 7、《西陲总统事略》
- 8、《从西记略》 范兆贵著
- 9、《西征记略》
- 10、《塔尔巴哈台事宜》 永宝著
- 11、《阿拉善旗历史简记》 黄孟和乌力吉编著

- 12、《巴音笋布尔》杂志 阿左旗语委编
- 13、《蒙古游牧记》 张穆撰
- 14、《土尔扈特部蒙古万里归国记》 张平一著
- 15、《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 冯锡时
刊《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
- 16、《“图理琛使团”出使土尔扈特部和〈异域录〉一书》
郭蕴华 刊《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

1981年初稿于兰州，1985年初修改于巴彦浩特

名 词 解 释

〔绿营〕清朝承袭明代兵制编设的汉人常备军。因其旗帜是绿色，亦称绿旗。绿营分马兵、守兵、战兵。战守皆步兵。绿营除隶属禁旅的京师五城巡捕营步兵，余皆分隶各省。总数为六十六万人。征三藩，平准噶尔、回疆及大小金山川，都有绿营参战。自白莲教、太平天国起事后，绿营声气不振，叠受裁汰。至清末减四十万人。

（朝格图 辑）

古居延与额济纳土尔扈特之来历

巴 达 尔 胡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变迁，额济纳地区变成了北方英雄民族匈奴的领土。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秦时额济纳称为“流沙”或“弱水流沙”，到了汉初叫“居延”。居延地区从西汉到东汉的三百多年是最为繁荣发展的时期。

公元前一二一年（元狩二年），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一万从陇西出发，经现在的甘肃省山丹县境内的焉支山讨伐在居延的匈奴，收复了河西走廊以南的地区。汉朝打败匈奴，占去此地之后，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与河西走廊以北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公元前一〇二年（太初三年），汉朝又派戍边军十八万到酒泉、张掖、居延等地，废止两县机构，建立了“张掖居延属国”，别领居延城。

从公元二二〇年（延康元年）到魏晋时期，此地又称“西海郡”。公元三〇七年（永嘉元年）以后分别由前凉张贵、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西凉李暠等相继割据统治。北魏时为凉州所辖地。大约在公元五九〇年间分别属甘州、肃州、吐蕃管辖。七四三年（天宝二年），唐朝在居延建立“守寇军”，统管居延军事。七五五年（天宝十四年），安石之乱之后，吐蕃贵族趁唐朝内调驻守在沙州、北庭的何龙军队之机，侵占了甘州、肃州、凉州、瓜州、沙洲、北庭等地，切断了长安和西域的交通。这条路被

切断后，居延地区却成了通往回纥的主要关口，为此，在北庭、沙州的节度使也都通过居延与长安联系。七六六年（大历元年）以后，居延地区曾先后被吐蕃、回纥、契丹占领。

九六〇年宋太祖登位，这里的党项人进一步养精蓄锐，不断扩张领土，将该地割据霸占，最后脱离宋朝统治，另立国家。那时居延地区位于它统治的北部边境，因此，一〇〇四至一〇〇七年（景德元年到四年）完全成了西夏国统治之下，西夏在居延地区建立了“威福军司”和“威福军城”等防守机构。

从一二〇五年起成吉思汗大军先后四次路过居延攻打河西以北地方，一二二六年二月南征时占领黑城，以武力威胁西夏投降。元世祖皇帝忽必烈于一二七一年（至元八年）统一中国后，在居延地区建立了“亦集乃路总管府”，统管居延地区军政事务。一二二九年元太宗窝阔台继皇位之后，他的儿子阔段太子在这里建立“开府西凉”府，统辖当时的整个河西以北地区。一二三五年阔段太子带兵进入四川，他儿子哲别铁木尔继任，新建宫殿永昌府，又名为“汗宫”。

元朝的版图很广，居延地区在元代时期成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中心和重要交通枢纽。

近代和最近几年从额济纳黑城出土文物中，曾获得诸多泥塑佛象、文律法典及契丹文、藏文、回纥文、波斯文、党项文、突厥文著的经典，从而可知居延在西夏和元朝时期是土地肥沃、水草优美、五谷丰盛、买卖兴隆、香火旺盛的地方。

二

元朝破灭，黑城废弃后，明朝历史上没有修过黑城的事例。清代迁到额济纳河驻牧至今的土尔扈特部，是元、明时期在新疆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居住过的瓦剌部的一部分。后来这个部落分

为准噶尔、和硕特、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四部，这就是历史上的四卫拉特。这里面的土尔扈特部就是来源于元朝出现的客刼亦惕部落首领翁罕的后裔。他们驻牧在新疆塔尔巴哈台一带。翁罕的六世孙子马哈奇孟克有二子，长子叫博果鄂尔勒克，他有四子，长子叫珠拉扎干鄂尔勒克，他有一子，叫和鄂尔勒克。当和鄂尔勒克为土尔扈特部首领时，巴图尔浑台吉是准噶尔部的首领。此时正是准噶尔部的人口增多、畜牧大发展、草场窄小的时候，所以和鄂尔勒克拔起五万毡庐，率领所属二十万，迁到沙皇俄国的伏尔加河（土尔扈特人叫伊济勒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上生活。在一路上抢掠俄罗斯弱小国家，使它们顺从。当时沙俄与波兰之间发生战争，无法派兵阻战士尔扈特。在这种情况下，和鄂尔勒克更加贪婪，继续入侵到阿斯特拉罕，不幸的是在攻城战中战死。和鄂尔勒克死后，再也无力入侵，就定居驻牧，也曾给沙俄几次出兵参战有功，所以得到沙皇俄国的特别关照。和鄂尔勒克有六子，长子叫书库尔岱青，书库尔岱青有四子，长子叫彭斯克，次子叫纳木扎拉（额济纳土尔扈特的祖先纳扎尔玛穆特可能是纳木扎拉之子）。彭斯克的儿子叫阿玉奇，阿玉奇有八子，长子叫贡扎布，贡扎布的儿子叫车如布拉西，他的儿子就是渥巴锡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人认为他们是纳扎尔玛穆特之子阿喇布珠尔的后代。土尔扈特部在俄时为维护自己的独立和自由，同沙皇的民族压迫和阴谋进行斗争，同时派使者与卫拉特部落联盟或清政府经常取得联系。

土尔扈特人信仰佛教，常进藏礼佛。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纳扎尔玛穆特的夫人领其子阿喇布珠尔和五百多人，从万里之外来到西藏礼佛。阿喇布珠尔在西藏住了五年以后，于一七〇三年起程返回。这时阿玉什汗和准噶尔之间正在发生战争，回路切断无法继续行程。于是一七〇四年（康熙四十三年）派人到北京求见清朝皇帝，请求牧地，康熙皇帝同意了请求，并册封

阿喇布珠尔为和硕贝子，赏阿尔金山以东、嘉玉关以外的党河和色尔腾之间的土地做牧地。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阿喇布珠尔之子丹忠继位，因色尔腾距准噶尔近，怕准噶尔的干涉和威胁，稟报清朝政府要求内迁。一七三一年（雍正九年）清政府赏给额济纳河做为牧地。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正式设立旗，名为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

（说明：本文选自《额济纳旗文史资料》（蒙文），我们刊用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删节）

（青格勒图 翻译 朝格图 审校）

名 词 解 释

〔八旗〕清朝的军事组织。按旗帜的颜色分为正黄、正白、正红、正兰、镶黄、镶白、镶红、镶兰八旗，故称。太祖努尔哈赤时创立，以牛录为单位。当初只是满州八旗，至太宗皇太极时又成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清朝入关后，除北京禁旅八旗之外，又分编了常驻地方的驻防八旗。八旗官兵称为旗人，拥有封地和庄户，受到朝廷的保护。

（朝格图 辑）

高世格梅林及其《普济杂方》

段贡布甲布

高世格梅林乃十九世纪蒙医学者之一。我们虽然对他的生平知道得不那么十分详细，但是通过他的著作可以看出，十九世纪末他已经是一位老者了。他是“御前行走阿拉善和硕亲王旗下梅林章京”，通晓蒙、汉、藏、满四个民族的文字，又能相互翻译四种文字，是当时阿拉善旗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之一。他一生不仅为振兴本民族的文化勤奋学习，为国效劳，而且对人民群众的疾病痛苦并非等闲坐观。他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著有《普济杂方》一书，对解除人民群众的病痛，对蒙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活在清朝咸丰、同治年代，阿拉善旗被清朝承认以后，喇嘛教大规模地传入，阿旗王公与清朝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政治上空前的封建化。当时疾病蔓延，牧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高世格梅林的《普济杂方》（以下简称《杂方》）就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在北京木刻出版的。他所收集、整理的药方是以解除人民大众的痛苦为出发点，以“在蒙古地区容易购到的”药物为主编著的。《杂方》序言中有如此记载：“多次转世之活佛，在阿拉善旗内，享誉维宗沙布隆者，明智喇嘛有言：造译汉译良方，杂病速效易治，编著蒙文医书，京城木刻出版。病人得知取方，解除疾病痛苦，此恩必有好报，享福如同海洋”。

由于以上序言的记载，对“杂方”产生了几种误解，造成了众说不一的现象。一说高世格不是《杂方》之作者，而是译者；

二说《杂方》之作者是维宗沙布隆；三说高世格不是医人，还有一种说法，说高世格是医人，且《杂方》就是他所著，笔者同意最后这一观点，其理由是：

一、《杂方》中确有一部分汉医方（中药方剂），是选译了汉族民间单方为主的，但这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是搜集、整理了蒙古民间流传而未记载的单方、验方。如《女病速医方》中写到：“凡女人生产，铺红马皮或双手攥乌布吉伯皮或者是飞鼠石（一种鸟化石）则快生易生，此秘诀也”。“胞衣难下，将其发稍入口中使欲呕即下也”。“灶心土二钱，用水搅拌灌给，则治胎位不正或胎死腹中，甚至难产昏厥”。这些都有明显的蒙古地区民间单方特征，类似治疗方法记载甚多。所以，笔者认为《杂方》决不是个译著，而是撰者。

二、《杂方》序言中也没有说过维宗沙布隆所著，只是说维宗“有言”，是用其所名，为什么借用维宗之名？当时由于喇嘛名气雄厚，所有著书立说的人必须通习藏文“五明学”，所以一般庶民之作难以在社会上传播，尤其当时阿拉善地区学用藏医，以藏文《四部医典》为准，不便发表民间蒙医单方或汉医简方之著。因而，在他的著书中不得不用“福因寺”活佛维宗沙布隆之大名。但是笔者不否认作者当时与维宗合作的可能。这个维宗沙布隆可能就是三世维宗沙布隆伊喜丹金。

三、高世格无疑是一个医人。他通习四种文字，虽做了梅林章京，可精明医理，积极坚持从事临床，与病人接触，积累了不少经验。如：在治疗癣时说：“……这对各种新旧癣、疥之最良方，本人多次亲验得知也”。在治疗胃病的方中说：“……婴儿胎发隔瓦炮制研末，用酒服之，……此乃本人多次试探获得”。由此可见高世格梅林是一位医著学术水平很高的医生，别具一格，有见解，不同于汉、藏医学，所以，应该评价他是近代蒙医药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杂方》只有9600余字，是属于小型医疗书籍，可是内容包括了五官、妇、幼、五脏六腑之病及外伤、皮肤病等十六个章节，记述了280多种单、验方，其数字之多使人感到惊讶。《杂方》的特点是语言精炼，内容丰富，小方治大病、贱药救人命，因而是珍贵的医药学宝库。除有防病治病的内容外，还有绝育等内容。《杂方》不仅对今天的临床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为研究蒙医药学的发展史提供可靠的原始资料。所以，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杂方》成书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承受了历史的考验，全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本了，据我们所知道的，除有北京木刻版外还有藏文旁注手抄本，藏文书写体手抄本等。《杂方》不仅有它医学方面的价值，它还为研究和准确运用阿拉善方言的文学格式及文字沿革学方面提供了原始资料。

作者高世格梅林的著作不仅《杂方》一书，还有许多译书，如：翻译了《钦定万年历及择者金鉴》（同治十二年出版），《新译玉匣记》（同治二十一年出版）等。

总之，高世格梅林一生为人民大众的健康而献出力量，为我们留下了《杂方》这样的宝贵医籍，是对蒙医药学的历史贡献，我们不仅应该纪念他，而更重要的是为我们民族医药学的继承和发展要去学习应用，研究探讨其《普济杂方》。

范氏十一代行医史简略

范诺尔布扎木苏

道格龙是清朝康熙三十年代的阿拉善旗第一个蒙医大夫。

道格龙于1672年（壬子年）出生在青海科克特旗宝力格乌素的古尔巴图家。他幼年就进科克特旗阿拉腾寺的门巴拉僧（藏医学院）习经文学藏医，以阿拉泰医师的名著《秘本释义》为典，精读《四部医典》等医著，学识大为提高，被授予于满然巴（医学博士）学位。后来，因生活困窘，三十七岁时带侄子巴达尔虎，离开家乡到青海省临夏藏族聚居区札格荣贡巴附近地方行医。就在此地给侄子巴达尔虎娶了媳妇。由于在这地方生活到四十五岁，所以，已经习惯于藏族人的生活。就在这时候。他听到阿拉善额鲁特有所景气的消息，就带侄儿、侄媳，长途跋涉，过了长城，于1705年来到了阿拉善西部地区定居。巴达尔虎也有了三子。他们来到这里，求医者日益增多，道格龙名声大扬，人们逐渐称他为神医佼尔吉道格龙。由于叔父年迈，加之巴达尔虎跟叔父学医多年，基本掌握了叔父的本领，就接替叔父就医，日渐成了医道高明的名医。

始祖医师道格龙六十六岁去世。巴达尔虎开始给长子安巴传授家传医术。他八十二岁去世。

安巴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虽然毫无遗漏地继承了家传医术，但为了精通医学，他就去祖父学医过的阿拉腾寺学习藏文藏医。学习五年，在这五年中学过了《四部医典》的全内容，刻苦掌握医疗技术，对药物的辨认和配剂方面已相当通晓，于是返回了家

多。他的医术逐渐高明起来，就医者也很多，名望也就大了。因此旗府衙门封他参领职，主持扎哈道牢巴嘎的事务。安巴医生的独子叫迈玛，父亲从小就把他带在身边，把全部祖传医术教给了他，同时还招收当地和外地的很多学徒，进行训练。因此安巴医生的医术广泛传播，称他巴嘎什艾木其。

安巴于七十八岁去世之后，迈玛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医学知识甚精，所以，诊断准确，疗效高。为此，阿拉善、乌拉特、鄂尔多斯等地常来人请他看病。由于他的牧畜逐渐增多，当时也可以算得上富户，他为了管理好这些家财，先后娶妻三人，分别各生五子，他让第八子（二妻次子）奥斯尔当喇嘛识读经文学习医法。为了让其继承祖传医术，把他留在了身边传授医道。奥斯尔到了十五岁时，被送往青海阿拉腾寺学医深造。奥斯尔学了七年，圆满结束学业返往家乡，他在返回途中，在青海腾格里大坂西部的马营寺住了一年多，主要辨认药物，配制方剂和临床应用等实习性工作。二十四岁时才返回家乡行医。

年迈的迈玛于七十五岁去世。嗣后，奥斯尔医生刻苦钻研，对“七种奇脉律”方面造就很深，切脉特别准确，治疗也非常仔细。为此被人称为“额吉艾木其”。奥斯尔在世时，阿拉善王爷葛根诺彦患了伤寒病，体弱力衰，病势加重。从旗内外请了许多被认为是赫赫有名的郎中，诊断结果都是一样，说王爷身体虚弱而已，为此只能用一些最好的补气滋身的饮食和药物来治疗。虽然多次医疗，但还是无明显好转，反而病情日益恶化，王爷的生命处于垂危之中。无奈只好请奥斯尔医生试一试。奥斯尔来王府给王爷号脉说，王爷大人被误诊为体虚，因而病情越来越加重了。建议让王爷多吃素食，严禁高营养饮食，用印度地丁草配制了八味地丁散进行治疗，果然病情好转至到痊愈。为此，王爷深怀感激之情，赏冬季用的带绸面的两对皮药袋和夏季用的蟒缎面的两对皮药袋，并以官方名义给他下“名医奥斯尔”的谕文证书，

封旗医之称号。他随同阿拉善旗王爷到北京治愈了很多京都大臣，于是名气更大了。在晚年他回家乡，传授医术，为家乡培养了许多好医生。他将大兄的独子道格曾奈吉收为徒弟，教给了全部祖传医术，于八十七岁去世。

道格曾奈吉在他叔父在世时就已经被誉为医治有方的好医生。由于享有盛名，所以，旗衙门下达了印有旗府章印的“神明的贤医佼尔吉·道格曾大夫”的王爷谕文，并授予他旗大夫的称号。道格曾奈吉医生对学习医学非常有兴趣，并在这方面有着他的天资，精通针灸等五种疗法，亦能治疗脑震荡、脱位、骨折等病，特别对难产处置更有独特的疗法。他从二十三岁起行医，至到七十七岁去世。

阿给医生是道格曾奈吉的侄子。幼年在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拜读经书。虽然他弄通《四部医典》等医学书籍，但未外出行医，而当了庙宇的朝格庆·乌木吉德（意为大雄宝殿的领诵喇嘛），即使如此，他对一般的病情和伤风感冒、腰腿痛等病的治疗是一把好手。阿给医生对祖先遗留的宝贵药物标本和器具以及重要书籍珍藏起来，交给了他的侄子贡其格达勃哈，阿给于六十八岁时去世。

贡其格达勃哈从小跟随叔父阿给医生在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熟记了藏医的《四部医典》。二十岁时赴青海塔尔寺的门巴拉僧专心学医。在那里他拜科尔沁旗的名医师，首次获得五行学说朗然巴学位的学者伊希札木苏为师，学了五年广义注解莫卜舍楞，语句注解琉璃温勃和根本医典、论说医典中补充的三种基本秘诀、三百六十种基本手法等医书，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任务。从此后，来到科克特旗阿拉腾寺住了两年，根据晶珠本草纲目来辨认药草，考核成绩优异。学习期满之后，取得了满然巴学位称号。二十七岁时回到阿拉善旗开始行医，名望大盛，成了旗医。他掌握了蒙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并把理论同具体疗法结合起

来，对内脏病、后遗症、慢性病的治疗有着独特的手法。由于通过多次探究而发现的卓绝的七脉律，使他把季节和自然气候的变化同切脉联系起来，这样更是脉脉心领，诊断出的病情极为准确。总的来讲，他不但善于理论联系实践，而且对藏译蒙等方面也是出色的。贡其格达勃哈医生把自己的医术本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所以，从他那里培养出了很多有才能的徒弟。

1958年阿拉善旗举办了蒙医进修班，贡其格达勃哈应医师受聘，以旗医的身份除将根本医典比作树木来讲授之外，还将论说医典的三十一章、十一要点内容也比喻成树木，授之为四根，八十二干，三百六十枝，四十五亿一千九百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一十四叶，通过这些讲授，进一步提高了全旗蒙医者的医学水平。为了使自己的世传蒙医医道不中断，就把他的侄子牢狄藏吾、巴勒登吏格西德、拉布吉三个从小领到庙里，留在自己的身边当喇嘛。虽然教他们念书诵经，熟读了《四部医典》等医学书籍，但唯有牢狄藏吾当了医生，继承了先辈的事业。

牢狄藏吾虽然完整地继承了叔父的医道本领，但心不满足，于二十二岁时去山西省五台山，和曾是他叔父贡其格达勃哈医生的导师科尔沁旗的伊希札木苏正在那里诵经拜佛时相逢。于是在他身边当了三年徒弟。从新让他教了一遍《四部医典》的所有内容。此后，从这里离开抵达北京，在北京西医医院义务性地做护士工作，学习汉语文和西医学，初步掌握了西药用法和输液等技术，这样就成了对治疗十八种瘟疫病、各种热性病和血系统、黄疸等病有特殊手法的医生。他治疗内脏和其它热性病时主要采取针灸和用泻药的方法；对治疗寒性病时主要采取温针、热灸、热敷等方法。除此之外也会做些简单的手术。在阿拉善旗首先使用西药的蒙古族医生便是牢狄藏吾。他二十九岁时回到家乡，日后，当了阿拉善旗骑兵治安部队的少尉军医。解放之后在旗蒙医院当医生。在叔父七十二岁去世几年之后，牢狄藏吾医生也在

“左倾”路线的摧残下含冤而死，享年六十一岁。

贡其格达勃哈的侄子图布新宝音的次子将我本人亦从小送进朝格图呼热庙当喇嘛念经，跟老医师贡其格达勃哈和叔父牢狄藏吾医师学徒，在舂药和包药的过程中学习藏医，继承了范氏祖传医道。让我更进一步地深造医学，当我十四岁时送青海省皇中县塔尔寺学习藏文理论，同时在门巴拉僧学习，以德希若得的根本医典注解的蓝琉璃，索卡年每多杰根本医典注解的莫卜舍楞，汗钦却吉杰布根本医典释义等典籍为范本，学习了一年根本医典，又学习了两年论说医典莫卜舍楞，蓝琉璃，色尔吉图尔玛等三部医书。还学习了三年满·阿·兰塔布、策热勒·兰塔布、满·嘎尔吉玛、金钥匙、嘎力、蓝琉璃补释的秘诀原理，学习了两年，以蓝琉璃、多杰都德、杂都巴尔希拉为后续医典的三百六十种疗法之解。与此同时，以塔尔格丹晶朋斯格的晶珠本草为标本，每年夏季的三个月里，按塔尔寺医学部药植物的拉莫亚格进行认药实习。为了对研究藏医有助起见，我还学习了藏语语法，梵教哲学、天文地理、历史、蒙文语文，藏蒙翻译等必修内容，以优异成绩结束了十年的学业。毕业时，在三千五百余人参加的评审会上，与近二百人提出的各种问题答辩被誉为是出类拔萃的优秀成绩而获得了当时的敖玛·岭西热·嘎究的学位。我二十四岁时返回家乡以范氏祖统的医术和经验继续行医。

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期间我在内蒙古卫生干部进修学院学习，一九六一年毕业后服从组织分配，赴巴彦淖尔盟蒙医院工作，先后培养出了近三百名医务工作者。我用蒙文翻译了八十万字的近二十篇藏文文章，继续研究藏医学，使很多人起死回生。一九八〇年经过考核评为蒙医主治医师的职称。我为了使范氏传统蒙医继承下去，把侄子吉热木图带在身边，传授自己的医道知识，使吉热木图医生有了独立看病的能力。

附表

范氏十一代医生的生活年代表

名 字	生 活 年 代	终 年 岁 数
道 格 龙	1672~1737年	66
巴 德 尔 忽	1685~1766年	82
安 巴	1718~1795年	78
迈 玛	1761~1835年	75
奥 斯 尔	1789~1875年	87
德 格 曾 奈 吉	1812~1888年	77
阿 给	1855~1922年	68
贡其格达勃哈	1892~1963年	72
牢 狄 藏 吾	1906~1966年	61
淳尔布扎木苏	1931~	
吉 热 木 图	1953~	

(张学忠 翻译 朝格图 审校)

与卫拉特历史有关的几个片断

贾其格

一、青海额鲁特的形成

从一二二六年圣主成吉思汗远征中亚回师的第二年，亲率大军经甘肃进军青海色陵（今青海西宁）开始，经元、明、清朝时期，有许多蒙古人到青海西部和西藏定居，其足迹是有历史记载的。

元朝末年北京失陷，成吉思汗的后裔和蒙古贵族退守故土后，从一四七〇年始，东部蒙古首领达延汗曾进行长期的统一蒙古的战争，永谢部首领亦不刺和鄂尔多斯首领满都赖互相勾结反对达延汗的战争中战败，从而于一五一〇年率部众到达青海，这是继元朝之后蒙古人大举迁徙到青海的最初情况。

一五〇七年至一五八二年间，土默特蒙古的阿拉坦汗兴起，多次威胁明朝并占据了当时的兀良哈和卫拉特（瓦剌），为了征服维吾尔和西藏于一五五九年大军进入青海，于一五七三年又征服了青海南部高原的唐古特部（今青海藏族），这是青海额鲁特蒙古形成前几百年的历史概况。

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的图鲁拜琥固始汗，经卫拉特联盟的准许从乌鲁木齐向青藏进军。一六三七年图鲁拜琥固始汗率所属各部出征，于一六三九年以武力占领了汉木和青海东南地区，其后于一六四三年五月进军西藏拉萨，捕杀了藏巴汗，征服了西藏，占据了四川的汉木和青海、西藏地区。这次战争中土尔扈特和杜尔伯特、准噶尔和喀尔喀部的多尔济拉布丹的伊力丹一个旗、辉特部军、绰罗斯部军都曾参战。

一六四七年九月，图鲁拜琥固始汗派使臣去北京和清廷谈和，一六五四年清世祖顺治帝册封图鲁拜琥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固始汗”。一七二五年清廷分封青海蒙古二十九个台吉为扎萨克，分别管辖这二十九个旗，由此形成了图鲁拜琥固始汗定居青海后的青海额鲁特。清廷又分封卫拉特四部为六十五个旗，分别属于“赛音吉牙图”“乌恩苏索格图”、“巴图斯特格勒图”、“青斯特格乐图”四个盟，施行分割而治，其中土尔扈特部又分为十七个旗如下：

1、卫拉特翁罕七世孙忙海的四旗；

2、额济纳土尔扈特：卫拉特翁罕六世孙玛哈齐孟克后世孙纳扎尔玛穆特子阿喇布珠尔的一旗；

3、卫拉特南路土尔扈特：卫拉特翁罕宗室阿尤奇汗的后世孙昭日格图汗的四旗；

4、卫拉特北路土尔扈特：阿尤奇汗的后世孙策旺道尔吉的三旗；

5、卫拉特东路旧土尔扈特：阿尤奇汗堂弟后世孙板布尔的二旗；

6、卫拉特西路旧土尔扈特：卫拉特渥巴什汗的宗室叔图门吉日嘎郎的一旗；

7、卫拉特新土尔扈特：卫拉特翁罕的十四世孙色楞的二旗。
和硕特部分分为如下二十六个旗：

1、阿拉善额鲁特和硕特旗：哈布图哈萨尔二十一世孙巴特尔额尔克济农和罗理的一旗（今分为二旗，即阿拉善左、右二旗）；

2、青海和硕特旗：哈布图哈萨尔十世孙图鲁拜琥固始汗的二十一个旗；

3、额鲁特中路和硕特旗：青海额鲁特部的图鲁拜琥固始汗后世孙贡格的三旗；

4、卫拉特新和硕特旗：卫拉特和硕特的台吉巴雅尔拉呼家

族孟袞的一旗。

同时，在一六三七年经过卫拉特联盟的准许，为了扩大卫拉特蒙古领地，援助图鲁拜琥固始汗，联合其军争战青藏地区的三十个旗有：

- 1、阿拉善额鲁特的和罗理的一旗；
- 2、图鲁拜琥固始汗的二十一旗；
- 3、成吉思汗宗室二十一世孙多尔济拉布丹的伊力丹一旗；
- 4、辉特部：伊和明安的昭日格图和硕其达瓦齐诺颜的一旗；
- 5、土尔扈特翁罕的七世孙忙海的四旗；
- 6、卫拉特绰罗斯部宝罕的后世孙昭德巴巴图鲁的二旗。

二、和硕特部的历史片断

青海和硕特毫不动摇的跟随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罗布桑扎木苏）的指令，除了有宗教因素之外，是因和硕特内部分裂而造成的。一六五五年固始汗死，长子达延鄂齐尔继承了和硕特汗位，虽然仍占据青海、西藏地区，但已没有其父固始汗统治全和硕特部时的声威。留居故土准噶尔地区和硕特属民，为拜巴噶斯的长子鄂齐尔图台吉所管。一六六九年达延鄂齐尔汗死后，和硕特汗实际上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和硕特封建主内部，不但鄂齐尔图台吉脱离和硕特部，在准噶尔地区自称为“汗”，当时固始汗的直系宗室和西藏达赖汗一派，企图恢复和硕特汗的权势而奋斗，青海的博硕克图济农一派为了摆脱其统治而紧跟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

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过去曾依靠和硕特部固始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藏创立了黄教统治，后来随着其宗教地位的逐渐巩固，开始不满和硕特部大汗，原因是：按以往制度，和硕特部大汗要在西藏驻军镇守，无疑是限制了黄教教皇达赖喇嘛。五世达赖喇嘛

罗桑嘉错为了从政治方面摆脱和硕特汗的统治，封亲信桑杰为“第巴”，总管西藏宗教政权大事，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限制了和硕特部大汗的封建特权。用这种办法，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改革了和硕特固始汗在西藏建立封建主和宗教主联合统治制度，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制度，也就剥夺了和硕特汗对宗教的护教权。

以上变革，为总领政教大权的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和其亲信第巴桑杰发动蒙藏封建主进一步同清帝争权创造了条件。

一六四〇年后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错孤立了和硕特部的达赖汗的同时，虽然利用自己宗教地位和师徒控制了噶尔丹博硕克图汗，但噶尔丹是个智慧过人，有政治、军事才能的人物，继承了准噶尔汗位（噶尔丹用巧妙手段娶和硕特鄂齐尔图汗之女为妻，借鄂齐尔图汗之力继承了准噶尔汗位。后来听信第巴桑杰之谋，嫁女青海和硕特部博克图济农三子）。不久占有了卫拉特四部和天山南路维吾尔的广大领土，还征服了中亚的哈萨克，布利亚特，也极大地威胁着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

一六七七年噶尔丹汗趁清廷全力镇压吴三桂叛乱之机，击败了鄂齐尔图汗的反抗，直接控制了天山南北和通往到内地及入青藏地区的驿站和道路。这事实上是加强了国内蒙古、维吾尔、藏汉各族的关系，并阻止了沙俄入侵西北，噶尔丹汗的这一历史功绩应载入史册。

一六九六年末，噶尔丹博硕克图汗死后，章嘉呼图克图奉清朝皇帝之命，去青海策动和硕特封建主归清朝政府。这时第巴桑杰在清帝揭发威胁下才承认达赖喇嘛歿已十六年之久的事实，从而发生了寻认六世达赖喇嘛的纠纷。第巴桑杰寻认仓史嘉错为六世达赖喇嘛并主持坐床事宜，因此得到了青海和硕特部封建主的支持。

这时，新继承准噶尔汗位的策旺拉布坦企图联合清军消灭噶尔丹汗残余势力，但第巴桑杰授命策旺拉布坦“兵马勿动”，制止了其帮助清廷的举动。第巴桑杰的这一行动遭到驻藏和硕特达

赖汗之子拉藏汗的反对。拉藏汗得到康熙帝和嘉祥协巴（札木彦苏木巴）为首的西藏呼图克图和呼毕勒罕一派的支持，这就是康熙帝所说“朕躬奉佛教、为总辖政教之故也”的野心。

清圣祖的会典书中记载，康熙三十五年五月酉日根据俘虏的供词，噶尔丹逃跑时，其随从中多有怨言者，噶尔丹对大家说：

“我初本无意进克鲁伦地方，是听信了达赖喇嘛的谎言而来的，我本人受了达赖喇嘛之害，我又害了你们”。但是拉藏汗的势力不如第巴桑杰强，终于被驱出了西藏、回了青海。

和硕特部的拉藏汗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于一七〇五年从青海回西藏，杀了第巴桑杰。康熙帝在当日晚即册封拉藏汗为“惠敦大汗”，并令其捕送六世达赖仓央嘉错去北京，但拉藏汗奏称：

“如捕送其人，恐造成众喇嘛遣散事件”，可是拉藏汗过份忙于扶持伊西嘉错为六世达赖喇嘛，于一七〇六年要捕送仓央嘉错去北京。这时康熙帝已知拉藏汗失策，按清廷册封制度封伊西嘉错（伊西札木苏）为六世达赖喇嘛协助拉藏汗，从此清廷开始插手西藏。

准噶尔汗策旺拉布坦得知仓央嘉错被废，过去虽曾咒骂过他，但这次却派人请他去准噶尔，这一行动被清廷阻止，原因是：正如康熙帝所说：“如果仓央嘉错被请到准噶尔，西部蒙古必定要归随策旺拉布坦”云云。

过去，国内外的蒙藏史权威们中有“仓央嘉错被送去北京途中殁于青海湖畔”之说，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青海和硕特封建上层庇护下到阿拉善和硕特地区隐居避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阿拉善旗的圣祖葛根（仓央嘉错）。

当时青海和硕特部的封建上层造舆论说：“仓央嘉错殁于青海”以保护他。还散布言论说：“仓央嘉错的遗诗中有下世在色陵（青海西宁）转世的遗嘱云云，由此寻认了当地查干诺木汗的宗室格桑嘉错为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其目的在于反对西藏

拉藏汗寻认的伊西嘉错，因清廷早已按册封制度封伊西嘉错为六世达赖喇嘛，这给青海封建上层和宗教上层勾结准噶尔汗策旺拉布坦，使策旺拉布坦占领西藏创造了良机。

准噶尔汗策旺拉布坦，虽没达到请仓央嘉错到准噶尔的目的，在格桑嘉错及其在青海帮派的支持下一七一八年占据了西藏，勾结第巴桑杰的残余势力，捕杀了拉藏汗，囚禁伊西嘉错于扎干寺，并自封为“额尔德尼·额尔和图·赛西雅拉台王”，给清政府造成了新的困难。

在此情况下，清政府改变了斗争方式，顺势承认寻认格桑嘉错为六世达赖喇嘛的转世是合法的。同时勾结沙俄从南、东、北三个方面夹击准噶尔汗，并且于一七二〇年，清政府以保护和硕特部固始汗宗室格桑嘉错(嘎拉桑扎木苏)坐床为幌子，高举封建宗族和宗教的旗帜进军西藏。面对这种局势，策旺拉布坦无法应付而从西藏撤军。清军占领西藏后没有恢复和硕特汗的权力而直接派官驻藏，限制了和硕特汗和宗教上层的封建特权，无疑要遭到受欺骗了的和硕特政教封建上层的不满。清廷承认格桑嘉错的合法地位，向青海和硕特政教封建上层让步，实际上是向第巴桑杰集团让步。这样为一七二三年青海和硕特亲王罗卜藏丹津和查干诺木汗恢复过去的政教权利打下了基础。

因此，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利用康熙帝死，满清贵族为争夺帝位而内讧之机，在藏举行反清统治的起义，但雍正一掌权就进军西藏，大举镇压蒙藏地方。罗卜藏丹津无耐逃往准噶尔境内隐居。

雍正之后乾隆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并为先祖报仇，在一七五五到一七五八年，屠杀了准噶尔蒙古六十二万人，余部驱逐去了沙俄境内。这引起了蒙古民族的仇恨，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和喀尔喀部台吉青衮扎卜领导的武装斗争，使斗争遍及准噶尔地区和内外蒙古地区，造成了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统治的危机。

这时章嘉呼图克图自愿请求平定蒙古，去喀尔喀部，破坏和孤立了这次武装斗争，为此清朝统治者嘉奖说：“你呼图克图片纸解除了漠北喀尔喀的威胁”。

以上就是和硕特部的一些历史片断。

（乌达布拉 翻译 朝格图 审校）

名 词 解 释

〔理藩院〕清代管理藩部事务的中央机构。在当时，内外蒙古、青海、西藏、新疆地方被称为藩部。理藩院设管理院务大臣尚书，左、右侍郎（俱各满洲一人），额外侍郎（蒙古一人）等官；旗籍、王会、柔远、典属、理刑、徠远等洁吏司，掌管藩部朝贡、封爵、俸录、会盟、驿递、互市贸易、刑罚等事务。

（朝格图 辑）

阿拉善盟畜牧业发展概述

洋金都

阿拉善盟总面积为269,885平方公里。其中可利用草场面积127,169平方公里，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占总面积的29%，戈壁滩面积占33.7%。自古以来这里的牧民根据干旱的气候条件和沙生植物种类，经营骆驼和小畜（羊）为主的五畜生产。居住分散，常年游牧，利用四季的草牧场，以户经营。

解放以来，在畜牧业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了许多曲折，但是，我党不断地端正了路线、方针政策，广大干部和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畜牧业经营管理得到了逐步改善，畜牧业生产发展速度很快，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我盟畜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里，广大牧民群众政治上得到完全解放，翻身做了主人，在党的领导下，畜牧业生产飞跃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提高。当时自治区吸取了应用农区土改的办法使牧区造成严重损失的教训，以后在制定政策上注意从牧区的特点、民族的特点和畜牧业经济的特点出发。在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贯彻执行了“三不两利”、“稳宽长”的政策及发展畜牧业一系列方针，依靠草场载畜量大、水草资源优厚的条件，畜牧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一九五七年由解放初的357,606头（只）发展为1,072,476头（只），八年增长三倍，按牧业人口，人均牧畜42.2头（只），牧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第二阶段：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这九年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人们的思想难于集中搞生产，畜牧业发展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九五八年全国掀起大跃进，普遍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了一九五九年春一轰而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刮起了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遭到“一大、二公、三平均”的袭击，畜牧由原来的个人所有突然变成百分之百的集体所有，主要生产工具也变成集体的，私有制绝迹。这种“一大二公”给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严重挫折，牧业经营管理被搞乱了，挫伤了牧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针对上述情况，自治区党委根据党中央有关政策采取积极措施，制止和刹住了这股逆风。其主要有：〈1〉缩小公社、生产队的规模，实行两级管理；〈2〉对社员入社牲畜给予报酬，对牧民入牧场的牲畜给予定额；〈3〉确定自留牲畜政策，社员有了乘畜、奶畜、肉食畜；〈4〉在经营管理上实行定产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5〉在收益分配上瞻前顾后，留有余地，以产计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采取三七开、四六开的分配比例，保证了丰年增加收入，灾年不减收入。这对稳定牧民生产情绪，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在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严重干旱之年，全盟（阿左旗、阿右旗、额济纳旗）牧畜达到1,315,233头（只），九年平均增加2%。但是，在60年至61年的这两年自然灾害中，又有大批人口盲目流入，牧民人均牲畜下降到30头（只），年纯收入94元。

第三阶段：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大动乱，在牧区划分了阶级成份，级阶阵线混淆，民族隔阂加大，使人心大乱，生产大遭破坏。在“文革”中，全盟广大的牧民群众和干部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打击，“划阶级，斗牧主、没收和抢分财产，剥夺政治权利，长期改造”，并扣上“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新内入党”、“蒙修特务”、“叛国投敌分子”

等莫须有的罪名，白天受大会批，晚上挨小会打，到了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在生产经营上，违背牧区的特点和历史背景，盲目改变生产方针，提出“牧区不吃亏心粮”，“学大寨，牧区也不例外”等错误口号，人口大量流入，搬用农区的办法，大面积开荒种地，完全脱离了牧区的实际情况，使丰美的草场遭到破坏，浪费了人力财力，极大的影响了牧业生产建设。接着搞大干快上，建立大寨式单位，资金用光，牲畜卖掉，结果“鸡飞蛋打一场空”，集体成了空架子。到一九七六年，全盟牲畜虽然发展到1,599,865头（只），但是，十年平均只增1.7%，牧区人均牲畜继续下降到只有25头（只），牧民生活显著下降。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走向极端，“吃大锅饭”超越社会物资基础和人们的觉悟水平，严重挫伤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按劳取酬”的分配原则，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不如不干，干的不如捣乱的现象。讲生产者受到“唯生产力论”的批判，讲管理怕得罪人。经济发展倒退，生产受到破坏，给人民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在思想无政府主义抬头，搞派性，拉关系，领导不得力，工作责任无衡量标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以对我是否有利而决定，拿原则作交易。利用私人关系，把集体财产流入少数人手中，经济基础越来越空，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建设和家庭生活。工作上搞形式主义，瞎指挥，虚报空喊，官僚主义越来越严重，“假、大、空”风越刮越大，各项工作无秩序，到了真假不分、是非颠倒的地步。

第四阶段：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四年的八年里，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下，畜牧业生产恢复发展的过程。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盟在政治上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肃清“左”的流毒，坚持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拨乱反正，纠正了各种冤假错案，落实了党的民族政策，加强了民族团结。生产方

面，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和“林牧为主，多种经营”的建设方针。同时，放宽经济政策，落实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干部、牧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并大抓抗灾保畜、草原建设，努力发展水、草、林、饲料基地的建设。

八年间战胜了阿拉善历史上罕见的连续四年的严重旱灾，一九八〇年全盟牲畜总头数2,014,526头（只），达到历史高峰。一九八四年全力保护和恢复牲畜，总头数达到1,499,074头（只）四年灾害共死亡牲畜330,386头（只），年均死亡率控制在4.63%，低于历史上死亡率最高的一九六六年334,748头（只）。我们在灾年坚持实行了以草定畜，提高了牲畜的商品率和出栏率，腾出了草场，减轻了负担，集中保护了基础母畜和种公畜。每年保活602,700头适龄母畜，保证了灾后迅速恢复发展生产的基础。在分配方面，坚持了按劳取酬的原则，执行“两定一奖”、“三包一奖”、“大包干”、“作价承包”等责任制，逐步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弊病，在大灾之年广大牧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收入得到了增加。全盟由一九七七年人均收入一百五十八元，增加到一九八四年的二百九十四元，比以前每年人均增加十七元。

从以上四个发展过程，充分说明我盟发展畜牧业，必须一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靠自然条件；三靠科学管理，这三个方面哪个也不能忽视。

（朝格图 译）

征 稿 启 事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关于“搜集、整理、编写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等资料”的任务，以及第四次全国文史资料会议的精神，为活跃我盟政协工作，我会特向党内外老同志和社会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其目的在于广泛积累有关阿拉善（盟）的现代史、革命史等历史资料，供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参考使用。这是一项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并惠及后代的光荣事业，对于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阿拉善具有重大意义。

1、稿件的时限自清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此历史时期内有关阿拉善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民族、宗教、法律、民俗、医药、工商、交通、名胜古迹以及历史人物传记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资料均在本刊征稿范围。

2、稿件要求是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亲身经历和亲身见闻，或是反映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情况，撰稿者必须遵照“存真求实”的原则，忠史实，秉笔直书，详细具体，参考引用的资料要写清出处，字迹要清楚，不限篇幅，不拘体裁。

3、个人手中存有与上述现代史、革命史有关的文物、遗稿、日记、手迹、函电、照片、人、物画像等均在收集之列。

4、来稿请写清通讯地址及真实姓名。请勿一稿多投。

5、各种文史稿件，凡经本选辑采用者，均致稿酬；转载稿件不付酬。

6、本选辑对来稿有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权。

7、凡经发表的稿件，允许本人或他人补充和订正。

8、因人力所限，来稿一般不退，请自留底。三个月内未见采用通知，可自行处理。

9、来稿请寄：“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编辑室”，切勿寄个人。

《阿拉善盟文史》编辑室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阿拉善盟文史第一辑

作者 =

页数 = 1 2 3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